

第五辑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到机场欢迎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来。



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录

回顾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长冈乡调查》

.....	杨尚奎	(1)
清明怀念周总理	方志纯	(28)
难忘的一个冬天	罗孟文	(41)
皖南事变与项英被害真相	谢忠良	(54)

八一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	丘倜遗作	(71)
八一起义的一个插曲	刘 刚	(75)

——回忆朱德同志智擒敌团长

“三南”游击烽火	肖自立	(83)
九江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桂家鸿	(101)

江西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赵醒侬烈士	刘其农	(118)
革命先烈袁孟冰同志	本刊记者	(131)
洒血黄埔卫中华	熊巢生	(142)

——记四叔熊雄烈士

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斗争的片断回忆

.....	王贤选 何 斌	(157)
起来，奴隶们	吴大可烈士遗作	(164)

插图：1964年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
到机场欢迎周恩来同志从莫斯科回来（封二）

1962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封二）

回顾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

《长冈乡调查》

杨尚奎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日，是毛泽东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五十周年的纪念日。我和老根据地人民一道，参加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活动，甚感欣慰。真是故地重游，感慨万千。尤其在我的故乡兴国县参观了《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的展览，回顾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深入调查的实践，重温毛泽东同志写的《长冈乡调查》报告，使我深深感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主观主义，乃是我们党半个世纪来战胜“左”右倾机会主义，克服一切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也是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继承和发扬的光荣传统。

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认识客观世界的科学方法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前提，是无产阶级政党决定政策的客观基础和领导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特别是每当中国革命发生大变动，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发生大变化的时候，总是带领和号召全党同志，运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原则和辩证方法，对周围的环境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从客观的实际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规律性，作为制定我们党的策略的依据和指导全党行动的指南。我们党的这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是在长期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革命每个关键时刻，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内都出现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历史和现实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两种错误倾

向，特别是“左”的错误倾向，在党内形成的次数最多，持续的时间最长，造成的危害最大，它使我们党贻误了许多有利战机，付出了巨大代价；它使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遭受到严重挫折，蒙受过惨重的损失。我国人民在现实生活中，遭受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长达十年之久的动乱之后，更加深恶痛绝他们败坏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罪行，热切地盼望党的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之风、理论联系实际之风能重新发扬光大。

毛泽东同志的《长冈乡调查》报告，虽然距今已快半个世纪了，但它作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重要文献而载入党的史册，对于党内正确开展反倾向斗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个著名的调查报告中，毛泽东同志针对一切从本本出发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当时根据地造成的危害，从实际出发，从调查研究入手，总结了长冈乡的经验，正确地提出并解决了组织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与革命战争的关系。这对于我们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决贯彻党的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经济上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的实际，开创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和扩大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一九二八年冬，湘赣两省国民党反动派调集重兵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会剿”。为了粉碎这次“会剿”，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留部分红军坚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则向赣南、闽西进军。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四日，红军主力军共三千六百余人，在毛

泽东同志和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由井冈山出发，经遂川进入赣南。二月初到达瑞金，三月挺进闽西，攻占长汀。三月二十日，红四军在长汀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向赣南、闽西分兵发动群众，开辟新的红色割据区域。四月一日攻占瑞金县城，逐步创建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从一九三一年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朱德等同志领导中央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坚持武装斗争，不断打击敌人，使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拥有赣南、闽西二十一个县，五万平方公里土地，二百五十万人口，最多到了三百万人口，成为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就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区域，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

但是，中央革命根据地，不断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三三年二月的二年半时间里，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和人民，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连续粉碎了敌人组织的四次反革命军事“围剿”，这就不仅打击了敌人，壮大了红军，巩固了根据地，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当时，在白色政权包围中，全国已出现十五块红色根据地。井冈山的革命火种，早已星火燎原，势不可挡；革命的形势，如火如荼，迅猛发展。

正当中国革命沿着党和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正确路线胜利前进的时候，中央根据地受到了来自外部的和内部的两个方面的压力和干扰，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一九三三年十月，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一百万军队，超过了前四次“围剿”的总兵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亲自督战，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实施全面的军事包围，妄图一举消灭红

军。与此同时，他们还切断了一切通往中央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困死根据地的军民。

面临着敌人五倍于我的军事力量和野蛮的经济封锁，中央根据地的前途和命运处在最危急的关头。党内出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路线，排斥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这时，党和根据地的军民对于敌人的军事压力和经济封锁并不害怕，有着四次反“围剿”的经验，只要全党一致，万众一心，采取正确的军事策略，是可以克敌制胜的。但是，对于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却没有精神准备。特别是在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一些同志产生了盲目骄傲、麻痹轻敌的思想，急于求胜的心切，对“左”倾路线缺乏认识。当时王明这些被群众称为“住洋房子先生”，一到中央根据地，就乱发号令，指责毛泽东等同志坚持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是“极端错误的”，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他们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离开当时的条件与可能，一味地抄本本，生搬硬套，主观地估量阶级力量的对比，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军事原则，提出什么“全线出击”、“六路分兵”、“两个拳头打人”的死打硬拚的方针，幻想决此一战，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夺取大城市，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因此，他们完全否定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把动员革命战争与组织经济建设、改善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对立起来。他们在中央根据地全面推行了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指出：“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

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斗争，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尽管当时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排斥，但党内许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陈毅、刘伯承、聂荣臻、任弼时等同志都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反对和抵制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无数下级苏维埃工作同志则努力工作，在许多地方创造了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可贵经验。长冈乡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

毛泽东同志为了批判王明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和官僚主义，教育全党认清和坚持正确路线，在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夕，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率领中央检查团来到了兴国县的长冈乡，作了深入实际的调查，对长冈乡的全面工作进行了总结，写下了《长冈乡调查》这篇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不久，毛泽东同志将这篇调查报告和《才溪乡调查》报告一起发给参加全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到会代表，并在这次大会所作的报告中，高度赞扬了长冈乡的工作，号召在全国“造成几千个长冈乡，几十个兴国县。这些就是我们的巩固阵地。我们占据了这些阵地，我们就能从这些阵地出发去粉碎敌人的‘围剿’，去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

由于当时王明占据了党的领导地位，推行了一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结果中央根据地的军民浴血奋战整整一年，不但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反而使中央根据地越战越小，直至最后完全被断送，红军蒙受到重大损失之后被迫作战略转移，进行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回顾中央根据地得而复失的历史教训，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是

偶然的，它主要是由于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错误领导这个内因，并通过敌人强化其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这个外因而造成的。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以上就是毛泽东同志进行长冈调查的背景和目的。

(二)

毛泽东同志通过长冈乡以及中央根据地其他一些地方的实际调查，总结了当时建设根据地的重要经验。首先，他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深刻地阐述了当时的中心任务，也就是军事斗争同经济工作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要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必须坚持不懈地做好经济工作，把组织革命战争与组织经济建设统一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

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三年作《长冈乡调查》之前，就曾几次到过长冈乡。一九二九年春，他和朱德同志从井冈山来到长冈乡，在长冈的燕子窝秘密召开了永丰、泰和、宁都、兴国等地党员代表大会。一九三二年七月，毛泽东同志在兴国主持召开红军的军事联席会议期间，又特地到了长冈乡，指示长冈乡人民迅速建立地方武装，巩固革命政权。已经建立红色政权的长冈乡人民，按照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除了积极动员适龄青壮年参加红军之外，还把全乡的男女青壮年组织成了地方部队，造成了全民皆兵的铜墙铁壁。所以，长冈乡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关怀和指导下，扩大红军和坚持地方武装斗争，早就搞得轰轰烈烈了。

《长冈乡调查》中写道，“全乡四三七家，一七八四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三二〇。”对此，毛泽东同志称赞道：“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女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乡里留下的人组成了地方部队，除了坚持经常性的训练之外，平时还担负交通运输、站岗放哨、防空防毒以及维持地方治安、保卫红色政权等各项任务；战时配合红军作战，全力支援前线。

在几次反“围剿”的战斗中，他们经常配合红军用出敌不意的办法进行扰敌；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袭敌；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困敌。无论平时，还是战时，长冈乡的地方民兵在配合红军，消灭敌人，支援前方，保卫家乡的战斗中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这里，我想讲两件事来说明这一点。

一九三三年秋，眼看敌人要占领泰和县城。当时红军有一个粮库在县城附近，需要立即动员劳动力去抢运粮食。当这个十万火急的任务下到长冈乡之后，全村赤卫队员积极响应。乡政府连夜开会，决定让女赤卫连担负这次任务。消息传开，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女赤卫连一百二十人一个不少的集合起来了，个个头戴斗笠，肩挑箩筐，迅速赶到目的地，经过三个昼夜不停地抢运，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这次突击任务。

再介绍一个长冈乡儿童查哨的故事。因为《长冈乡调查》中，有专门一段介绍长冈乡查哨的做法和经验。也是在一九三三年，毛泽潭同志来长冈乡检查工作。他事先既没有通知乡政府，也没有带任何人同行。他衣着朴素，脚穿草鞋，一边走着，一边蹲下身去，察看田里庄稼生长的情况。忽然，一个有力的童音喊着：

“站住！请把路条拿出来看看。”

毛泽潭同志停住了脚步，一看几个十二、三岁手持红缨枪的娃娃把自己围住了。他没有马上拿出介绍信，准备考验一下这些娃娃。他一边拍拍手枪，一边说：

“我有急事，忘了带路条，回来再说吧？”

“不行！没有路条不能过。”儿童团长严肃地说。其他几个儿童团员也不惧怕，把包围圈缩小了。其中还有一个吹了口哨，从附近埋伏的草堆里又冲出几个儿童团员，把他紧紧包围在中间。

这时，毛泽潭同志满意地笑了一笑，他打心里为这些娃娃高兴。这才从口袋里掏出了介绍信，郑重地交给那个为首的儿童团

长。等到看完了介绍信，儿童团长惊奇地叫道：

“是中央来的。对不起！对不起！”紧张的空气才消除，孩子们高兴地散开了。

后来，毛泽潭同志回到瑞金时，多次夸奖长冈乡的儿童团员们，还要乡政府奖励他们。从此，长冈乡儿童团站岗查哨的故事便迅速传开了。

这些事实，都充分地说明了长冈乡的党组织和人民在响应和完成党的中心任务，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模范的长冈乡，不但在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可贵的是他们在动员群众参加经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十分注意经济工作，把经济建设看成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把政治的、军事的任务和经济的、生产的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用认真抓好经济建设，去推动和发展革命战争的胜利。

一九三三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召开的有十七个县参加的经济建设工作会议上，曾经阐述了在恶劣的战争环境里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的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他说：“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首先是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战争的彻底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为着这一切，就需要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那种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坏了，那里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工作”和“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

是不可能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到疲惫”，“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经济建设，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只讲战争，不讲经济的危害性，认为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经济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长冈乡就把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当时，长冈乡外出当红军和工作的三百二十人，几乎都是全劳动力的青壮年，这等于留下的全劳动力一百五十人的两倍。因此，要发展生产，首先要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其次约有四分之一户缺耕牛，这也是发展生产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长冈乡人民，依靠组织“劳力互助组”、“模范耕田队”，合理分配和调剂使用了劳动力；他们还依靠“耕牛合作社”的办法，发扬协作的精神，妥善地解决了耕牛不足的困难。他们依靠群众的力量，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村村户户，开荒筑路，造河堤，修水利，生产竞赛搞得轰轰烈烈。不仅田地没有荒废，粮食还增了产，豆子、油料、花生都获得了丰收，整个长冈乡的农业生产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中高度赞扬了长冈乡人民在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长冈乡百分之八十的青壮年都当红军去了，留下来的大多数是妇女同志，妇女们是怎样担负起生产任务的呢？毛泽东同志听取了乡干部的汇报。他问长冈乡干部：

“妇女学犁田，村里老年人不说怪话？”

乡干部回答说：“妇女开头是偷偷地在夜间到河边去学的。一则河滩上是沙地，好学犁，二则没有人看。等到犁头把稳了，再下田。老头子看见了，当然少不了咕咕哝哝。妇女也不示弱，问他们要不要吃饭，他们哑口无言。但还是在背后说：犁得个脚板深，还长得出禾来。直到去年秋收，粮食增产了，他们再也不说了。”毛泽东同志听到这里，高兴地插了一句“大概是吃到肚

里，就不好说在口上了。”一句话，说得在座的乡干部都笑起来了。

后来，毛泽东同志又亲自访问了塘背村代耕队长，也就是长冈乡第一个学犁田的女生产能手李玉英。当时，李玉英同志详细汇报了长冈乡妇女如何学犁田、耙田、插秧，积极投入生产，主动挑起整个农活这副重担的情况。

提起妇女学犁田，长冈乡人民至今不忘李玉英。她当时是妇女部的主任，为了响应党中央发出的“搞好生产，支援红军”的号召，发动和组织妇女出来作田，她拜老农为师，反复实践，学习犁田。有的上了年纪的人问她：

“你见过哪个朝代有妇女学犁田的？”

李玉英一本正经地反驳说：

“现在男女平等，你怎么又讲出轻视妇女的话呢？”决心和旧传统决裂的李玉英，不怕讽刺，不怕困难，坚持勤学苦练。

第一天学犁田，李玉英只顾甩鞭子，忘了扶犁把，结果牛跑得比人快，犁头还没有入半分土。

第二天，她从水田改到旱田里学，还是把不稳，犁不深，两手配合不好。这天夜里，她睡在床上，反复琢磨这件事，不由得两只脚在被窝里拖来拖去，两只手在被面上幌来幌去，一手扶把，一手甩鞭，练到半夜，觉得有点把握，她就一骨碌爬起来，牵着牛到田里去，一人在月光下犁起地来，一口气犁好了半亩地。这样一来，整个长冈乡妇女都跟着学起来了，她们便成了生产上的主力军和多面手。

那个时候，中央根据地召开了生产评比会。李玉英代表长冈乡参加了这次会议，她把自己怎样发动妇女学习和参加生产的经验向大家作了介绍，各县都表示要向长冈乡的妇女学习。会上，还奖给李玉英个人一条绣有斧头镰刀的蓝布围裙，奖给长冈乡一头大水牛。

通过对长冈乡生产的实地调查，毛泽东同志亲眼看到了妇女

的伟大力量和作用。他指出：“长冈乡的生产，绝大部分是依靠女子，长冈乡提出了‘妇女学习犁耙’的口号，女子已是成群地进入生产战线中，这证明有组织的调剂人工与推动女子参加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任务。长冈乡扩大红军如此之多，生产不减少，反而增加了，即因为他们把这个问题很好地解决了。”他非常赞许地说：“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的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的短短几天中，经常深入田间，了解情况，参加生产，和农民一起挖花生，种油菜，总结丰产的经验。有一天，他来到燕子窝的田野上，亲自察看了这里的土地，他蹲在地下，抓起一把泥土看了又看，沉思半晌，然后，他走到正在田里犁田的农民身边问老农：“犁了田种什么？”这位老农回答说：“准备种油菜。”毛泽东同志就招呼这位老农坐下来，详细了解这里两年种油菜的情况和取得高产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关怀，给长冈乡人民坚持生产、发展经济以很大的鼓舞，留下了深刻影响。

毛泽东同志还根据在中央根据地建立政权后进行经济建设的实践，于一九三三年就预言过“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这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讲过的“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的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革命导师关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把经济工作放在首位，并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思想，正是周恩来同志两次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理论根据，也是党的三中全会提出转移党的工作中心的理论根据。从这里，使我们更加看清了七十年代的林彪、“四人帮”反对把经济工作作为全党中心任务的极左路线，只不过是三十年代王明反对经济工

作的“左”倾路线的继承和发展。王明那个时期，就是以革命战争压倒一切，冲击一切，谁谈论生产，就给扣上“右倾”的帽子。到了“四人帮”猖獗的时期，也是以突出政治压倒一切，冲击一切，谁要谈论生产就被扣上“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和“正在走的走资派”的帽子，胡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之时，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之日”。这是林彪、“四人帮”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歪曲和背叛。

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依据我党和人民创造的实际经验，所阐明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的辩证关系，包括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科学论述，仍然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的。

(三)

毛泽东同志通过在长冈乡的实地调查，总结了长冈乡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就是长冈乡的干部十分注意群众的生活，把组织革命战争与关心群众生活密切地结合起来，使人民群众的生活能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得到切实的改善，从而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

当时，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造成了人民日常生活的极度困难。特别是食盐、布匹和药材非常奇缺，群众这些大量的实际生活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势必影响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直接关系到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长冈乡的干部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在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上，表现了很高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凡是群众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从柴米油盐到生老病死，从衣食住行到文教卫生，他们都尽到最大的努力，具体而又实际地解决每一个问题，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的调查过程中，十分注意收集和总结长冈乡的干部是怎样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中每一个实际问题的材料的。他到长冈乡的第二

天，就到红军家属刘长秀同志的家里。他问刘家生活有没有困难？日子好不好过？刘长秀同志因为不认识他就是毛主席，身旁也没有干部在场，就回答说：“同志，好得我们乡政府的干部顾乐（照顾）我们，不然米都冒煮。”主席接着问了她家里几口人吃饭，她回答说，五个，自己、丈夫、女儿、两个男孩，丈夫和大儿子都当红军去了。主席又问：“你的丈夫和儿子都参军了，家中有什么困难？政府的优待工作做得怎么样？”刘长秀同志回答说：“历次都是麻烦乡主席，昨天刚刚露了点风声，说没有米下锅，今天一清早，代表主任就送了米来，共产党真好，什么事都帮我们想到了。”毛主席满意地点了点头。接着他进一步调查和了解了当时长冈乡干部是怎样解决群众缺粮问题的。当年蒨田时，长冈乡闹春荒，有百分之八十的群众缺粮。长冈乡的干部急群众之所急，不辞劳苦，到东固、沙村、富田、水南等很远的地方办粮，解决粮食四百八十担，使全乡无饿饭的。

有一天，毛主席去油菜地里参加劳动，路过马荣海同志家门口时，停住脚步问“谁家的房子这么新？”这时马荣海同志出来说是他的。主席问：“新房子是怎么盖起来的？”马海荣同志就把自己家失火烧掉了房子，无家可归，乡苏维埃利用互救会捐钱，发动群众捐工捐料，替他盖房子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了这位身材魁伟的中央调查团的同志，并万分激动地说：“共产党真好，照顾我们真周到，我家房子一烧掉，三天就给我盖好了新房。要是在国民党时，做梦也想不到。当红军实在光荣，我的大儿子参加红军去了，二儿子明天刚满十八岁，我又要送他去当红军。”主席听了以后，在第二天晚上风趣地批评了乡干部做了工作不汇报。

当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人民群众吃盐十分困难。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中是这样记载的“老少平均每人需盐四钱（月十二两），今年七月减少一半只二钱（月六两），十一月三钱多一点（月约十两）。群众食酸菜水，说与放

差不多（这是国民党的罪恶，冲破封锁，才有盐吃）。"长冈乡的消费合作社，就是从办盐开始，调动了大家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紧紧抓住了这个典型，深入调查长冈乡消费合作社在安排群众生活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这次他来到长冈，专门找了该乡消费合作社的社长李逵应同志，详细调查长冈乡办社的经验。这次李逵应同志也参加了庆祝中央根据地五十周年的活动，我们久别重逢一见如故。李逵应同志虽然年过八十了，但身体还很结实。这位多次受到毛主席接见和表扬的老社长，对毛主席来长冈乡调查，记忆犹新。他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毛主席当时调查消费合作社的情景：

“一天下午，燕子窝村苏维埃代表通知我晚上到徐家祠开会。我当时心里估计八成是毛主席找我，就一口气赶到了燕子窝。走进祠堂，看到里面早已坐了五、六个人，当时毛主席坐在桌子右边，身穿青色制服，正拿着笔在本子上写字。这是我第三次见到毛主席，高兴得差一点失声喊出来了。但想到乡干部的嘱咐，我还是忍住声进了祠堂。毛主席一看见有人进来，就起身握着我的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逵应。’

“‘你在乡里担任什么工作呀？’

“‘消费合作社的社长’。

“‘啊，对了，《红色中华报》介绍了你们的事迹，你们的合作社办得很好啊。在敌人封锁很紧的情况下，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替红军，替苏区人民买来了大批食盐、布匹，群众很信赖你们的合作社。’

“我当时听了毛主席的赞扬，心里是热呼呼的，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主席又问‘你们消费合作社有几个人工作？’

“‘一共三个人，一个负责采办，一个会计兼管营业，我就全面负下子责。’

“‘每人每月发多少工钱？’

“‘我们在社里吃饭，大家说每月给我们两三块钱，我们没要。’

“毛主席笑了笑，又问：‘你们社是怎么办起来的？’

“我当时就把办社的经过作了详细的汇报。那是一九三一年的时候，敌人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对我们苏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什么都运不进来，特别严重的是没有食盐吃，群众吃不到食盐，精神很不好。我看到这个样子，心里很难受，就找村里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准备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先给群众弄点盐吃。当时，我们把这个意见向乡苏维埃政府作了汇报，乡苏维埃主席同意了，他告诉我们，中央有指示，号召各地办消费合作社，建议我们村里先搞个试点，有了经验全乡都办。我们听了很高兴，就向乡主席要求拨点开办费。乡主席非常支持，从土改斗争果实中拨出了一百块银元，作为办合作社的基金。我带了几个同志装扮成商人模样，深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插入敌后。用银元换得了几百斤盐，连夜设法从赣县毛甸运回来了。以前商人卖盐要四角一斤，我们只收二角五分，社员和红军家属只收二角。群众见到了盐，比什么都高兴，都说消费合作社真好，能替群众办事。这次运来的盐不多，一下就卖光了。有的群众就问，为什么不多买一点来，我们说钱不够。群众说，钱不够，我们大家凑嘛。有人提出，地主家里，祠堂里的大匾是贴金的，可以剥下来。我们和乡干部研究了一下，就决定一面发动大家集股金，每人凑一至五股，每股五角钱，共积了八十多元，一面又发动大家去剥金。村里有个师傅会铸金，将剥下来的金子打成首饰，拿到白区去换货物。这样不到几天就有二、三百户送来了股金。我们买来的货物品种渐渐多了，除盐和布匹外，还有水鞋和日用品，消费合作社就是这样一天天地发展起来了。

“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后，称赞地说：‘你们自力更生，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很好。’然后又亲切地问道：‘你们经常越过

敌人的封锁线去买盐，路上通行很困难吧？’

“‘敌人封锁很严，我们想了个办法，商定由白区的盐商把盐运到红军边界附近，我们派人到边界上去接，这样就碰不到敌人，也省去了很多麻烦。’

“毛主席记下了这段汇报之后，又向我提出了新的问题：

“‘你们消费合作社赚的钱怎么样分配呢？’

“‘我们把百分之三十分给社员，其余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社干的奖励金，百分之十为社员的文化教育费。每次分红时，清算帐目，张贴公布，群众很满意。后来，为了鼓励社员，决定增发红利，临时将百分之十的文化教育费取消了。’

“毛主席听后，以商量的口吻说：

“‘百分之十的文化教育费取消不太好吧，应该帮助发展乡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嘛。’

“我当时表示赞同地说：‘毛主席说得对，我们回去就恢复。’

“毛主席又问：‘合作社对社员有没有些优待办法呢？’

“‘有，我们对社员的优待办法是买东西有优先权，价钱也便宜些。凡是社员和红军家属到合作社买东西，比非社员一律便宜百分之五，照市价算，便宜百分之二十，投机商人也没空子钻。群众看见参加合作社有奔头，入股的越来越多了。’

“我讲的这些事情，毛主席都作了详细记录，特别是对各种数字问得很详细。毛主席最后说：‘你们合作社对社员优待很好，对红军家属的照顾也是对的。这样做社员满意，群众也会满意。你们的成績不小，给群众做了许多好事，为群众解决了日常生活中的困难。所以群众很信赖你们合作社，也信赖苏维埃政府，信赖共产党。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要把这个道理向社干部讲清楚，把合作社进一步办好’”。

长冈乡的干部不仅注意解决群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问题，而且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办起了文化教育、卫生事

业。他们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办起了四所列宁小学，九所农民夜校，使得百分之六十五的学龄儿童都能入学念书；许多从来不识字的农民，特别是妇女进了夜校；一些年纪大的老年人家务事多，不能进夜校，便组织了识字班。全乡男女老幼，都学文化、学政治，学生产技术，群众懂得了革命道理，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长冈乡人民面对着革命带来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兴高彩烈地唱着：

暖呀来——

如今世界大变样，

贫苦工农起学堂。

暖呀，会做工夫会读书，

同志哥，

家家都要出个状元郎——

长冈乡还将全体居民编成卫生班，规定五天一次大扫除。村村都订卫生公约，户户都有防疫卫生手册。群众性的大扫除，使农村卫生面貌大为改观，大大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毛主席在《长冈乡调查》中充分肯定了长冈乡卫生运动的成绩，他指示：

“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他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

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的调查过程中，不仅了解这里的干部是怎样做到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的，”而且深入了解这里的人民实际生活的改善情况，并鼓励人民群众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奋斗。毛泽东同志在瑞金时，曾对专程来向他汇报的长冈、榔木、杨澄乡的李述应等三同志讲过：“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工农的生活得到改善。”他还指着这三位穿着大襟褂子的乡干部说：“你们可以穿中间开襟的褂子，可以穿中山装、学生装，就是西装也可以穿穿嘛！有什么不行的。”主席还笑着问他们：“为什么换了时代不改

装？！”并告诉他们，瑞金设了个拍卖部，那是打漳州、厦门的洋口时没收来的反革命和大地主的东西，很便宜。要他们去选几件合意的带回家穿穿。

长冈乡的干部处处为改善人民生活着想，真正成为了群众生活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使得长冈乡人民的实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调查》中，详细记载了长冈乡人民生活改善的情况：

“今年春耕虽好，因虫秋收不好，只等于去年的收成。但一，秋耕好，蕃薯、豆子均比去年增加四成。二，冬耕又加种蔬菜、胡豆、雪豆与油菜”。

“油有多余”，“花生比去年好，可打油，家家多少分了一点，木子岭又有些木油，油不少，还有多余”。

“豆子收成好（水匀，去年则全受水害），豆价也很好（去年每担九元，今年十二元），可交换全乡食盐百分之六十”。

“吃肉贫农增一倍、工人增两倍”，“‘供猪’的人家要占百分之八十五，不能供的约占百分之十五，平均每家每年猪卖出约值二十元，买进猪肉约十二元与八元，”“过去不说逢圩，即过年过节也吃不到肉。现在不说过年过节，每次逢圩大家都要买点肉吃了。”

“鸡鸭多数自己吃，过去则多数卖出。”

“生活好起来，柴火少出卖”，“过去挑柴火去城里卖的人多，现少了百分之三十，因有许多人不需卖它了。”

“衣增一倍”，“贫农、工人则现在较过去改良了一倍，比如现在制二元衣服，过去则只能制一元。”

这些数字生动的说明，由于长冈乡干部把组织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两大任务结合起来了，在革命战争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不但生活没有下降，反而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这就是长冈乡的青壮年十有八九踊跃参军的一个重要原因。生活安排好了，走者高高兴兴，毫无牵挂；留者欢欢喜喜，无后顾之忧。但

也有少数对家里生活不放心的，“本乡有七个开小差的”。他们跑回家来一看，乡苏政府和干部处处关心红军家属，从“组织互助社帮助红军家属耕田（不要工钱）”，到“本乡红军家属紧时，平均每家每月帮助二十五个工，平时，每家每月帮约十个工”；从成立“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解决红属各种困难，到把“优待红属”当作革命竞赛的重要内容来检查，不仅家无荒田，而且生活大有改善。使这些同志也都放心归队了。长冈乡所以能够在战争动员上取得伟大成绩，是与他们切实关心群众生活，尤其关心红军家属的生活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的调查过程中，不仅认真总结了长冈乡干部关心群众生活的经验，而且言传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直到今天，仍在长冈乡人民心目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央调查团的同志一到长冈乡，乡干部就向群众借来了十多块门板，几十条板凳，给调查团的同志铺床。毛主席知道了，便问：“门板和凳子是从哪里搬来的？”乡干部回答说：

“向群众借来的。”主席关心地说：“群众睡觉要关门，吃饭要坐凳，你们赶快送回去，我们在楼板上开个铺就行了。”经过乡干部再三解释，才答应留下三块门板，给体弱的同志睡，主席却睡在楼板上。晚上，在列宁小学开调查会，为了方便调查团的同志们作记录，乡干部在油灯上加了两根灯芯，主席发觉后，立即捻熄两根。还有一次，主席访问女耕田手李玉英同志时，经过了樟树塘小桥，见小桥是四根木头架的，已经断了一根，桥面坏了，桥栓也断了。毛主席便对乡干部说：“这桥坏了会跌倒行人的，要赶快修理好。”长冈乡的干部听了很受教育，并派人修好了小桥。事后，毛主席回到瑞金，还惦记着这件事，写信问道：“樟树塘的小桥修好了没有？”当时，长冈乡的人民听了非常感动。都说：“毛主席想的真周到，连我们过桥走路的小事都记挂在心上。”

毛泽东同志通过在长冈乡的实地调查，高度评价和表彰了长

冈乡干部关心和改善群众生活的实际工作，有力地说明了改善群众生活与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他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了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国民党要来进攻红色区域，广大群众就要用生命同国民党决斗。”长冈乡的经验证明，由于他们关心和改善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的信赖，使广大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最大限度地调动了革命积极性，为革命战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长冈乡的经验，有力地批判了王明把组织革命战争和关心群众生活对立起来的“左”倾路线。那种只讲扩大红军，扩充运输队，收土地税，推销公债，不讲生产，不管生活，对于群众生活问题一点不理，一点不去解决，看起来好象很革命，实际上不但不能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发展我们的革命事业，相反会使我们脱离群众，失去群众，削弱以至葬送革命。今天，我们重温长冈乡关心群众生活的经验，就更加坚信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放生产力，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真理性。列宁早就讲到，人民群众在看不到革命将带给他们的实际好处时，是不会拥护和参加革命的。因此，他主张“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并讲如果不坚持这个原则，革命的每一步都将吃到苦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时期也讲过，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工农的生活得到改善。他通过在长冈乡的调查，进一步用实际的经验阐明了这个观点。他说：“长冈乡在战争动员上的伟大成绩，是与他们改良群众生活的成绩不可分离的。”可是多年来，马列主义关于革命的目的论述，关于革命的每一步都应体现革命目的的原理，也叫林彪、

“四人帮”篡改和歪曲得不成样子了。他们把革命和生产对立起来，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对立起来，胡说什么生活好了，“会出修正主义”，“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极力宣扬“富变修”、“怕富不怕穷”、“穿草鞋到共产主义”的谬论。他们打着革命的幌子，搞普遍贫困的假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反革命。这种空讲革命，不要生产，不顾群众生活的极左路线，使得我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今天，我们重温长冈乡在当年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改善群众生活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弄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真实意义，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在搞好当前国民经济调整和加速实现四化的同时，切实有效地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是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四)

毛泽东同志通过长冈乡等地的实际调查，还总结了长冈乡的干部善于把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与切实解决工作方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结合起来的经验。他指出：“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长冈乡的工作特点，正如毛主席总结的：“在于用全力去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结果能完全实现他们的任务，并且争取了最快的速度”。长冈乡的扩红运动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决定开展扩大红军运动。当时江西省委召开了紧急扩红动员会议，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亲自作了动员，要求我们有条件的县，可以搞模范师。兴国在会上第一个作了响应，决心打响第一炮，走在“扩红”的最前头。长冈乡的苏维埃主席接受了任务之后，

就连夜召开全乡党团员干部大会和活动积极分子大会，反复宣传“扩红”的意义。“先有国，后有家，踊跃当红军，保卫苏维埃”的口号鼓舞着每个适龄的青壮年。乡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妇女宣传队，红军家属委员会都出动，大会动员，流动演讲，个别宣传。动员工作由村做到户，“扩红”道理从老讲到小。全乡出现了一个“母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上前方”的热烈场面。但也有一户叫水发生的，尽管宣传队轮流去宣传，你出我进，接连不断，他都毫不动心。这天，宣传队长亲自到他家，通过他老婆了解到，水发生主要怕当兵受苦，放不下家，而不愿参军。宣传队长耐心启发他，红军和白军不同，红军是工农子弟兵，官兵一律平等，不打人、不骂人，互相照顾就像兄弟一样。参军之后，家里的事村里全帮助解决，保险照顾得比你在家还好。一席话说得小两口有点坐立不安了。宣传队长又继续说道：早报名光荣，迟报名也是光荣，现在全村只剩下你一个了，不报名当红军能坐得住吗？水发生同志猛的站起来了，一拍胸膛说：“去，我去报名！”结果这个村子成了“扩红”的“满堂红”。模范的长冈乡，不到三天，就有五十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刚好编成一个排，终于打响了“扩红”的头一炮，推动了全区全县。仅一个星期，兴国县的模范师就编成了。

长冈乡不仅在“扩红”运动中，坚持耐心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而且在完成其它的各项任务中，也都坚持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推销公债也是一个例子。当时，中央苏区为了支援前线，发展经济，发行了三百万经济建设公债，分给长冈的任务是五千元。由于乡干部始终坚持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先后召开了四次全村大会，还有个别宣传，反复讲明敌人的经济封锁和购买公债的意义，完全自愿认购，决不强迫摊派。结果群众踊跃购买，平均每人买了三元多，最多的一户买了四十五元，前后只用了十五天的时间，提前超额完成了这项任务。

长冈乡的干部不仅坚持说服教育的工作方法，而且采取了实

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完全抛弃了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长冈乡苏维埃担负着支前扩红、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群众生活、文化教育等各项艰巨任务，“他们是认真地在那里工作，他们是仔细的在那里解决问题，他们在革命面前真正负起了责任”。就拿“社会救济”这一项工作来说，长冈乡的同志就能根据不同的对象和情况，进行有区别的具体的募捐救济。长冈乡《调查》中记载道：“会员六一一。全乡只有约二十家没有加入互济会，这些多属“孤老”。救济的对象是“有火烧了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有三、四个人饿饭”的，“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等等。在救济方式上，也根据不同的实际要求，采取不同的做法。如：“今春一家失火，烧了一间半屋，捐了六串多钱给他。”而对“红军家属中生病困难的（无饿饭的），今夏募了十一串多钱。”对过去乞丐，现还很穷的请求互救会发钱发米救济的，每人每次多的三升，少的一升，今夏发了三四次。毛主席表彰了长冈乡的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具体有效的工作方法。他说：“在许多地方的苏维埃不注意社会救济工作，许多地方的互济会只知收月费不知救济群众困难的情形下，长冈乡苏维埃与互济会的社会救济是在最具体最实际的解决了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问题。”

毛泽东同志通过周密的调查，还总结了长冈乡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了便于联系群众，接受群众监督的行政区划和权力机构。长冈乡属于江西省兴国县上社区管辖。全乡分为长冈、塘背、新溪、泗网四个村。全乡共四三七户，在乡人口一四六四人。在当时那种交通、通讯落后的情况下，这种按照自然村为主并控制在一定范围的行政区域划分，是既适应战时“召之即来”、又便于集中领导和联系群众的要求的。

长冈乡的政权机关是建立在联系群众的基础之上的。长冈乡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乡代表大会。乡代表是由群众直接选举产生的。政府工作人员又由乡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这就发挥了群众监

督的作用。乡苏委员会，主要由主席、副主席、文书、中共支书与少共支书共五人组成常委会，负责领导全乡工作。乡政府每天除一名常委值班外，其余四人下村督促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和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较好地避免了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行动上的官僚主义。长冈乡还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建立了扩红、土地、山林、建设、教育、卫生等十五种委员会。这些不脱产却又担负实际工作的委员会是乡苏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使苏维埃连结了更广大的群众。”

长冈乡的工作所以能做得这样实际，这样具体，这样深受群众的拥护，并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和这里的乡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分不开的。长冈乡的干部在各项工作中，总是想在前头、干在前头，事事做群众的表率，处处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长冈乡的妇女代表兼赤卫排长黄传桃就是这样的典型代表。她担任“扩红”宣传队长以后，天天忙着宣传参军，日夜不落屋。有一天，无意中听到别人议论她：“光宣传别人，自己的儿子也人高树大为何不宣传？”她一听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只有十六岁，但也长得高大结实，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不动员自己的儿子报名，怎么能带动群众？回到家之后，提起了报名的事，她儿子高兴地一跳几尺高，拉着母亲说：“妈妈，报名的时候，说我十七岁了，不然报不上名。”黄传桃把不足年龄的儿子送去报名的消息立即传遍全乡，在她的实际带头作用和宣传鼓动下，立刻就有十几个妇女送子参军，都争着报了名。长冈乡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还表现在他们处处公而忘私。新溪村代表主任彭国亮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好干部。一九三一年春季的一天，彭国亮同志召开新溪村群众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动员群众踊跃借粮支援红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他说：“我们宁愿自己不吃，也要让红军吃饱，好消灭白狗子，保卫根据地。”会上，他毫不犹豫地带头把家里仅有的一百斤稻谷全部借给红军。而他自己则吃青菜杂粮度日。彭国亮同志这种公而忘私的高贵品质，使

群众深受教育。在他的带动下，新溪村很快就借出了上千斤粮食，支援了革命战争。长冈乡的干部总是以艰苦为乐，以朴素为荣。乡苏维埃的五个干部从不脱产，不脱离实际，轮流在乡苏办公。他们长年累月头戴斗笠，脚穿草鞋，自带饭菜，风里来、雨里去，一心一意为人民，艰苦奋斗干革命。长冈乡的干部经常参加劳动与群众血肉相连，尽管他们都是来自群众，不拿薪、不脱产，但他们仍然坚持义务劳动，每逢星期六就帮助红军家属劳动生产，挑水砍柴，无所不做。真正做到心不离群众，手不离劳动。坚持做到十带头（一带头学习军事；二带头参军参战；三带头执行勤务；四带头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五带头慰劳捐献；六带头遵守党的纪律；七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八带头购买公债；九带头优待红军家属；十带头集股办合作社）。当时，群众对革命老根据地的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常用这样的山歌来赞扬他们：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著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打灯笼。

苏区干部的这种优良的工作作风，是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实际斗争中培养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在长冈调查时，始终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群众中，生活在群众中。他不让人们知道他的姓名身份，也不要乡干部迎送陪同。他相信群众，尊重客观实际，把调查研究当成认识客观规律，制定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的“最可靠的办法”。因此他在每一次调查会上，总是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家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如实反映情况。当年参加过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召开的第一个调查会的钟起松同志，这次也参加了五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他在《列宁小学》旧址介绍了当时开会调查的情景。他说毛主席开会总是反复耐心地启发到会同志，开门见山把会议目的讲得清清楚楚。毛主席说，这次到长冈乡来，是调查情况的，今天请大家来开座谈

会，有许多问题要向大家请教。说着，他便将几张写好提纲的纸和一个本子摊在桌子上，提出一个个问题，让大家随便谈。会议不拘形式，一开始就让我们先讲。起初，大家还感到有点拘束，静了很久没有人发言。这时，毛主席又笑了笑，说道：“知道多少、就谈多少，做了什么就讲什么，都是自己人不要拘束嘛！”乡苏维埃主席先发了言，他当时详详细细地把长冈乡的基本情况和工作情况作了汇报。接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抢着发言了。毛主席精神贯注地听，详详细细地记。他口里问，手里写，和大家一起讨论问题；有时停下笔来，打算盘计数字。调查结束时，还将自己调查中记下来的东西，一字一句，一段一段地反复念给大家听，再三问我们，“记清了没有？是不是这样？有没有错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当年这种甘当群众小學生的谦虚态度，严肃认真的工作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深地留在长冈乡人民的记忆中。

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在长冈乡历时七天的调查中，还经常坚持参加劳动。长冈岭的人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在一个久旱不雨的清晨，毛泽东同志带领检查团的同志，头戴斗笠，光着脚板，卷着袖子和裤管，来到了花生地里。他们有的帮助老百姓捡花生，有的帮助抖花生土，还有的拿着铁锹帮着挖，群众做什么，他们就帮什么，在劳动中作调查，和群众有说有笑，亲密无间。虽然当时群众还不知道这些人中有毛泽东同志，但他们都知道是中央来的检查团的同志，怎能让客人来劳动呢？因此有许多人围拢来抢他们的工具，不让他们劳动。这时毛泽东同志一边劳动一边对大家说：“干革命嘛，大家是一家人，干干活有什么关系。干部应该和群众一起劳动”。从此，检查团的同志经常和长冈乡的干部一起参加劳动。

长冈乡把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与切实解决工作方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结合起来的经验，说明我们的党是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原则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是一个具有“实事

求是”“群众路线”“社会公仆”光荣传统的党。但是党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总是和党的路线联系在一起的。党内历次“左”的和右的错误路线，无不败坏党的传统和作风。王明时期如此，他们只知道发布“左”的命令，作些空的决议，“却不知道任何一个乡苏市苏工作的实际内容”，使得许多地方政府的机关中产生了敷衍塞责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强迫命令，严重妨碍了党的各项任务的完成。到了林彪、“四人帮”时期更是如此。他们完全颠倒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极端地夸大主观和精神的作用，宣扬天才论、意志论，从王明的“本本主义”发展到“句句是真理”的荒谬地步。他们根本否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英雄，根本否认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认识路线；根本否认党的“社会公仆”的光荣传统，把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艰苦奋斗中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完全丢光弃尽。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崭新任务，它已向我们尖锐地提出了许多急待研究的新情况和急待解决的新问题。如果我们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脚踏实地的作调查研究，不具体而又实际的进行工作，不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就不可能取得经济调整 and 四个现代化的领导权。现在党的三中全会已经为四化制定了新的路线和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蓝图已经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从政治上描述伟大任务的时期已经过去，实际执行任务的时候已经来到。”让我们在亲手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军中，时刻铭记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一步实际运动胜过一打纲领”，发扬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当年长冈乡同志那种坚持在实际工作中调查和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的工作作风，克服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脱稿

一九八一年五月修改

清明怀念周总理

方志纯

离一九七六年的清明节，已经整整五年了。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断肠的清明节啊。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是一个寒冷的春天。清明节那天的南昌市，天空暗淡，薄雾蒙蒙，细雨纷飞，乍暖还寒，我挪动着沉重的双腿，向革命烈士纪念馆走去。路上人群三三两两，不时发出悲怆的抽泣和低咽声，走在这沉闷情绪的队伍中，我不由得想起了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革命烈士纪念馆前，是一个红军战士的塑雕，这是多么亲切而又难忘的容貌啊：在赣东北的密林里，在闽赣根据地的峻岭中，在陕甘宁的高原上，在晋察冀的黄河边，有多少这样形象的战友啊！我们曾一同在困苦中辗转，一同在胜利中欢呼。可是，而今呢，他们中不少人的身躯没有了，音容消失了，静静地躺在祖国的大地之下，只有这再现烈士形象的钢铁之躯，顶天立地在社会主义祖国的鲜红旗帜之下。想起这五十年来牺牲的战友，双眼不知不觉地涌出了泪水，我的视线被泪水挡住，变得模糊不清。

朦胧中，红军战士的塑像，仿佛是周总理的伟大身躯，他象以前一样，亲切地向我走来。历历往事，不禁又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一九二七年七月廿九日，那时，我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作机要交通员。这天下午，省委负责同志叫我送一个文件到周恩来同志那里去，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拔腿就跑。在干家前巷女职（现为南昌市八中），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周恩来同志。他年轻而英俊，既有政治家的潇洒风度，又有

军人的威严气质，目光深邃而炯炯有神，给人以遇事沉着镇定、处事深思熟虑之感——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的印象。当时，省委机关和周恩来同志处都很忙，气氛都很紧张。我们知道，党已经决定要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但不知道起义的具体时间，更不知道周恩来同志这次来南昌，就是来领导和组织武装起义的。周恩来同志问明了我的来意，随即叫秘书签收了文件，便拿着文件走进里屋去了。

“八一”起义胜利后，南昌市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我党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我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又一次见到了他：雄姿英发，谈笑风生，嘴角上满挂着胜利的微笑，眉宇间洋溢着高昂的斗志！这就是这次名震中外的武装起义的总导演——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

“方校长，您好！”一声低沉而亲切的叫唤，打断了我的思路。我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几个烈士子弟学校的学生——全国解放后，江西省人民政府花了很大的精力，将能够找到的烈士子弟，全部收容起来，办了几所烈士子弟学校和一所工农中学，我曾兼任省工农中学的校长。他们每年都要邀集起来，到革命烈士纪念堂来祭奠父兄。望着这些先烈的后代，想起牺牲的战友，我的眼睛又湿润了。

“方校长，他们不让我们悼念周总理！”一个小伙子愤怒地轻轻地告诉我。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我望着他，啊！是他，我还记得这个学生，他的父亲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

第四次反“围剿”……黎川……周恩来同志的接见……告别了这些年轻人，离开了革命烈士纪念堂，我又想起了第四次反“围剿”前夕，周恩来同志在黎川接见我的情景。

一九三三年，赣东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到中央根据地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战斗。我受赣东北党组织方志敏同志委托，随军前往，准备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部队在黎川与彭德怀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团会师。在欢迎会上，周恩来、朱德、项英、彭德怀等同志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恩来同志还特意召集了红十军排以上干部开会，作了重要讲话。

仅仅隔了五年多一点的时间，周恩来同志的样子可变多了：满脸的大胡子，掩盖了他那张英俊的面容；只有那明亮秀澈的双眼，依然放射着深沉和智慧的光芒；头戴军帽，身穿军装，显得更加威武。

红十军的战士，基本上都是赣东北地区的农民子弟，他们不愿离开家乡，所以对这次调动有点情绪。周恩来同志教育大家说，我们是工农的子弟兵，工人阶级的眼光是远大的，胸怀是宽阔的；我们是共产党的武装，共产党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奋斗目标的。所以，我们的眼睛，不能光看着赣东北，要看到全中国，要看到所有的苏区，要为解放全中国而英勇奋战。周恩来同志特别是对党员干部强调说，调红十军到中央苏区来，是中央的决定，党员同志要绝对服从组织的决定。不仅自己要克服家乡观念，而且要说服党外的同志，要做局部服从全局的模范。

因为红十军是第一次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所以周恩来同志特别强调要加强团结。他说，红十军是方志敏同志在艰难困苦中创建起来的队伍，有很好的作风。又说，彭德怀同志率领下的三军团，打过许多大仗、硬仗，有很强的战斗力。现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即将打响，大家一定要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奋战，打好这一仗。

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组织指挥下，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个战役中，红十军参加了宜黄的黄陂之战、南城的硝石之战，福建的光泽之战，打得很好，受到了上级的表扬。这与周恩来同志战前的思想工作是分不开的。

从革命烈士纪念馆到我的住所，只有几百米，没想到却走的气喘嘘嘘了。“老了”！我心里默默地叹惜着。想当年，我们走

了多少路啊：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我从江西走到福建，又从福建走到延安，从延安竟走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多么难忘的莫斯科啊，因为周恩来同志曾在这里接见过我。

那是一九三九年秋天，周恩来同志来苏联治右臂骨伤。一天，在任弼时同志的陪同下，他来到莫斯科郊外的库其诺，共产国际党校就在这里。当时，我在这里学习。

莫斯科的秋天，是迷人的季节。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蔚蓝的天空，金色的阳光，翠绿的林荫，拥抱着俄罗斯民族风格的建筑。林荫深处的公路上，驶来一辆黑色小汽车，车门打开，健步走出了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

周副主席那一把“马克思式”的大胡子没有了，更加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挨个地向我们一一握手，亲切地向我们一一问好。国外迎贵宾，他乡会亲人，我们是何等地兴奋啊。接见完全体同志后，周副主席又把我们叫到他休息的地方。

“志敏同志的后代怎样？”周副主席关切地问道。我把我所知道的方志敏同志的夫人及小孩的情况，向周副主席一一作了汇报。他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说：“好，找到了就好”。

接着，我们又谈起了赣东北根据地的情况，周副主席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赣东北这地方好，这地方群众基础很好，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他们还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我们是一九三八年初离开祖国的，当时，“西安事变”刚发生没多久。到苏联后，同志们对我党正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还不很理解，特别是对放走蒋介石想不通。“现在想通了吗？”周副主席笑着问我。我红着脸坦白地说：“还是想不太通。”周副主席温和地说：“你这个政治班班长都想不通，怎么去做人家的思想工作呢！”接着，他详细地给我讲述了“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经过；耐心地阐述了我党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及处理

“西安事变”的方针；精辟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后将出现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好形势。

周副主席告诉我说，国共合作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我党决定组织新四军。我们派了许多同志到南方，召集在各山头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下山，这些同志因为长期在山里，消息闭塞，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当派去的同志叫他们下山时，还发生了不少误会，弄出了许多笑话呢。如陈毅同志，被派往湘赣根据地，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的谭余保同志，以为他是来为国民党作“说客”的，将陈毅同志抓起来，差点杀头了。我们听到这里，都憋不住笑了起来。周副主席制止我们的笑声，对我说，你别笑，还真有杀头的呢！你们赣东北根据地的杨文翰，就将党派去叫他们下山的人杀掉了。停了一下，周副主席感慨万端地说，杨文翰同志比谭余保还“顽固”，坚持到抗战还不下山。当然，错杀了人，这也不能怪他们罗！

——回国以后，我才知道，方志敏同志率领的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杨文翰等同志领导一部分武装，在赣东北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八年，江西省委派关英去赣东北，传达省委指示，要杨文翰同志下山，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关英在革命低潮时，曾脱离过队伍，杨文翰一见他上山就恼火，又见他动员部队下山，还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遂认为关英是“叛徒”，是来“劝降”的，就将关英杀掉了。

话题转到我们在苏联的情况，周副主席亲切地询问了我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情况。突然，他问我：“听说，我们有的同志在生活上有过高的要求，对学校提意见了？”我开始愣了一下，但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原来，苏芬战争期间，苏联国内的副食品供应比较紧张，影响到我们学校的伙食也就差了一些，我们有个同志就讲了几句牢骚话。没想到，这话被一个懂得中国话的苏联工友听到了，反映到了校方的苏共同志，苏共的同志又将此事反映给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任弼时同志还为此事担了担

子，作过自我批评。我怀着内疚的心情向周副主席及任弼时同志检讨说：“这件事怪我们，是我们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够。”周副主席严肃地对我说：“你们在苏联的生活，已经够好的了，和在国内的同志比，简直不可同口而语。可你们还不满足，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贪图享受，这是很不应该的。何况，你们在这里，一言一行，还牵涉到两党的关系，说话、做事，就更要谨慎。”他语重心长地接着说：“你们在苏联能过上这样好的生活，是很幸福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来！”

在谈到我们的学习时，周副主席又对我们寄予极大的期望：他说，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不高，我们许多同志都是工农出身，连字都认不到，学理论就更谈不上。你们有这样的学习条件，一定要抓紧时间，认真学习。现在，国内各根据地、各战场都很需要人，你们学习结束后，还有许多工作等着你们去做呢。

不知不觉，两个来钟头就过去了。我站起来向周副主席告辞。周副主席握着我的手说：“好吧，再见！志纯同志，延安见！”

我们果然又见面了，但不是在延安，而是在西柏坡。

一九四一年，我从苏联回国路过新疆时，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无理逮捕入狱。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才在党中央的营救及周恩来同志的交涉下，争得无条件释放出狱。回到延安时，周副主席还在外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我在中央社会部及中央卫戍司令部工作。我所在的部队，是担负着警卫党中央机关及中央首长的任务，我得以有机会经常在周副主席身边。

一九四九年初，周副主席有一次碰到我，关心地询问我和彭总相处得怎样？因为当时担负警卫任务的中央警卫团，名义上是归中央卫戍司令部领导（司令员由杨尚昆、政委由刘少奇同志

兼任，我任参谋长），但实际上，一个团的兵力是无法完成这样重大的警卫任务的。因此，在军事行动方面，该部隶属于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彭德怀同志是一位很威严的将军，不了解他的人，觉得他很严肃，很难接近，所以周副主席关心地问我和彭老总相处的情况。我向他报告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土地革命时期，我带的部队归他指挥过。”周副主席听后，放心地点了点头。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周副主席把我和刘辉山（中央警卫团团团长）同志找去，要我们汇报有关大会保卫工作的情况。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秘密召开的。我们既要动员群众，做好保卫工作，又不能大张旗鼓地宣传，以防泄密，当时，西柏坡外围百里之外便是国民党的部队。这些，都给警卫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周副主席详细地询问了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周副主席关切地问道：“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我们向周副主席坚决地表示：“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副主席看着我们，既批评又关心地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我报告说：“有聂荣臻同志安排了足够的兵力在外围把守大门，敌人从地面是进不来的。”停了一下，我忧虑地说：“就怕敌人空袭。”周副主席接着说：“要有这个准备，如果敌人空降部队，怎么办？”我把我们的准备工作，向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在西柏坡周围五县，除部队外，民兵也进行了组织动员，加强了装备。同时，我们还号召群众准备了一些土武器，象梭标啦、大刀啦，都磨洗一新。为了打敌人的空降兵和骑兵，我们还特地做了一些“狼牙棒”——这东西打骑兵、打空降兵、打步兵都很好。周副主席听后，笑着说：“好嘛，我们就用这‘狼牙棒’来打狼，如果敌人敢来，就叫他有来无归！”接着，我们高兴地向周副主席告报说：“这地方群众基础很好，他们看到我们加强

警卫，都知道有重要活动，都很自觉地配合我们。”周副主席高兴地地点了点头，指示我们说：“对罗，保卫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

最后，周副主席强调说：“这次警卫任务很重大，我给你们提三条要求：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又不要神秘。”

在周副主席的亲自组织指挥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警卫七届二中全会的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国解放后，给我上最生动而又最深刻的艰苦奋斗传统教育课的，又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五四年，我从江西来到北京，参加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议。大会结束时，工作人员高兴地宣布说，今天中午，周总理请大家吃饭！我们听后，都欢呼雀跃起来。我心里想，总理请我们吃饭，没有山珍海味，也肯定是美味佳肴，这次可以饱饱口福了。谁知，当我们走进中南海一看，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相对愕然。原来，餐桌上除了馒头、煎饼和一大盆粉丝、白菜加肉片的大杂烩汤之外，别无其他菜肴。大家好象有点怀疑，正在这时，周总理走进了宴会厅，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总理，多少颗心在盼望着，盼望着总理能在自己这一桌入席啊！走过来了！总理朝我们这一桌走过来了，他高兴地握了握我的手，环顾了一下四周，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坐下来就餐。我望着总理消瘦的面颊，眼眶里立即充满了泪花。总理笑着说：“吃吧，没什么好的招待同志们！”说着拿起馒头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敬爱的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艰苦奋斗的最高楷模。这一餐，我吃得特别多，特别饱。我们正在狼吞虎咽时，“咔嚓”一声，摄影师给我们留下了这难忘的场面。可惜，这张照片在文化大

革命中被抄家抄走，现在下落不明了。

啊，照片，我想起来了：我这里还幸存着几帧我和周总理在江西活动的照片。我把相夹找来，一页一页地翻起来……

这是一张周总理在庐山小憩的照片。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周总理没日没夜地连续工作二十多天了。我们真担心影响他的身体。有一天，我和周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好了，决定晚饭后请总理出去散散步，“强迫”他休息一下。当我们出现在总理办公室时，总理看看我们，会心地笑着说：“看样子，已经串通好了，不走也得走罗！”我只是笑，没吱声。“好吧，出去走一走。”他象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说着，健步跨出了办公室。

我们跟随着周总理，来到牯岭街上。周总理信步走进一家商店，服务员都高兴地迎上来。周总理和他们握手问候，接着，便和他们攀谈起来，从庐山的今昔问到职工的生活，从商店的营业谈到市场的繁荣。周总理环视了一下货柜，对我说：“庐山可以利用山上的奇藤异竹，做些工艺品嘛。”我赶忙答应着。回过头，总理又和营业员聊起来。我一看，这哪里是休息，这不是开座谈会来了吗？于是，我们又请总理出去走走。走进牯岭街，我们便故意引着总理向大天池的方向走去，这里行人稀少，环境也比较幽静，可以让总理轻松轻松。

周总理站在大天池的山坡上，面对鄱阳湖，极目远眺。傍晚的鄱阳湖多美呀，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湖光山色，分外妖娆。我知道，总理的才赋很高，也许，他正在吟诗索句，便没去打扰他。突然，他朝一条小径走去。我顺着路一看，原来是一个农民挑着一担柴，从山坡走下来。周总理走过去，和他交谈了几句，便接过扁担来。我和警卫人员都走上去，总理知道我们想干什么，用目光制止了我们，然后，一蹲身，一挺腰，挑起柴担，健步向前走去！我望着总理肩上的担子，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我仿佛看到：大革命失败以后，雄姿英发的前敌委员会周书

记，用这副肩膀，担负着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的重任，就是这样从庐山走过的；抗日战争时期，叱咤风云的周副主席，用这副肩膀，担负着代表中共与美蒋谈判的重任，也是这样在庐山走过的；多少年来，敬爱的周总理，用这副肩膀，与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领导中国人民挑走了三座大山，现在，又肩负着建设新中国的重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是重任在肩，阔步向前！

这一张，是周总理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的照片。

一九六一年庐山会议后，周总理下山，住在江西宾馆。九月十八日，我陪总理去参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总理仔细地看了馆内的每一件展品，对纪念馆的展出，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周总理怀着崇敬的心情说，要宣传井冈山，要宣传毛主席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光辉思想，当时提出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只有毛主席，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周总理说到这里时，使我想起了一九五七年，他修改审订《八一起义》的编写提纲中，亲笔加上的一段话：起义胜利后，“由于当时领导者没有能够坚持发动广大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政治路线，而采取单纯军事向南挺进的方针”。周总理几次谈到“八一”起义时，都和我说过，要把“八一起义”和井冈山联起来，要宣传井冈山。在参观时，周总理还十分严肃地指出，不要突出宣传我。“八一”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首先是中央决定的正确。“八一”起义是我和朱老总、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共同组织领导的。周总理的这一谦虚精神是一贯的。在审订《八一起义》提纲时，有一段话的原文是：党为了挽救革命的失败，决定由周恩来同志在南昌举行起义。周总理在“举行起义”前加上了：“以贺龙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和朱德同志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部分为基础”。提纲中还有一段话，原文为：“七月三十一日晚上……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周总理在“周恩来”后面加

上了“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名字。这些改动，体现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是何等的谦虚和实事求是精神啊。

从“八一起义纪念馆”出来，我们又来到总理当年住过的地方——千家前巷女子职业学校。我对总理说：“八一起义前，我给您送文件，曾在这里第一次见到您。”总理笑着说：“是嘛？我是记不得了。”接着，他感慨万端地说：“不容易啊，我们都相隔三十二年，才故地重聚首。”

这是一张周总理和江西省杂技团演员在一起的照片。

——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后，在回来的路上，总理对我说：“志纯同志，给我准备几席酒，晚上我要请客。”我按照总理的吩咐准备好了。我以为总理要请当时尚在南昌休息的参加庐山会议的各地领导同志，结果不是。总理请的全是为庐山会议服务的工作人员。我们为中央的会议，作了一些应作的服务性工作，总理却始终记挂在心，连普通服务员也没忘记。敬爱的周总理，这样平等待人，尊重平凡的工作，我们都深受感动。

宴会后，总理又请大家出席文娱晚会。节目不很精采，但气氛却很活跃。那天晚上，总理特别高兴。有一个魔术节目，需要一个观众拿块表出来，总理高兴地将自己手腕上的表递了上去。节目表演完后，演员将表送还给总理，总理兴高彩烈地说：“不要了，送给你们作个纪念。希望你们为江西人民演更多的好节目。”我深深知道总理这样做的含义，原来，这个杂技团是上海支援我们的，有些同志不习惯在江西工作，想回上海。总理这样做，实际上是代我们作他们的思想工作。我不由得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看了看周总理，心里在想：敬爱的周总理作思想工作，是何等的深入细致，又是何等地讲究方式方法，这是多么高超的工作艺术啊！

啊，这里还有一张周总理站在省政府大楼上的照片。

——那是一九六一年的一天，我们领着周总理登上省政府大楼的七楼顶上，俯瞰南昌全城。英雄城南昌多美啊：市区，房屋

鳞次栉比；城边，赣水澄清似练；南面，浙赣线逶迤而来；北边，南浔路隔江相望。总理突然好象发现了什么，问邵式平同志：“浙赣线和南浔线没联起来吗？”邵省长汇报说：“没有，我们早就想联起来，但省里没有这个力量。如果这两条铁路线能接起来，那对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是大有益处的。”周总理考虑了一下，马上叫人请正在南昌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同志来了。总理询问滕代远同志，赣江大桥有没有必要修？现在能不能腾出力量来修。在滕代远同志作了肯定的回答后，总理马上定了下来：修建赣江铁路大桥。现在，每当我看看这座钢铁大桥时，我便想起了毛泽东同志一段话：“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中，为了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下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架了多少各式各样的“桥”啊！

最令我难忘的是，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

那是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杭州会议后，毛主席要找我们华东几个省的有关同志谈话，我们立即赶到了杭州。六月的杭州，万紫千红，百花争艳。但这时，谁也没有心思去游山玩水了，管它什么西湖西子，淡妆浓抹，我们都预感到一场大风暴要来了。这次接见，总理没有参加。毛主席接见后，我去看望总理，并向总理辞行，总理亲切地握着我的手，微笑地对我说：“志纯同志，再见！”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总理对我的最后一次微笑，最后一次握手，最后一次见面！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我正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榻上，我对着周总理那围着黑边的照片，良久地、默默地站着，成串的眼泪，流着无限的哀思，缅怀着总理对我的亲切教导。

清明节的时候，我因为到烈士纪念堂前路过，偶尔碰上几个烈士子弟学校的学生，竟被打成南昌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

我的心，被巨大的痛楚撕裂着：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总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悼念共和国的总理，竟成了非法的“黑”举动！总理如果九泉有知，灵魂是不得安宁的！

“四人帮”想压制群众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结果，他们终于被蕴藏在群众中的怒火，象火山爆发一样而焚毁了！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来了，不断的雨丝象是无限的愁思，我不由得又想起了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一九八一年清明节）

难忘的一个冬天

罗孟文

这是难忘的一九三四年的冬天。主力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北上抗日已经一个多月了。我当时在赣南省委担任组织部长，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和一部分同志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对敌斗争。

一天，中央局贺昌同志来到赣南省委，他找我去谈工作。进得门来，一幅战争形势的地图，触目地摆在桌面上，只要注目一看，就会感觉到中央苏区正处在一个大战前夜的紧要关头。贺昌同志招呼我坐下，眼睛望着地图，神情严肃地说：

“主力红军北上后，整个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变得很严重了。目前，敌人又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新的攻势，扬言要在最短的期限内，一举歼灭中央苏区和红军，以平息他们的后患。”

贺昌同志把手一挥，加重语气地说：

“我们一定不容许敌人这个阴谋得逞，要给予坚决的反击。我们要牵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和支援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这就是我们的任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

接着，他用手指着地图上一小块狭长的地方，对我说：“这里是扬赣苏区，北靠泰和，南临赣州，它象一把利剑，插在敌人的后方。红军北上后，这里已成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区域，对牵制和打击敌人，有重要的作用。敌人正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分割扬赣苏区，消灭扬赣苏区，我们则要努力坚持该地的斗争。中央局经过研究，认为你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干部，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决定派你回到扬赣，担任特委书记兼第四军分区的政委，你有什么意见吗？”

我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说：“我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并且保证完成任务！”

贺昌同志的神态还是那么沉静，但脸上露出了笑容，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罗孟文同志，形势是严重的，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好，祝你成功！”

第二天，在细雨迷蒙中，我怀着急切的心情，踏着矫健的步伐，奔赴我所熟悉的扬赣苏区。

扬赣苏区，包括赣县和扬殷两个县，它的中心，位于兴国、赣县、万安、泰和四县交界的地方——均村。东北自兴国的罗坑到西南赣县的茅店，有一百六、七十华里；东南自兴国的隆坪到西北的黄塘、武索、罗园、焦园，有八、九十华里；从东南到西北面又环绕着一条兴国江和赣江。境内山峦绵延，丘陵起伏，地势险要，是捍卫中央苏区的一堵屏风。这个地区，从秋收暴动起，就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熊熊火炬。经过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革命的烽火越烧越旺，在一、二、三、四、五次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中，军民团结一致，杀敌非常英勇。战斗打得最紧张时，党中央曾派罗荣桓、邓子恢、康克清等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黄塘的战争中，军分区司令员陈俊益同志带领部队冲锋陷阵，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自己也不幸中弹英勇地牺牲了。经过艰苦的浴血苦战，终于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取得了几次反“围剿”的光辉胜利。

主力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象对待其他的革命根据地一样，集中了大量的反革命武装，对扬赣苏区的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在这个方圆不到三百里的地区，陈兵五个师：西南，有广东军余汉谋所部的第一、二师；东北，有中央军的二十八师和七十九师；西北，有伪保安第五师，此外，还有各地的地主武装和“铲共团”。我们当时的兵力，仅有一个刚刚改编的红色独立十三团，两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

一个政治保卫队和二十多个区干队。全区只有七百多条枪。这就是说，敌人不仅在装备上、弹药补充上超过我们，而且在数量上也比我们大数十倍。情况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们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几年的革命战争经验，特别是，有着毛主席的军事游击战术，我们仍然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一九三五年二月，扬赣特委领导的红军独立十三团，在扬殷县的黄旺坑与广东军余汉谋的部队，进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便转移到扬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均村的北面西洋山休整。不久，敌人又纠集了第二十八师和保安第五师前来围攻，企图断绝我们与群众的联系和粮食供应，于是我们又与敌人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我们为了摆脱不利的地势，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并有效地反击敌人，特委便决定先突围出去，再把部队分散开来展开游击活动。突围之后，敌人还是紧紧追踪，分头围攻我们，采取“移民并村”、“步步为营”、“碉堡封锁”、“三光政策”、“自新政策”等毒辣手段，来破坏我们党的地方组织，隔绝我们与群众的联系。这样一来，战斗更紧张了，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

战斗继续了两个月，到了三月初，敌人的进攻比较松缓下来。我们一方面让部队抓紧时间进行休整，一方面为了摸透敌人放松进攻的原因，就派人四出侦察。不几天，情况弄清楚了：原来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领导红二团、红四团、自宁都向公（略）、万（安）、兴（国）根据地的崇贤挺进，敌人急忙从扬赣一带抽走兵力去堵击这支部队。获得这些情况后，我马上召开特委紧急会议，研究形势的变化。我们分析：敌人收缩扬赣地区的兵力只是暂时的情况，在堵击了红二、四团以后，必然会增加对红十三团的围攻，那时红十三团就将处于更加不利的环境。因此，必须迅速地突过敌人的封锁线，尽快地摆脱不利的地理环境。至于往哪个方向突围好，往西有赣江，往南又是兴国、于都、信丰等江会合的赣江，往北是白区，看来只有向东：一方面

可以去公万兴苏区，到兴国；另一方面，往东很可能与曾山同志会合。这样，不但可以帮助红二、四团反击敌人，而且，对我们目前与赣南省委失去联系，今后该怎么办，急需上级指示的期望，也可能得到满足。特委会议经过充分的研究，最后决定率领第四军分区、红十三团、扬殷独立营、机关干部和群众向东转移，突过敌人的封锁线。于是，我们很快把部队集拢到义渡，整编成四个连，决定从蓝田突过封锁线；另一路由扬殷独立营负责保护干部队和跟随我们的几百群众，由墩丘以东的黄土坳突过封锁线，敌人的封锁线是沿着兴（国）、泰（和）公路建立的，公路两边驻有重兵，山头、路口筑有碉堡，关隘要道则碉堡成群，组织交叉火力严加封锁。因此，决定在突过封锁线的时候，我们不主动打枪，以免在地形不利的情况下受到重大损失，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而加以阻击，就是拼刺刀、拼手榴弹，也要突过去，决不后退。

三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大约十点多钟，两路部队同时从野猪窝出发。我率领的这一路前面派了一个尖兵排，全部好枪好弹，每人两颗手榴弹，一把马刀，由一营营长肖炳泉和第一连连长马建章带领。尖兵后面，一、二、三、四连顺序而行。第四连担任后卫，出发时晚走一步，与第三连大约保持一里路的距离。这天晚上虽是月中天气，但天上乌云密布，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北风呼呼地叫着，细雨一阵阵飘来，四下里漆黑一片，几步以外就看不清人影。为了便于黑暗中联络，每人颈上围一条白毛巾，尖兵排与后面的部队只相距百来步。由于尖兵和一、二、三连的战士都是轻装，行军速度较快；第四连的战士要背负一些军用物资，走得比较缓慢，尖兵和一、二、三连虽几次停下来等候一阵，但是，距离还是渐渐地拉远了。

部队爬了几个山头，又走了一段小路，就插进长龙后山腰上去了。这条路走起来很不方便，一边是崇山峻岭，一边是又黑又深的悬崖，是敌人碉堡火力射击点，当中一条羊肠石山路，又窄

又滑，稍不注意就会摔在二、三十丈深的山谷里。人掉下去很难保存性命，就是不死，也难爬起来。因此，我一再传话下去，要同志们特别小心。虽然如此，还是有人摔下崖去。第二连一个侯班长，为了拉一个同志，由于路太陡、又滑，难以立稳，拉时又用力过大，一滑，他和那个同志都掉下深谷了。这事发生不久，在我前面的一个小鬼，走急了，碰在一块石头上，身子往前一栽，眼看要掉下去，我连忙抢上一步，拖住他的右手，那知我用力过猛，虽然他转身跳上来了，我却被摔下去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睁开眼睛，就听见有人喊：“罗政委，罗政委！”我仔细一听，这是小鬼不停地在喊。这时我才想到我原来是被摔下来了。我自言自语：“快起来，爬上去！赶上部队！”我随手抓住树枝，坐起来，只觉得全身摇摇荡荡，双脚也不能着地，用手四处一摸，哦！原来我是落在一棵松树上。我想：“这棵松树有灵，象马克思一只巨掌，把我托住了。”这时，我才摸到，裤子被松枝挂破了，脸上也不知是汗是血，象小虫似的往下爬。

“罗政委！罗政委！”小鬼边喊边哭的声音，又清脆地传来。

“小鬼，我在这里。”我高兴地回答说。

由于我身上除了一支匣子枪、三斤炒米、六十元公家的银洋外，什么也没有，加之，翻山爬岭早已是家常便饭了。因此，不到一袋烟的工夫，我就爬上来了，大家一看，都轻轻地舒了口气，小鬼也破涕为笑了。

走过这一段傍山路，四连和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我派出一个通讯员与四连联系，要他们快步跟上。谁知过了半个多小时，不见通讯员回来，后面竟突然响起了枪声。“糟糕！敌人截住四连了。”我心里急得一团火似的，忙喊来一个通讯员说：“快步到四连去，另告诉二连贺副连长：留一个排抵抗敌人，掩护其他部队前进。”通讯员去后，不久枪声更密集起来。我立即

传口令到尖兵排和一、二、三连中去：“路上必须加倍警戒，准备随时与来犯的敌人战斗。”后面的枪声愈隔愈远了，看来四连已被包围，而尖兵排这时已到达离碉堡线两里路的小河边，过河之后，便进入敌人的碉堡群了，要抽调部队去援救四连已不可能，而且会影响全军的行动计划。我心里象油煎火烧一样，焦急不安，只得又派出一个通讯员，要他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一定要和四连取得联系，赶回来报告四连的情况。

部队继续向小河边前进。小河边敌人放了一个步哨。我们的尖兵逼近河沿时，他们影影绰绰看见我们的队伍，便吓得忘了放枪报警，不要命地跑，我们几个尖兵快步追过去，一阵劈刺的声音响过之后，四个敌哨便倒在河岸边。

前面的同志走了不几步，突然都停止不前。奇怪！我抢到头里一看，原来是木桥被敌人毁掉了。

初春夜晚，加上又是风雨，气候更是寒冷。我用脚往水里一探，河水透过草鞋，冰冷刺骨。但是架桥没有办法，时间也不允许，因此，我只好说：

“同志们！水不太冷，我们准备涉水冲过河去。”就这样，我们一个牵着一个，在水里前进。

过了河不远，就是石阶路的出口处。路下边又有一条约三十来米宽的小河，水流湍急。路两边是高耸的山峦，隔河对峙。敌人的碉堡群，就建筑在河两边山峦上，象一把多齿的铁钳，扼住了石阶路的咽喉。部队必须从这里冲过封锁线，然后越过兴泰公路，插入公路东面的群山中。因此，过第二条河之后，大家的心情不由得更加紧张起来，脚步自然加快了。

马建章连长提着一支冲锋枪，走在尖兵排的最前面。临近敌人的碉堡线时，尖兵们都弯下腰来疾走。石阶路旁边有一座高山，山上有一个大碉堡，山腰上有一个庙，庙里驻扎了敌人，可能是敌人的连部；山脚下安了一个步哨，用砖头垒了一个哨位。尖兵们象一只只矫健的山鹰，一下子就不声不响地来到了敌哨跟

前，吓得敌哨慌张地端起枪，声音发抖地叫道：

“哪……哪一个？”

“第六师的。”马建章大声回答。匪军第六师是北方部队。敌哨听见回答的人是北方口音，就以为是自己人，把瞄准的枪放下，平和地问道：

“喂，你们上哪儿去？”

“巡逻回来！”说着，马建章就快步跳到敌人背后，左手挽住那贼的脖子，右手举起枪托，朝他头上一气猛打，三五下就将他干掉了。

接着，马建章领着尖兵们挺胸阔步地跨过了敌哨。剪断了敌人的电话线，迅速地走出了封锁线。越过封锁线不远，在一条水沟里隐蔽下来，找好便于射击的地形，准备接应后续部队。

不一会，一、二连进到了碉堡群中的封锁线，迎面碰到一个敌兵，可能是来换哨的；那敌人发现过来了大队人马，知道是红军部队，慌慌张张地转身朝山上跑，一边打了三枪，发出报警的信号。接着只听见高山上碉堡里的人声嘈杂，海螺狂鸣，一刹时，河两岸的山上都“呜呜”地响起海螺来了。这时，部队已在奔跑着前进，敌人从两岸的碉堡里，用步枪、机关枪盲目地向我们射击，我们不理睬它，继续向前猛冲。我冲过封锁线后，便跳入旱水沟里，指挥尖兵排掩护后面部队冲过封锁线。山下路口砖石垒的哨位里，冲锋枪突然“哒哒哒”地狂叫起来了，把石阶路封锁了，第三连被卡在封锁线那边，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命令一个尖兵排，每人携带四个手榴弹，由马建章连长带领去对付路口的哨位。我们用一挺轻机枪向敌人的机枪阵地扫射了几梭子，又用步枪火力狠狠地压了一下，敌人的机枪停歇了，马建章便领着尖兵排摸上去了。不一会，几十个手榴弹连续着在砖石垒的哨位内外爆炸了，敌人的冲锋枪哑了。干掉了敌人路口的哨位，阻力就大大地减少了。第三连便乘机冲到敌人跟前，与敌人打了一阵之后，也顺利地冲过了封锁线。部队冲过封

锁线后，我便领着尖兵排飞快地撤到兴泰公路东面，在山上架起一挺重机枪，掩护部队继续前进。

部队在兴泰公路东面的群山中集中以后，清点了一下人数，只有极少数伤亡，伤员也背负过来了，但第四连还未过来。过了半个多钟头，扬赣独立营护卫着干部队和随队的群众，也顺利地冲过了封锁线，与一、二、三连会合了。再往崇贤走，没有敌人的封锁线，根据侦察员和群众的报告，也没有发现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我心里象减轻了千斤重担似的愉快。不一会又听到封锁线西边传来了隐约的枪声，知道四连还没有甩脱敌人的截击，这时，又感到万分焦急和不安。看来四连已不可能冲过锁封线了。他们能不能突围坚持游击活动，或是被冲散之后隐蔽起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等待时机再过来？那个最后派去的通讯员，是不是已经到达四连，能不能回到团部……这些问题，在向崇贤挺进的路上，一直在我的头脑中焦虑着。

第二天，在向崇贤急行军的途中，我们只遇到了小股国民党的部队和守望队、“铲共团”，他们在我军的勇猛冲击下，都纷纷退走了。傍晚时分，我们到达了崇贤附近，在苍茫的夜雾中，我们发现从崇贤镇跑出来大批部队，登上山头进行戒备。我断定他们一定是红二、四团，为避免发生误会，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我正准备叫司号长刘炳兴吹号联系，那边山头上便传来了“普通问答”号音，他们问：

“你们属于工农红军哪一部分？”

一听见这号音，就象听见了久别的亲人的声音，战士们就欣喜地跳跃起来。我马上叫司号长回答，号音吹得欢欣而响亮：

“我们是江西军区第四军分区独立十三团。”

那边山头上接着吹起了吃饭号，最后却加了三长三短。司号长兴奋地对我们说：

“这是‘秘密问答’，回答吧？”

“当然回答，你快吹吧！”我催促地说。“秘密回答”是保

密的，隔一个时期就要调换一次。

司号长以急促的调子吹起了集合号，后面附上了两短两长。

“打嘀打，嘀打嘀……”那边山上紧接着吹起了欢迎号，欢快的音调象千百人的热情欢呼，又象热烈的掌声，在平静而辽阔的山野中震荡、飞扬。我们的部队，象潮水般地涌进了崇贤镇。

两支兄弟部队会师了，象失散的一家人得到了团聚，战士们拥抱着，欢跳着，亲热地互相慰问，兴奋地倾谈战斗经历，每个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欢笑与歌唱震荡着僻静的崇贤镇。在集镇街口一栋矮小的土屋前面，我会见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

扬赣独立十三团与红二、四团在崇贤胜利会师，统一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同志的直接领导之下，部队的战斗力更加强大了。然而敌人也更加震惊、仇恨，他们在崇贤周围地区，源源不断地增加兵力，加紧对我们的包围与攻势，最后决定：突出敌人的包围，路过扬赣地区去赣粤边根据地，与李乐天、杨尚奎同志领导的红军部队会合，并通过他们取得陈毅同志的领导和指示。

三月末的一个晚上，天正下着大雨，部队决定走孟然经丝茅坪突过敌人的封锁线，由红十三团担任前卫，红四团担任后卫。因为天黑路滑行军速度不快，尖兵到达丝茅坪就快天亮了，估计部队在天亮前不能过完封锁线，使前卫变后卫往回撤退，红二、四团扎在中洞口上，红十三团驻扎孟然。这时候，我们一面休息，一面防止敌人偷袭，作好战斗准备，同时，又派武装和便衣侦察，四出探听敌情。

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派出的侦察员还没有回来，红二、四团的武装侦察员刚走过红十三团团部门口，太阳也快下山了。于是，大家便各自忙着晚上行军的准备工作。

我刚洗完澡，突然，相隔里把路的赵家祠那边响起了枪声。我喊醒小鬼，要过驳壳枪，将一床毯子交给他说：“敌人来了，快，走前门走！通知部队，快登上山！”

小鬼担心我，站在那里有些迟疑的样子。我命令地说：“快，听命令，我掩护你走！”我们一走到门口，敌人就到了禾场上，我飞快地用快慢机扫了一梭子，撩倒了几个敌人，便一把将小鬼推出门，掩护他向房后的山上冲去。小鬼刚要钻进芦茅里，敌人大喝一声：“不要走！”说完举枪要打，我对准那家伙一枪，将他打倒了。眼看小鬼很快就钻进山里，安全脱险了，我放心地舒了一口气，就一个箭步跳出大门，背靠屋檐墙角上，一面朝冲上来的敌人扫射，一面往后山上撤。

情况愈来愈严重了，敌人大概猜到我这里没有部队，因此，虽然每次冲来的敌人，都被打倒几个，但却不断地冲来，而且一次比一次人多，一次比一次猛。当我正在拉开机头上子弹，准备离开房子转移阵地的时候，敌人可能认为我的枪出了故障，便有人喊：“不要开枪，抓活的！”接着，敌兵一齐跟着喊：“捉活的！”

听见敌人狂妄的喊声，我反而更镇静了，就利用这个时机，不顾一切地、飞快地往山上冲！冲到沟边，我纵身一跳，就听见身后脚下，不断地响起“嗤、嗤、嗤！”的子弹落水的声音。

接着从我的头顶又响起一排又一排的枪声，这是我们的部队登上了山头，与敌人接火了。我高兴地喊着：“揍这些狗入的！”由于我们的部队登上了山头，敌人的几次冲锋，都被击败了。不到两个小时，便把敌人打退了。

当天晚上，我们改道石陂、北坑、大小杨梅岭过封锁线，红二、四团是前卫，红十三团是后卫。先头部队摸索到封锁线敌哨旁边，又快天亮了，于是，曾山同志就下命令，前卫后转，红十三团仍担任后卫。当时，敌人发现了我们，便盯着屁股追来。我们有了孟然的教训，就在石陂、北坑交界的大坳岭上布置了一个连，准备打击敌人，掩护大部队撤退。敌人来到山脚下，就从正面、左翼向我们进攻。我们占领了山头阵地，好打，敌人几次组织冲锋，不但没有攻上来，而且死伤很重，还被我们缴了五条

枪，最后敌人不得不退回北坑。

大坳岭战斗之后，估计敌人知道了我们行动的目的，必然会在封锁线上严密警戒，于是，江西省委决定红二、四团开赴桥头冈驻防，我们转移到桃庄休整。部队分开时，曾山同志由红二、四团拨给十三团几支冲锋枪，加强十三团的装备。我们转移到桃庄的第二天，曾山同志叫人送来口信，说江西省委决定红二、四团从永丰突围，去湘赣根据地与谭余保同志的部队会合，要我们和公、万、兴特委书记胡海同志联系，开展游击战争，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再设法突围去赣粤边，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减轻部队行动的阻力。我们马上与胡海同志去信取得了联系，他回信说：他们也决定走这条路线突围，要我们先走一步。

部队在桃庄休整了两天，便插进崇山中，在芦荻和竹林里穿行，斗笠、包袱都挂破了。但我们还是很快地翻过了子羊山大岭，进入了桥头冈地带。

这时，特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详细研究和确定了突围的路线：从桥头冈出发，经乌石下，铜鼓顶、山背、垅下、土密、黄土坳，而后插上秦岭峰。

一天傍晚，部队到达了齐汾的乌石下，便决定就地驻扎，第二天晚上再走。这时山野间起了大雾，山峦、树木都开始笼罩着一层白色的大雾。我连忙叫陈连长带了一排人，去到山排茶亭里放排哨，严防敌人的偷袭。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拂晓，敌人的一个团，便趁大雾来偷袭我们。我们的排哨在与敌人的尖兵相距十几米时，发现了模糊的人影，便大声喝道：“什么人？站住！”敌人以枪声回答我们哨兵的口令。这样，排哨就与敌人接上了火。我命令正在屋场上吃早饭的大队，迅速进入阵地，要肖营长带一个排占领右翼的一个山峰，左翼的墩坡子上也派去一排人，我自己指挥正面的部队。敌人沿大路冲来，临近乌石下便分成三路，攻我正面与左右翼。这时，偏偏雾愈降愈大，不仅山峦、树木、道路都淹没在大雾里，就是敌人隔三五步远都看不

见。敌人攻势很猛，武装也十分精良，迫击炮、重机枪、冲锋枪一齐向我们射来，虽然几次冲锋都被我们打退了，但还是拼命地向我们猛扑。这时，扬殷县苏维埃主席钟恩贵同志跑到我身边，说：“罗政委，让我到右翼去阻击敌人。”

“好！”我答应了他英勇的请求，说：“既要狠狠打击敌人，还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

钟恩贵同志迅速地投入了战斗，他和肖营长领着一个排，在山峰上给了敌人猛烈的阻击。

不一会，我们正面部队与左翼连成了一片。而我身边的陈连长，已是第三次负伤了，还是坚持不下火线，我不得不命令通讯员把他背到一个隐蔽的地方，自己接过重机枪继续向敌人射击。激战了两个多小时，敌人伤亡很大，进攻的力量也削弱了许多；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我又考虑到雾还很大，便命令左翼与正面先撤退，由右翼担任掩护。掩护的部队又继续打了半个多钟头。钟恩贵同志正当他用冲锋枪扫射正面第四次冲上来的敌人的时候，左右方向涌上了十来个敌人，于是，一场白刃战开始了。

钟恩贵同志用马刀劈掉了两个迎面冲来的敌人，就奔赴肖营长身边，劈掉了一个正想偷袭的敌人，给肖营长解了围，然而，自己却四面受包围了。正当他用手掐死敌军班长，刚要站起来的时候，身上刀伤的地方，又被击中了几颗子弹，钟恩贵同志就这样为党光荣地牺牲了。当他心脏停止了跳动时，一手还狠狠掐住敌军班长的脖子，一手还紧紧地握着自己的马刀。最后，从右冲上来的敌人被消灭了。在肖营长的指示下，背走了钟恩贵同志和负伤的战士，部队很快地转移了阵地，在龙头山与大队会合了。

当晚我们退到桥头冈，敌人也不敢追来。桥头冈的群众知道我们在乌石下与敌人打起来了，早就焦急地打听战斗的情况，关心着我们的胜败。现在见我们回来了，都纷纷前来慰问，送茶送水，把伤员抬回去护理，还杀猪杀鸡慰劳我们。

当他们知道钟主席、陈连长和一些同志牺牲了，都哀伤地流下了泪水。有个须发全白的老农，抹脸上的泪水，走到我面前悲愤地说：“罗政委！我们一定要为钟恩贵和其他烈士们报仇。敌人要进攻桥头冈，就要他们死在桥头冈。”说着，牵着他身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带着恳求的声音，“罗政委，收下他吧！”我感动地点点头。

那边妇女慰劳队传来了歌声：

哎呀来：
蒋贼进攻很疯狂，
烧杀抢劫象阎王，
红军总是消不灭，
要把老蒋一扫光。

勘 误 表 （第三辑）

页 数	行 数	误	更正或补充
11	18	明扬支队	漏（李明扬）
11	18	仁机支队	漏（卓仁机）
11	18	寿山支队	漏（郭寿山）
14	7	盐敛	关税
15	21	右翼	右翼军
16	3	农	麓
16	6	农	麓
103	24	寇	冠
125	9	红会	帮会
153	1	张宗祥	章宗祥
154	16	张宗祥	章宗祥

皖南事变与项英被害真相

谢忠良

皖南事变，是一九四一年农历一月、阳历二月初，蒋介石国民党为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而一手制造的反革命事变。由于项英同志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本质和严重性认识不足，对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进攻，缺乏精神上和组织上应有的准备；又由于项英同志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英明指示；加之我新四军机关内部的不纯，终于使皖南部队约万余人遭受了本可避免的极为严重的损失。

我是皖南事变的当事人和幸存者之一。皖南事变以前，一九三八年我任新四军军部的教育参谋、教育科长，一九三九年任军部侦察科长兼教育科长。事变前夕，一九四〇年秋末，我曾调离军部，任新二支队（旅）参谋长。皖南事变后，我们有一段时间隐蔽在深山里，我一直同项英、周子昆等同志在一起，从部队被围，直到最后亲手掩埋了被害的项英同志和周子昆同志止，始终没有离开过，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每一幕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皖南事变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对于这次事变，特别是关于项英同志和周子昆同志的被害经过，传说不一，为了能从这一事变的失败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同时也为了澄清一些与事实不符的传说，现在我将当时军部的一些具体活动及中路的战斗情况，特别是项、周被害的经过情形，作一全面回忆。由于我当时只是中路的具体负责人之一，左路是傅秋涛、江渭清，右路是张正坤、胡荣，所以我对整个情况的了解是不全面的，我只是叙述一些事实的经过情况，由于战斗紧张和工作忙碌，对某些具体情节的时间记忆不清，也可能有出入。

(一)

一九四〇年九月，德、意、日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意的欧洲势力，南取南洋，北攻苏联，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加紧对国民党进行诱降活动。英、美也希望中、日两国停战议和，以便把日本的矛头引向苏联。蒋介石就利用这一形势，决心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大阴谋。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何、白来电的内容，除了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造谣诬蔑外，主要的就是强迫我军按照国民党七月十六日的“提示案”办事。即：第一，取消陕甘宁边区和一切抗日民主政权；第二，要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冀察两省和鲁北一隅，受二战区阎锡山指挥，并不得越境和武装民众；第三，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编制人数总共不得超过十万人（当时八路军和新四军已有正规军五十多万人）。同时密令大江两岸的国民党军队数十万人，作好向我军大举进攻的准备，包围我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也大大增加。据此，十一月九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联合向国民党及全国人民发出通电：拒绝国民党的无理要求，驳斥了要我军将黄河以南部队限期北移的荒谬命令。同时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公开的抨击。另方面为顾全大局，将皖南的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党中央还指示华中全军紧急动员，以应付突然事变，进行充分的政治军事准备。

(二)

党中央早知蒋介石反共策划已久，指示我部尽量转移到敌后江北广大地区，不要留在皖南。这样既能扩大抗日根据地，壮大

武装力量，又可以解决经济等问题。项英却不适时宜地提出精兵简政，连地方党介绍的贫下中农青年来参军的都不要。率领军部局促皖南一隅，经济不能独立，经费全靠蒋军第三战区发给。没有象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那样，根据党中央指示，率部进入江南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经济自主，兵员经费困难均迎刃而解。中央一再来电，要项英同志率部北移，可是项英同志不顾背靠顽固派的危险，企图株守皖南。有一次项英同志手里拿着中央的电报，把我叫去查问沿江的地形和敌人布防的情况，情绪很激动地说：“主观主义！”“不了解情况，水网地区，碉堡林立怎么通过？”说罢，就甩臂走开了，类似情况，以后还有几次。

我还记得四〇年十月间，有一天晚上，项英亲自打电话给我，问我从泾县码头（地名）到宣城，从宣城到丹阳地区的路线情况，要我准备一个好的连队，要轻装，还要电台和机要人员，由军部准备，跟他先走。到哪里去，叫我不要问。我按照他的指示安排妥当。三天后，他召开会议，会上我请示他，他说：原准备到丹阳地区与陈毅会合，现在改变了主意，不先走了，命令驻在云岭地区周围的部队立即构筑工事，以碉堡为屏障，固守青弋江以西，配合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谈判。他还说：“只要坚持半个月以上时间，和平可能实现。”我记得还有一次，晚饭后，他带了警卫员刘德胜、夏终兴等人，从侦察科经过，对我说：“谢科长，没事吧？跟我去”。我知道他有事，要帮助警戒。就说：

“我去拿枪”，接着跟他一起经过汤村（政治部驻在地，在泾县境内），来到丁家山（东南局办公地点），见到陈阿金（袁国平的警卫员）。我和刘、夏、陈在门外警戒。现在回忆起来，那次可能是饶漱石向项英传达中央的指示，在场的还有袁国平、李步新。起先屋里声音很小，听不清，我们也没留意，到了约十点半左右，只听见项英在大发火，说：“我先来，你后来，你不了解情况……我是老同志，你是新同志……你听我的……”。我问包子（夏终兴的绰号），是怎么回事？包子说：“大概是商量事

情”。有的说重庆来的，有的说延安来的，是个大胡子，洋人模样……（指饶）。

在中央一再催促下，迫不得已，九月底十月初，项英才决定公开对部队进行北移教育。一九四一年二月某日，上午五点左右，天下着小雨，军部和所属三个支队约一万余人，从泾县云岭、罗里村等地出发，往南走了七里到达章家渡，跨过青弋江，又行军十五里来到茂林，在茂林休息了一天，军部驻在茂林南面潘村的潘家祠堂。我奉命率领一个营为总后卫，掩护兄弟单位的安全。晚上十二点才最后撤离北贡里。这时，国民党顾祝同，上官云相早已布置了七个师共六万余人的部队，对我军开始包围攻击。下午，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二支队的周桂生司令、黄火星政委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部队第二天向丕岭前进，并根据叶挺军长的指示，在拂晓以前一定要攻克丕岭。当时，丕岭已被敌四十师先头部队的一个连和一部分搜索队占领了。我们根据军部会议精神 and 叶挺同志的指示，布置了中路部队的作战部署。中路（二支队）决定：我率老三团三营为前卫，完成攻克丕岭的任务（当时彭加珠同志是三营教导员），上午三点半开饭，四点出发，前卫营向丕岭前进，该营行动迅速，战斗勇敢，按时占领了丕岭。上午十时左右，先头部队已抵达三溪镇以西的小山附近。可是山头早已被敌人占据了，并构筑好了工事，还在加强。以火力封锁了通往三溪的道路隘口。我军进攻部队受阻，与敌人形成了对峙状态。这里两边是高山，坡度很大，山上还有积雪，对大部队兵力展开，发扬火力都有一定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立即继续侦察地形，寻找徒涉地段，上午十一时左右，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同志亲临前方，仔细观察周围地形，和我们一起研究渡江问题。可是水流湍急，又无船只，加之敌人为了防止我们渡江，已调动兵力，有了准备，我们也可以看到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炮兵阵地，这样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困难。十二点钟以后，李志高同志来电，通知我说：情况不妙，我军三路受阻，部队可能后撤，

军首长们正在研究。午后三点左右，李志高同志又骑了马来，把我叫到一边，个别对我说：“老谢呵！现在的情况十分紧急，三路部队受阻不能前进，过不了河，部队要后撤，要准备突围”。我问他究竟怎么办？他说：军首长决定后撤，决心在丕岭最后留老三团二营，以二营四连坚守（当时四连连长是李胜名），当晚，我们撤离到内覃仓附近。

部队一到内覃仓，军部召集各支队负责人开会。会议讨论怎样突围的问题，叶挺军长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攻下星潭。二支队政委黄火星同志说：“以新三团张玉辉营为前卫，你下命令吧！我们负责坚决打！”（当时阙中一是新三团政治处主任）项英说：“硬拼代价太大，伤员不好办。”会议争论得很激烈，整整开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也没有定出具体的方案，就散会了。

正在这时，埋藏在我军的内奸，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投敌去了。项英下令将三战区派来我军军部的“联络参谋”陈旦如（实是特务）押送出境。当时大家的意见要把陈处死，项英同志没有同意。（关于赵凌波和陈旦如，下文还要详细谈到）。

由于袁国平、周子昆支持项英的意见，叶挺军长只得下令往回撤。八日凌晨向石井坑转移。国民党七十九师在高岭拦截。晚上又遇到国民党新七师的拦截，形势对我们极为不利。叶挺军长亲赴第一线指挥战斗。这一天，情况万分紧急，可是深夜，作为新四军的核心人物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却失踪了，他们丢下整个部队不管了，只带了几个警卫员悄然离去。军部只剩下叶挺同志，机关里还有李志高同志。李志高打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去一下（当时我在二支队）。我一进门，他就把我拖到一边，把以上情况告诉了我，并要我暂时保密，不要外传。随后叶军长把李志高叫去，由李志高、叶超二同志起草电报，把项、袁、周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电报在深夜十一时后发出，凌晨三时收到中央复电，电文很简短：皖南新四军全体同志，现在你们的处境十分危急，希望全军同志听从叶挺同志的指挥，团结在叶挺同志的周

围，克服困难，突出重围，争取胜利。我们接到延安的电报指示后，由李志高同志通知各部队，并且对各部队作了战斗部署。

(三)

我们立即向茂林方向前进，大约走了四、五里山路，在东流山西侧，同敌人的新七师又接触了。战斗打得很激烈，从八日拂晓一直打到下午二点多，我们打退了敌人多次的猛烈攻击，部队进至石井坑北面的小山上，马上架通了电话同军部联系，叶挺军长命令我率领参谋、侦察人员前去侦察地形。叶军长说：今天晚上一定要突围出去。我刚走不远，就遇到右边山上付秋涛同志的部队老一团。这时我们正面的敌军五十二师，一〇八师，一四四师正猛烈地向我攻击，包围圈越压越小，情况非常严重，我的左手负了伤，随我一同侦察的杜建秋参谋光荣牺牲，我立即将情况向周桂生和黄火星同志报告后，周、黄命令我立即返回，我就回到了支队指挥所。因我负了伤，黄火星同志又叫我回到军部。

在军部指挥所，我看到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等同志又回来了。原来那天深夜，他们从竹林往山下走去，在山里转了半夜，到天亮时才发现，只走了一里多点路。他们看见远处山头上有敌人，无法出去，就在一个看野猪的棚子里呆了数小时。十日清晨，忽然听见山下有号音，周子昆懂得号谱，高兴地说：“这是我们的号声，是调特务团一营一连的”。他们低头一看，见特务团一营一连的队伍正雄赳赳地从山下经过。周子昆说：“我们还有这么多部队，我们下去吧！”项英说：“好呀！下去吧！”就这样，他们又回到了自己的队伍中。中午到达石井坑，他们才知道东流山仍被我们牢牢地固守着。这些情况，是在突围会合后，项、周和我们在一起闲谈时，周子昆自己谈的。

项英在石井坑见到梁朴（即饶漱石），梁当时是东南局的副书记。项英问梁朴：“我们的事中央知道了吗？”梁朴说：“知道了”。项英又问：“中央的意见呢！”梁朴把一份电报给项英

看，大意是一切军事指挥由叶挺负责，政治工作由梁朴负责，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保存革命力量。项英看罢，将电文还给梁朴说：“好吧，既然是中央有命令，那你们负责指挥吧。”

九日下午四、五点钟，天快黑了，东流山的战斗非常激烈，特务团一营（原军部特务营）和教导纵队工兵连坚守在山上，敌人从茂林方面用大炮向东流山猛轰，山上的树木都烧着了，成了一片火海，工兵连的战士们几乎全部牺牲了。因为东流山的地位很重要，叶军长从五团调了一个营增援。他们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冲锋，终因众寡悬殊，最后失守了。石井坑的西面，敌人新七师攻的很猛，我正面的敌一四四师、五十二师也在猛烈地攻击。我随军部指挥所行动，看到作曲家任光同志（渔光曲的作者）夫妇俩，当时中弹牺牲了。这时形势非常紧迫，军部指挥所已处在敌人的火力威胁之下，只有东面高山还控制在老一团的手里。教导纵队余立金、第二支队政委黄火星、第三支队司令张正坤，都跑到山上来向叶挺军长请示下一步行动方案。叶军长沉着对大家说：“现在开始分散突围。突围的方向自己选择，可以到苏南、江北，也可以到徽州打游击。你们都是共产党员，愿意当突围司令的，都当突围司令吧！”接着，把文件烧了，电台也砸了。叶军长下令立即分路突围。在突围中，我才看到了梁朴（饶漱石）他打扮得象个道人，穿着长衫，胡须留得很长。东面是陡峭的高山，加上雨后不久，山路很滑，难以行走，直到夜里十二点才爬上山顶，东边山下是大坑王，下山无路可走，等次日拂晓，我们才到达接近大坑王的一个鼓形山顶上。

（四）

鼓形山，山陡林密，杂草丛生。叶挺军长将手杖柄上的螺丝一拧，手杖柄就成了一块凳面，手杖的下半部分开成了两条凳腿。他从容地坐在上面，背靠着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家都围拢了过来。这时，山下均被敌人占领，道路也被敌人封锁，枪声

虽然平静了些，空气却十分紧张。天快亮了，山下的敌军五十二师向我们喊话：“新四军别打了，我们给你们准备了饭菜，你们可以派代表来谈判……”我们懂得这是欺骗，根本不去理睬他们。军政治部敌工部长林植夫，首先提出要与敌人谈判，可是项英、周子昆在旁边一言不发。我同李志高一直在叶挺军长的周围，军部通讯科长胡立教同志亦在场。叶军长说：“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还去谈判？不是送到老虎口里吗？敌人能睬你吗？”

敌人在山下喊了三、四次话以后，林植夫自己先下山去了。结果被敌人扣住。敌军见我们没有动静，机枪响起来了。子弹嗖嗖地朝我们站立的地方射来。有人向叶军长提出：“还是藏一藏吧！”叶军长说：“我不去藏，抗日打鬼子，难道还犯法？我要到重庆找蒋介石这个王八蛋算帐去，要藏，你们藏吧！”这时，项英、周子昆悄悄地离开叶军长，到山上杂草丛里隐蔽起来了。

叶军长平时工作很认真，就是沉默寡言，后来我们看见叶军长的脸色比平时更严峻，满面怒容，出人意外地一个人往山下去，我们也不敢过问，就这样叶挺军长也下山了。现在才知道，当时担任东南局副书记的梁朴，竟迫使他去和顽敌“谈判”。叶挺军长那时并没有受伤，只是摔一跤，把右手衣袖撕破了。叶军长下去以后，很多人就都找不到了。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也都不见了，军部里呈现群龙无首状态。我就同李志高同志商量：“老李，我们不能下去，我们这样下去不行，下去我们非被杀头不可”。这时硬冲是冲不出去的，我们只得到密林里隐藏起来。当时军部教导纵队的余立金、冯达飞等也隐藏在这里附近。敌人开始搜山了，不时听到零星的枪声和国民党士兵的欺骗叫声，但是敌人没有搜到山顶上来。下午，从山沟里又出来几个同志，有老一团二营营长李元（现任总后副部长）有敖得胜、陈棣华。太阳快下山时，天气又冷起来了。我向李志高同志提议，我们要转移，向大山后面同敌人相反的方向去隐蔽，敌人的注意力集中在茂林周围地区。天黑了，我们就沿着山脊向丕岭方向转移。

山脚下敌人的篝火一点一点地闪烁着，山林又恢复了平时的寂静，寒风夹杂着稀疏的雨点，使劲地往衣缝里钻。这时我才感到伤口的疼痛，才想到一天没有吃东西，还是和大家一起不停步地走着。

第二天，我们在树林里又隐蔽了一天，敌人继续在搜山，我们在密林的掩护下没被敌人发现。可是，这一天情况更糟——一天没水喝，我们的意志受到严酷的考验。我们只有一个信念：我们的军队不会垮！我们还有延安，还有党。胜利最终是属于人民的！

日沉西山时，我们听见敌人的号声，知道他们下山回去了。我们用望远镜观看丕岭，没有看见什么房屋，夜晚我们下了山，见到河沟有水，就冲上去猛喝了个够。

第三天黎明时，我们转移到赵家佬后面的山沟里，在一个制作毛边纸的棚子里外边小路上，第一个见到的是夏终兴同志，我们又和项英同志、周子昆同志会合了，还有副官刘厚总，警卫排长李德和以及项英同志的警卫员郑德胜，周子昆同志的警卫员黄诚。

(五)

项英同志见了我们，拉着我的手，头一句话就说：“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周子昆也插话说：“我也有责任”。项英又说：“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的，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我和李志高听他们这样说，没有表示任何态度。我们在纸棚里隐蔽了一天，相互叙述各自的经过和观察到的情况，袁国平的警卫员陈阿金告诉我，袁国平被五十二师打死在大坑王南边山脚下的一块大石头旁边。整整一天，项英同志和我们连饭也没有吃。会合后的第三天，项英同志决定成立临时支部，并且他亲自指名李志高为临时支部书记，谢忠良为副书记，“在隐蔽过程

中，一切行动要以支部为核心”。

我们根据白天侦察的情况了解到赵家佬有房子。当晚，我们找到了老百姓。这里的群众很好，大多是江北人，对我们新四军非常同情，看到我们抗日获罪被顽固派害成这个样子，都流下了眼泪。群众为我们烧饭、做菜，直到下半夜。三天以来我们第一次吃上了饭菜。当地的群众还为我们打听消息，告诉他们说“对过山沟里有人，肯定是新四军”。经过详细的调查询问，原来是五团二营的整个营部在那里（营长是陈仁洪，教导员是马长炎），我们很快就联系上了，有了两股力量四十多人了。当地群众热情地帮我们打听情况，买粮食，做衣服，我们分散隐蔽在东山、西山两个大山沟里。这里的老百姓不多，没处住，我们就住在造纸棚里，隐蔽了四、五十天。

随后，我们同项英、周子昆以及军部的一些同志又转移到丕岭下，在内覃仓附近的深山老林里又隐蔽了近一、二十天。陈、马营部，因为地形好没有转移。在这里，通过老百姓，我们同军部教导纵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同志联系上了，通过刘奎同志，又联系上了军部直属政治处主任杨汉林同志，又通过杨汉林同志联络了军部军需处副处长罗湘涛，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主任胡金奎同志（现在湖北省政协工作）。这时我们又集结了七十多名新四军失散人员。刘奎同志向李志高同志介绍了一个地点，是内覃仓东面的田坑里（地名）。那里，十几里沟没几户人家，也都是外乡人，森林茂密，地理和群众条件比这里更好。为了慎重起见，项英又派李志高和刘奎等去侦察了一次。李、刘回来后向项英作了详细的汇报。那里地处两县交界，地势很好，都是大山。翻过山去就是旌德县。项英听完了汇报非常高兴，兴致勃勃地说：“搬到田坑里去！把胡明找来（胡明同志是皖南特委负责人），他有电台，可以同陈毅取得联系，陈毅再与中央联系。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打通了！”项英同志又说：“我们现在又有了这么多人，这里的群众又这么好，我们还有枪。这样，很快就可以发展一个营

到二个营，”项英继续说：“我们有李志高、谢忠良可以管机关嘛！管情况的有，管经济的有，管地方的还有胡明，这不是很好嘛，那我管什么呢？我管整个嘛！我们的条件是很好的，比我们在赣南打游击的条件强多了，还有那么多老战士可以当干部”。项英同志很高兴。他还对我们几个老战士讲述武汉工人运动的经过，最后笑着说：“有时候，赶不上吃饭，怎么办呢？只要四两牛肉，半斤二锅头，就够啦！

(六)

我们搬到了田坑里沟尾子上，这是大山沟的一条山沟，地形确实很好，山势绵亘峻峭，敌人大部队不易攀登，小部队又起不了作用，树林浓密深邃，周围几里内没有什么人家。刘奎还从当地老百姓那里了解到山上有上、下两个洞。李志高和刘奎到山洞里查看了一下，对地理位置很满意。项英同志更加高兴，决定在这里隐蔽一段时间。

两个山洞，相距大概六、七十米。小洞在上，大洞在下。小洞可住三、四个人，洞很隐蔽，进洞时要攀住凸起的石块或枝梗才能上去。大洞在小洞的悬崖下面，容纳的人较多，洞内不平整，是斜坡式的。项英同志和我们开玩笑说：“下面是第一线，如果发现情况可以抵抗，掩护我，我们住上面，如果我走不动，刘厚总他力气很大，枪法准，又打过游击，有经验，可以背我上山。”

刘厚总当时是军部副官处副官，黑粗个大，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同志的赏识。项英同志到哪，总是刘厚总跟着。

（他最老的警卫员夏终兴同志，就因为个子小，力气不大，枪法不好，被疏远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和黄诚就住在上面的洞，我和其余二十几位同志住在下面洞里。

农历三月底，四月初的天气，时而暴热，时而雷雨，一连几天洞里呆不下去了。一天中午，项英同志脱了衣服捉蚤子，把身

边保存的财款暴露出来了，有黄金、银元、钞票和首饰等。我们一直都不知道他带着这么多的经费。因为在田坑里同他会合时，他问过我们：“你们有没有钱？”我们说：“我们有钱”。项英就说：“那你们就先拿出来用吧”。所以原来用钱，都是从我同李志高保存的党的经费中拿出来的。在这里我们做了许多往江北转移的准备工作。侦察了解转移路线，又设法买了些布，每人做了一套便服。

到达田坑里第三天晚上，项英同志决定要派人下山去买粮，由李志高同志同我商量后，决定派刘厚总、刘奎、李德和、郑德胜四个人到内覃仓把事先托老百姓买好的粮食背回来。决定下半夜去，到第二天晚上回来，再买点菜和油、盐。

傍晚时分，下起了暴雨。雨越下越大，到了夜里，雨骤风狂，雷电交加，一片漆黑。我们在洞里，只听见外面怒吼的松涛，看见一瞬间被闪电照亮了的雨中山林。紧接着就是一阵闷雷，过后山林又被黑暗吞没了。我们万万没想到叛徒刘厚总，就在这天晚上趁暴雨之际，对项英同志下了毒手。

天快亮时，项英同志最老的警卫员夏终兴，到上面的洞里去看首长，很快就下来了，说：“不好了，两人被打死了，一人被打伤了”。我和李志高，侦察排长张益平、老一团二营长李元等急忙上去，只见项英同志、周子昆同志倒在血泊中已经被打死。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右上臂和颈脖被打伤，项英和周子昆身上的财物已被搜括一空，具体有多少钱不清楚。原来刘厚总先将项英打死，子弹打进太阳穴，周子昆惊醒坐起，被刘厚总打中头部，警卫员黄诚惊醒后，刚想摸枪，被刘厚总用手电筒照住眼睛，把他打伤，刘以为他死了，就穿着大褂，把财物都揣进怀里，仍按原定下山买粮的计划走到下洞来叫刘奎、李德和、郑德胜一起去背粮食。四个人一同走到山脚下，那里有两户人家，刘奎想到一家老百姓家里打听一下前面有没有什么情况，其他三个人在外面等候。这时候刘厚总说要上厕所，他就借着这机会逃了。刘奎出来

后，大家当时还没察觉，过了一会，才发现刘厚总不见了，是先走了呢？还是逃跑了？他们顺着河边走向前去，直到天快亮时还没有看见刘厚总，知道坏事了，就赶紧折回向我们汇报刘的情况。这时我们已在上洞里查看现场并向黄诚同志询问了伤情，觉得在这里呆不住了，刘厚总要是投敌，一定会把敌人引来。我说：“我们先把项英同志和周子昆同志的尸体埋葬好，做上记号，等革命胜利后，再迁移。项英穿布鞋，容易腐烂，周子昆穿皮鞋，三、五年不会烂，还是可以找到的”。我们就在二个山洞之间，靠近一块大石头下面，用原来向老百姓借来平整洞里地面的锄头挖了两个坑。项英同志头朝东，埋在稍上一点，周子昆同志的头朝西，埋在下面一个坑。当时在场的有我、李志高、李元、何继生，工兵连副连长刘奎、侦察排长张益平、警卫排长李德和、警卫员郑德胜、夏终兴、王本元、赖果宝、陈阿金、康东柏等。我向大家当面交代说：“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将来我们这几个人，总有机会来这里的”。这天黄昏，我们就向铜山转移，走了几十里路，下半夜到了铜山。

(七)

第二天见到罗湘涛、胡金奎和杨汉林同志，我们把项、周被害经过情况，如实地向他们汇报，当时大家十分震惊。认为刘厚总的背叛不是偶然的，在耒阳整编他的游击队下山时，他即对抗日的新形势产生动摇，不愿上前线，并对整编后担任副营长极为不满。而他杀害项、周的直接动机则是谋财害命。

经过铜山的组织和群众的协助，到旌德县境内庙前（地名）附近山沟里去找胡明，结果找到了。三天后胡明、孙宗溶来了。我又将经过情况告诉他们。胡明对我说：“老谢，三战区的通缉令已经发到了县政府和各区公所，你要注意，通缉令说新四军最反动的特务头子谢忠良一没被俘，二没被打死，命令各区公所要将你捉拿归案”。我说：“我怕他们什么？我手里有枪，打一个

够本，打二个还赚一个。”

在铜山住的几天里，根据胡明同志当时向我们提出的意见，我们开了会研究，决定把多余的三支木壳枪，150发子弹，一部分钱，留给胡明。他向我们要干部，我们就把刘奎和李建青两同志给了他，帮助发展地方工作。让黄诚同志留下来养伤。随后，我们趁着月色，向江北突围，走了不到半夜，又来到赵家佬，在这里同陈仁洪、马长炎等同志会合。这里地形道路我和李志高都熟悉，到了南青公路以北，陈、马两同志都熟悉。第二天下午太阳还没下山时出发，经石井坑绕道章家渡以南，渡过青弋江，在中村原教导纵队驻地南面的南山隐蔽了一天，第三天经过北贡里到烟炖铺以北丛林里又隐蔽了一天。第四天到繁昌县在中分徐家北边的大山的庙里又隐蔽了一天。晚上，经过铁门门后，就进入敌伪区。国民党顽军一四四师在这里只有排哨。我们从街后面走过，同时作好了战斗准备。没有被敌人发现，我们得以顺利通过。到了江边，找到了我们的联络站，过江后就到了无为县的白马洲五号。（小街地名，离江边很近），这里是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后来，我们编入了新四军第七师十九旅，我任第五十五团团长，李德和、张益平、郑德胜、夏终兴、刘德胜、康东柏都分配在师部警卫连。

（八）

刘厚总杀害了项英、周子昆以后，当天跑到泾县国民党警卫中队驻茂林的一个排，去邀功请赏投降了。

据说，刘厚总对那个排长说：“我已把项英、周子昆打死在××地方了”。这个排的排长和手下两个亲信士兵，从刘厚总身上搜到那么多的财物，还有两支木壳枪和三支手枪，就把刘厚总关在一间小屋里。三个人把钱瓜分了，也没有向中队报告，敌排长对刘厚总说：“你说你把项英、周子昆打死了，我们不信。”第二天，敌排长带了二个穿便衣的亲信士兵，叫刘厚总带路去找

项、周的尸体，刚到田坑不远的地方，他们问刘：“尸体在哪里？”刘说：“不远了”。敌人假装不相信，在没有人烟的半路上，把刘打死。（编者按：《历史档案》1981年第二期载有中国第二档案馆馆藏的杀害项英、周子昆二烈士的叛徒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其中供认杀害项、周二烈士的经过与本文基本相同，劫去财物为黄金八两五钱、手枪三支、派克自来水笔三枝，金挂表及火车表各一块。叛徒刘厚总在报告中还叙述了“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要求发给救济费”云云。似此则国民党某排长所述把刘打死不确。）

这个排长一贯吃喝嫖赌，不久也把这笔钱花光了。此后我们也没有打听到刘逆这个叛徒的下落。

但我知道，刘厚总是湖南耒阳人，一九三八年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随项英同志在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王首道同志那里，听到特委书记王涛汇报说：还有两支游击队没有收编，其中一支就是刘厚总的队伍，项英要我去收编这支队伍，我就去收编了。

（随我去的还有王激明等同志）我曾在解放后，写信给湖南耒阳县，查询刘犯是否抓获？当地复信：“此人从未返回原籍”。直到“文革”期间，福州军区政治部青年科长王德茂同志到茂林地区了解情况，才找到了那个国民党排长，此人仍在，讲述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九）

这次事变的失败，从我们内部来讲，与军部机关内部不纯和项英同志不善于团结同志，对国民党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也有关系。

当时，军部参谋处长赵凌波实际上是个内奸，赵原是国民党部队的号兵，被我陕北红军俘获后仍当号兵。由于他善于钻营，骗取了信任，步步提升，直至支队参谋长和军部参谋处长。平时他就流露过一些不满情绪，和大家相处也不融洽。当时，国民党

三战区派驻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陈旦如，实际是特务，赵就是被项英指定为与陈接触的第一联系人（共两人，另一人是李志高同志）项英同志并认为赵是四川人，又指派赵凌波向川军一四四师，以拉同乡关系为名，要他了解当时国民党对我们的部署。然而事情恰恰相反，敌人了解到赵的底细后，设法收买了他。此后，赵可以随便地进出敌一四四师师部、大吃大喝，与敌人明来暗往。项英也了解这一情况，却没有引起警惕。军部拟定的作战计划，都离不开赵凌波，致使我军的机密情报都由赵透露给一四四师，枪声一响，赵就投奔到川军新七师方面去了。

陈旦如是敌三战区派驻在我军部的特务，（陈把我军部开会的内容都向敌三战区报告），致使我们的计划屡遭破坏，项英同志对他也放松了警惕，战斗一开始，同志们一致意见要把陈处决，项不同意。只将他押送出我们的警戒线。

项英同志对叶挺军长，不采取团结的态度，因为叶挺军长当时还不是党员，项英对他歧视排挤。叶挺于三九年四月在重庆曾给项英同志写过一封长信，信中有两句：“你是佛来我是泥……”。看后使人感到寒心。

项英同志的右倾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三九年黄桥决战前夕，陈毅同志电告中央和军部，决心部署作战计划。项英同志手拿陈毅的电报把我和李志高叫去，了解顽军韩德勤、伪军李长江、李明阳和苏北地方土顽及敌军的情况，他把电报给我看了一下说：

“陈毅这个人去找死嘛！敌人超过我们好几倍”。说罢拂袖而去。三天后黄桥决战大捷，喜讯传来，我军军心大振。陈毅同志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四〇年六月不顾项英的反对，直接同中央电台联系并取得支持，打破了自缚手足的错误，大胆渡过长江，取得了创建苏北根据地的伟大胜利。

皖南事变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在政治路线上的右倾和军事指挥上的动摇，造成了我军有生力量的巨大损失。但是在皖南事变中，我军广大指战员表现了英勇杀敌、顽强战斗的精神，

许多同志壮烈牺牲，许多同志不幸被俘，在敌监狱中苦斗；还有许多同志在突出重围后，把复仇的火焰燃遍大江南北，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为解放全中国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不到九年的时间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埋葬了蒋家王朝，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让我们在重温我军发展史的同时，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为今后更好地完成我军的神圣职责，为我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八一起义前后的片断回忆

丘 倜 遗 作

一九二六年冬，我从广州农讲所毕业回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到于都县从事农民协会的组织工作。一九二七年一月，接到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兼省农民协会筹委会委员长方志敏同志的电报，来到南昌。他派我在省农民协会筹委会任秘书。

当时，形式上还是国共合作时期，而蒋介石却已凶相毕露，施展阴谋，夺取领导权，派出了反共份子段锡朋等，假借国民党中央党部名义，用非法手段控制江西省党部，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排挤出去，而把一些“AB团”分子和国民党右派塞进省党部。

一九二七年三月，我们在方志敏同志领导下，迅速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同“AB团”分子展开坚决的斗争。

这一阶段，斗争是十分复杂的。左派力量把“AB团”把持的省党部捣毁，抓住了程天放、曾华英等反革命分子。其余一些反革命分子逃往各县，联络当地反动分子，疯狂地屠杀革命群众，例如永修的张朝燮同志，赣州的陈赞贤同志等都被反动派所杀害。

六月间，新军阀朱培德将共产党人方志敏等遣送出境，形势越来越紧张。但，全省的农民运动还在发展。当时，邵式平等同志仍以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身份，到各县督导农民运动。

七月间，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反共，蒋汪合流。这对南昌来说是震动很大的。不久，贺龙、叶挺的军队开进南昌，一场革命风暴将要来临。就在这个月的下旬，省委召集各机关负责人开会，

作了机密的布置：一、要求迅速采取应变措施；二、党的机关准备转移；三、所有档案文件全部处理好；四、准备好几天的柴米油盐；五、绝对保密、听从指挥。七月三十一日上午，省委又召集主要领导干部开会，正式通知：今晚进入战斗状态，听到枪声不要惊慌。

七月三十一日的晚上，我仍然在家中睡觉。半夜里，听到枪声大作，我知道起义军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心情很不平静，坐以待旦。

翌晨，也就是八月一日的早晨，我沿着东湖绕过状元桥，前往省农民协会。沿途看见站岗的起义军，领系红带、臂缠红袖，这就是叶、贺部队。我一进农民协会办公室，同志们已经在纷纷议论，有些同志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询问我。我对他们说：昨夜的枪声，是贺龙、叶挺部队起义，解决了朱培德的部队。

这时，省委送来了标语、口号、传单等文件，我们兴高彩烈地欢腾起来，大家磨墨的磨墨、裁纸的裁纸、写标语的写标语，忙得不亦乐乎。迅速地就派人上街去贴标语、发传单、欢呼起义的胜利。

我们省农协又接到通知，全市各界革命群众在八月三日开大会，庆祝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立即分别通知南昌县，新建县的县农协，动员农民群众按时参加。

八月三日上午，在皇殿侧广场上，举行了南昌市各界革命群众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工人、农民、机关工作人员，部队代表好几万人。大会上宣布了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会后并举行了群众大游行，街头巷尾，一片欢呼之声。

这天，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宣布叶、贺部队即将南下，进取广东开辟革命根据地。军队南下之后，就要放弃南昌。并布置各机关，立即将工作人员遣还原籍，机关文件全部焚毁，必要保存的可由各机关妥为保管；各机关的财物也要处理好，要求在一两

天之内办好结束工作，准备离开南昌。并规定除由省委决定的少数同志随军南下外，大多数同志应在我军撤退后，立即离开南昌，返回原籍工作。至于今后如何安排，待回到本地后听候省委的通知，此外，省委并留下极少数同志在南昌从事秘密工作。关于各民众团体的机关人员的遣散费，可以向罗石冰同志（省党部组织部长）洽领。

我开完会回到省农协，立即造好疏散人员名册，前往省党部找到罗石冰同志，他在名册上作了批示，我就到总务处领取了一大捆钞票，（武汉中央银行的纸币）回到农协交秘书处分发。同时，我们把各种档案集中焚烧，把一些家具也分给同志们搬去。

在财务方面，我们省农民协会还库存现金大约十五万元左右，另外还有两件“宝”，就是我们邵式平同志在贵溪没收来的，张天师的七星宝剑和一颗汉玉“张道陵印”，全部交给省委秘书冯任同志，因为他是留在南昌做地下工作的。

就在这一天，我得到省委负责人的通知，要我去向一位负责同志汇报江西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带着省委的介绍信，前往三道桥附近的第一中学（注）。经警卫人员带我到二楼东端的一间教室里，我一走进门，就看见一位蓄着很长胡须的同志，我仔细一瞧，啊！这是周恩来同志。因为我曾在黄埔军校四期学习，当时他是军校政治部主任，我是认识他的。

周恩来同志笑容满面地招呼我坐下，他问我关于江西农民运动的情况，有那些县份的农运比较发展，群众基础如何。我便将省农民协会成立以来的情况如实地汇报，他着重地问了关于从临川到宁都一线的情况，我都详细地作了回答。

周恩来同志是南昌八一起义的领导人，他之所以在百忙之中找我去汇报，是为了作调查研究工作，他问得很细，特别问到临川、崇仁、宜黄、南城、南丰、广昌、宁都、会昌、寻邬，直到广东的各县农运情况、反动武装情况，封建势力情况，风俗习惯

等等。他一边问、一边听、一边记。他那种谦虚、细致，耐心、认真的态度，使我由衷地钦敬。

八月五日，省农民协会的结束工作已经处理完毕。次日晨，起义军已全部撤离南昌。我同舒国藩，谢尊熹三人，决定到进贤县去工作，进贤是舒国藩的家乡，但他一到家，便把行李交给家里，他本人则避不见面，不知去向了。还把我们皮包骗走。（皮包内有手枪一支，水笔一支，长衫一件，现金一百余元。）

后来，我只好回到于都，从事秘密工作。

1978年写于南昌

（注）：当时的江西省立第一中学，是在皇殿侧、即现在的省第二保育院内。

八一起义的一个插曲

回忆朱德同志智擒敌团长

刘 刚

在举世震惊的八一起义的关键时刻，以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作了精密的部署。前委掌握到，当时驻在南昌的反动部队，主要是第三军的两个团。那时该军军长王均已到庐山参加会议去了，在南昌的反动部队的指挥权便在那两个团的正副团长手中。前委研究决定，由朱德同志出面，运用计谋，出奇制胜，智擒反动团长，打碎反动部队的神经枢纽，使其处于瘫痪状态，以利我起义军一举功成。

一九二七年的大暑季节，南昌市气候炎热。在这个极不平凡的夏天，朱德同志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使命，正在紧张而繁忙地日夜操劳。然而，他在表情上却是那么闲情逸致、风流倜傥，进行特殊的社会应酬。

七月三十日的下午，我们的朱团长（朱德同志那时的公开身份是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把我叫去，他摇着一柄大蒲扇，笑嘻嘻地对我说：“小刘，今天我交给你一个特别任务。”我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呆呆地说：“特别任务？！”他又说：“你知道嘉宾楼在什么地方吗？”我说：“知道，就在杨家厂。”（现在已改建为蔬菜门市部）他说：“对！我明天要在嘉宾楼请客，你马上去定一抬鱼翅席，摆在楼上的花厅里。你把这份请客的名单拿去，要嘉宾楼今天就把请帖发出去。”我又问他：“明天什么时候？”他说：“明天，就是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两点，这单子上都写清楚了。”

我奉命之后，立即赶到嘉宾楼去。这次请的“客人”，一共

是四位，都是第三军的军官，其中团长二名——卢泽民，肖曰文；副团长二名——蒋学文，另一个记不清姓名。除此四位“客人”之外，还要叫四名名妓来作陪。

在当时，朱德同志是以滇军少将的身份，公开同那些新军阀打交道。一九二七年初，他任南昌公安局长，我在消防队当兵，还是个小鬼。有一次朱德同志亲自来看消防队技术表演，以后，见我的武术表演得好，便叫我当他的卫士。后来他又兼任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他家就住在南昌市花园角二号。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朱德同志身穿一件白色的夏布长衫，乘坐一辆黄包车，我同陈玉昆二人一前一后跟随他来到嘉宾楼。不久，四位“客人”都带了卫士前来赴宴。叫来的妓女也来陪席。朱德同志在席间谈笑风生。朱德同志是不饮酒的，我就端了一把小酒壶，里面装的是白开水。他就用这种“酒”去敬那几位团长。陈玉昆在楼下陪着几个卫士便餐。这一席酒吃了将近两小时，余兴未尽，便相约到大士院32号（现93号）的一户妓院中去操麻将牌。

那四位“客人”迳自前往妓院之后，朱德同志抓紧这一空隙时间，赶到西大街圣公会（即贺龙指挥部。现星火路）他独自一人到后院楼上去同贺龙同志会商大事。我就在楼下的圆门边警卫排等候。大约二十分钟光景，贺龙同志送朱德同志出来。贺龙身穿军服，气概威武。朱德同志告辞之后，便赴大士院。途中，他对我交代了任务：要我到了大士院之后，立即通知陈玉昆，想办法把那几个正副团长的卫士支开，叫这些卫士明天早晨来接他们的团长。同时，要陈玉昆在完成上项任务之后，在今晚九时以前必须返回大士院，在妓院门前守卫，不让其他人入内，如果有人来找这几个团长的话，就说他们已经走了。

当朱德同志返回大士院途中，还先到李尚庸家中逗留了一下。李尚庸当时是朱培德的建设厅长。李对朱德同志是敬重的，当天李已去九江，朱德同志将一个公文皮包交给李尚庸夫人，请

他暂时保管一下，然后才来到妓院。

这时，妓院中的几名妓女，正陪着“客人”们嘻嘻哈哈的进行“竹战”，乐不可支。朱德同志一进厅内，那几个团长便请他参“战”。朱德同志说：“我是不太会打牌的，既然各位光临，就奉陪一下。”那位姓肖的团长说：“朱团长，我们来打五人局吧。”所谓五人局，就是五人抽心的打法，四个人打完了一圈，败者下来就换一个人入局，四圈就变为五圈。

此刻，我溜到大门口的侧厅里去，把朱德同志在途中交代的任务告诉陈玉昆，陈思考了一下，马上就去执行任务去了。我把妓院的大门关上，独个坐在天井侧边的小房子里。妓院的人给我送来了茶点，还来了一名妓女给我打招呼。我问她什么“宝牌”（名字），她说她叫“琼花”。我才知道她是南昌市的第一流名妓。她们这些妓女，都是为了接待这几位大客人，打扮得花枝招展，极尽其应酬之能事。

大约到了晚上十点钟左右，陈玉昆回来了。他说已把那几个卫士弄到军官教育团去看文娱节目去了。并告诉他们，今天晚上几位团长都要在妓院过夜，用不着再到这儿来坐冷板凳。

十一点钟左右，有人叫门。原来是贺龙指挥部的传令兵送来一份密件。我马上将密件送到后面去。看见朱德同志正在一旁观“战”。他看见我来了，便走出厅门，我把密件交给他看，原来是指挥部规定今晚的口令——“河山统一”。他看了就叫我保存起来。他又机警地佯作上厕所，我把陈玉昆支走卫士的情况向他汇报，他点点头，并轻声对我说：“你要见机把‘客人’的自卫手枪转移出去。”

我在厅内张望了一下，发现“客人”的手枪都挂在一个三角衣架上面。此刻，那些“客人”们已经沉醉在花天酒地之中，忘乎所以了。我趁他们拥妓取乐、呼卢喝雉之际，悄悄地把那几支手枪移走了。

子夜时分，庭院寂静，我坐在走廊下的一张竹椅上抽烟，隐

约地听到大门外急促的脚步声。我刚刚站起身来，便有人在门外轻轻地敲动门环。“谁？”我问。

“我们有事。”门外回答。

“山。”我发出口令。

“河。”门外回答。

我马上打开大门，原来是贺龙指挥部派来了一个班，由班长率领来执行任务。他们全副武装，行动敏捷。我立即同他们直奔后院。

这一班人冲进花厅后，班长手持驳壳枪，大喝一声，“不许动！”

那几位“客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慌了，那几名妓女钻到桌子下面去了。姓肖的团长望望衣架，还想拿自卫手枪，可是白了眼，只好说：“你们想干什么？”

“贺指挥官请你们到指挥部去！”班长说着，就命令战士把这几个团长押走。这时，朱德同志迅速从侧门出来，带领我和陈玉昆一同离开妓院，先到李尚庸家中取回公文皮包，便回到花园角去。我们走到街上，本来是万籁俱寂。突然，三声枪响，声透长空。朱德同志掏出怀表一看，正是两点钟。他兴奋地说：“我们开始行动了！”

霎时之间，市内枪声四起。我们刚刚走到建德观附近，就听到灵应桥一带枪声密集，料知此处已进入作战状态。当然这里是不便通行的。于是，我们绕道上水巷，经三道桥、皇殿侧再转花园角。沿途也偶尔遇到起义部队的岗哨，都凭口令通行。朱德同志并指示我们，要机警沉着，如果发生混乱情况就先发制人。

朱德同志雄纠纠地带领我们前进。此刻，满天星斗，夹杂着流弹的闪光，枪声时起时落。当我们走到皇殿侧操场时，遇上了武装部队挡住我们的去路。口令对上了，可是他们发现我们都带了手枪，而没有明确的身份证件，便要缴我们的枪。我当然不服他，以致争执起来。朱德同志和蔼地对他们进行解释，但他们坚

持说这是奉令执行。朱德同志便问清了他们的番号和那位排长的姓名，并说明了我们三支枪的枪号，便把手枪交给了那位排长。然后，我们走到了三道桥的心远中学（现在市二中）。朱德同志叫我们在传达室等候，他迳自进入到工字楼上，他在楼上很久。直到东方已经发白，天色微明才下楼。在返回花园角的途中，我问朱德同志为什么在楼上那么久。他才告诉我们，这里是指挥部的机要联络点，当时吴玉章和聂荣臻等同志都在这里。

当我们回到花园角二号时，已经天亮了。这是中国历史上闪烁着光辉的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的黎明。大约八点钟左右，贺龙指挥部送来了一封画着三个十字的信件。朱德同志看了信以后，就带我到贡院卢泽民团部所在地去。走进操场，看见满地堆积着缴获的武器。这时，就来了两个军官陪同朱德同志到后院去了。我想起朱德同志从昨天下午吃饭后，一直到现在既未休息，又未进餐，我就跑到街上去想买些点心给他吃。东跑西跑，才买到了几个面包。我回到卢团部，而门口增加了岗哨，戒备森严。再三说明也不准进门。我发急了，马上跑到江西大旅社去，准备去请示周恩来同志。我满身大汗到了大旅社，这里警卫连的同志都认识我的，我一打听，周恩来同志已外出公干。我到屋里转了一圈，看见许多同志正在喜气洋洋地忙着剪红布、做红袖章，做识别带。一走到大厅门口，看见了任弼时同志，我便向他汇报了情况。任弼时同志随即发给我一个红袖章和一条识别带。我向任弼时同志敬了一个礼，回头就直奔贡院卢团部的后院，我定睛一看，院子里的檐柱上绑着两个副团长，还有武装看守。再进入办公室，看见朱德同志正在和那两位团长谈话。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朱德同志是来处理这四个“客人”的。

我向朱德同志简单汇报了一下，把红袖章和识别带交给他。同时，把口袋里两个面包也给他。他笑了一笑说：“外面店铺都开了门吗？”我说：“有些小店子都在做生意了。”朱德同志风趣地说：“这两个面包给谁吃？这四位都饿得不得了啦。”那个

卢团长说：“不饿，不饿。”朱德同志对我说：“快去，泡一壶茶，多买些面包，”我又跑回花园角，叫王荣坤烧水泡茶。旋即提着茶壶，买了一袋子面包送去。这时，那两位副团长也坐到房子里来了。朱德同志叫他们喝茶吃面包。那位卢团长向朱德同志要求，派人到他们家里去报个信，免得家里着急。朱德同志立即叫我去。当我跑到卢团长家里的时候，那位太太正在哭泣。她听到说卢团长还在同朱团长坐在一起吃早点，马上破涕为笑。我又转请她向其他三家去报信。然后我回到花园角，这时我一身的衣衫都被汗水浸透了，便匆匆地洗了一个冷水澡，换了一件衬衣。这时，朱德同志已经由两名卫士陪同回来了。他一进门就对王荣坤说：“昨天晚上缴了我们三支枪，今天你到指挥部去领回来吧。”我说：“我去领”。朱德同志拍着我们的肩膀说：“你去睡觉吧！”我说“团长，你还没有睡觉呢！”他大声说：“去！去睡！有事再叫你。”等我去休息以后，而他老人家却又同另一位警卫员余世雄到贺龙指挥部去了。

震撼全国的八一起义，打响了对反动派的第一枪。蒋介石惶惶不可终日，迫不及待地调动各路军阀来围攻起义军。这时，我们起义部队有叶挺的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共约三万多人。周恩来是前委书记，贺龙是总指挥，叶挺是前敌总指挥，刘伯承是总参谋长，朱德是第九军副军长。

我军起义胜利，南昌城一片欢腾。八月二日，全市热烈庆祝，满街满巷都是欢呼的人群。皇殿侧广坪上还开了几万人的庆祝大会。

朱德同志为了革命的事业，日夜辛劳，席不暇暖，同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同志部署战略安排。也就在这几天之中，反动派纠集了黄绍竑、钱大钧、朱培德等新军阀部队，几面包围南昌。

八月三日的晚上，朱德同志把我叫去，对我说：“我们部队

要出发了。这一仗要打到很远的地方去，你就在南昌吧！”我说：“我要去。”他又说“你母亲同意吗？”我说：“一定会同意的。”朱德同志当即拿了十块银元，叫我去和母亲告别。

八月四日的拂晓，我跟着朱德同志出发了。那位卢泽民团长起初也参加了起义军。可是走到抚州，他又动摇了。便装病请假。朱德同志对他毫不勉强，发路费让他走了。我听朱德同志说，那三个正副团长在南昌就给了路费，让他们走了。

起义部队一路转战赣、闽、粤，沿途迂回作战，朱德同志和部队同甘共苦，冲锋陷阵。由于众寡悬殊，起义军受到严重损失。当部队到达赣粤边境的三河坝时，战斗十分激烈。朱德同志亲自在前线指挥。而我却在前线中弹，腿部受重伤。这时战况紧急，部队向汕头转进。朱德同志见我伤势严重，便指示派担架抬我走。我看见战斗这么紧张，如果派担架就势必要减少两名战斗力。我便要求让我暂时隐蔽下来再说。朱德同志考虑了一下，便决定派人把我抬到一艘汽艇上去，这条汽艇是运送一批伤病员到汕头去。临走时，朱德同志还给我三十块银元，嘱咐我到汕头后再去找部队。我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敬爱的朱德同志。

我乘坐的这艘汽艇，启航后不到三十公里，便遇上了黄绍竑的反动部队，把这艘汽艇掠夺而去，艇上的伤病员都被他们剥光衣服，统统抛到江边的沙洲上，我那三十块银元也被他们抢去。我幸好被当地群众给我一些草药，治愈了伤口。我沿路行乞、流浪颠沛，想去寻找部队，可是茫茫大地，望断天涯，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敬爱的朱德同志啊！

四十五年之后，我又幸福地会见了朱委员长。那是一九七二年的初秋季节，我前往首都，住在直一招待所。我要求见他老人家一面。朱委员长很快就电召我到他家去，并派了车子接我到钓鱼台住所。我一看见他老人家就激动得流泪。他的记忆力是多么强啊，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腿上的伤全好了吗？”接着，他留我在他家中吃饭。我还荣幸地见到了康克清同志。朱委员长高

瞻远瞩，具有真知灼见。当时正是“四人帮”猖獗作乱的时候。他老人家对我说：“现在我们党内出了特大的野心家，弄得人心惶惶，社会动荡。”他加重语气说：“不要紧的，我们会搞好国家的。”

我望着朱委员长慈祥而庄严的面庞，心潮翻滚，百感交集。我诚挚地说：“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

临别之时，朱委员长把一套《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送给我，并亲笔在扉页上题下了雄健刚劲的、对我教导的词句：

“努力学习，改造思想，继续革命。”

赠给刘刚同志

朱 德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

敬爱的朱德同志啊！您老人家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三南游击烽火

肖自立

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长征以后，留下项英和陈毅同志负责，继续领导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但是，由于当时受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斗争策略，继续采取了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集中兵力同数十倍于我之敌死打硬拼，几乎使全军复没。最后，不得不听从陈毅同志的意见，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分五路突围。三月初，中央分局和赣南省的机关及部队分两路向油山进发。他们经过千难万险，终于来到油山，和在油山开展游击斗争的赣粤边特委及信康赣雄军分区的同志汇合（当时李乐天同志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同志任特委副书记），并且于四月间在大余的长岭，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长岭会议。会上，陈毅同志讲了当时的形势，指出主力红军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之后，整个革命形势暂时处于低潮，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十六字游击方针，开展游击战争。

会议根据陈毅同志的意见，确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在军事部署上作出了分兵的决定：撤销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赣南省委等机关，把从中央苏区突围出来先遣到油山地区的部队，以及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部分伤病员，与油山、北山、莲山及信、康、赣、雄等地的大小游击队，共约两千余人，统一组成油山、北山、三南三个大队。一队由蔡会文同志（赣南省军区司令员）率领，到崇义、上犹边境，向湘东南的汝城、桂东一带发展，设法与湘赣省委和红七十一团取得联系；同时派一部分队伍到崇义的文英、左

亭一带建立游击区，争取与北山连成一片。一队留在油山，坚持和扩大老游击区的活动。再一队就是以黄成则为队长，张日清为政委，组成三南游击队，背靠油山，到三南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项英、陈毅和陈丕显同志等少数人，留在北山地区秘密活动，掌握和指挥各路游击队伍。大队下面由十几二十人组成小分队，山自为战，四出活动，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为了加强各地游击队的联系，还决定以油山为中心，建立两条秘密交通干线（交通站），一条由油山伸向三南，一条由油山伸向梅山再到北山。

由于长岭会议对当时形势看法的基本统一，对斗争方针的正确改变，对游击区域和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从思想上、方针上、组织上为赣南游击战争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三南游击队正是在长岭会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从油山经崇仙蕉山进入了三南地区，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三南游击战争的烽火，熊熊地燃烧在赣粤边境。

一

三南，包括龙南、全南、定南三县，位于江西、广东交界的地方。东接安远，南是和平、连平，西与南雄、始兴接壤，北是信丰，靠近油山。九连山脉绵延于三县境内。游击中心是信丰、南雄、始兴、三南等赣粤两省所属六县边界的青龙山地区，包括全南的社径、陂头、龙下；龙南的东坑、溪源、渡江、中坪；定南的大汶、月子及信丰的小江等。纵横二百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主要圩镇有社径、陂头、周布、东坑、月子等。

一九二五年，南雄、信丰就开始有了马列主义的传播，并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七年，南雄共产党人曾昭秀率领暴动队二十余人，到青龙山地区的楠木山一带秘密活动。一九二八年二月，当地纸厂工人钟德星等二十余人放弃做纸职业，去南雄参加了曾昭秀领导的扭角暴动。同年八月，他又率领了十二个赤卫队

员，在青龙山的大曾屋进行活动，召开了三次有一百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发展了三个党员。

一九二九年，信丰小江共产党人赖振标，以做裁缝为掩护，在全南的社径、炉径、白石下一带酝酿武装暴动。到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红三十五军来到青龙山地区，赖振标组织的二十多人的赤卫队，更加受到鼓舞。他们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打到赣州去，活捉马昆（敌团长）”的口号，凭仅有的四支单响枪、七支鸟铳，就没收了大土豪刘士升、黄步青的财产。后来，红三十五军转战信丰，赖振标也带着赤卫队来到了信丰的崇仙、小河地区。以后，他和南雄的彭显模、谢太谦领导的游击队汇合，继续在崇仙一带坚持斗争。

一九三一年三月间，这支游击队发展壮大到四百多人，分驻在崇仙的叶屋围、观音堂和细甫江等地。这时，国民党调集了六十七团和六十八团一千余人进剿。经过十余天的奋战，游击队大部分突出重围；剩下一百余人在细甫江被包围，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赖振标同志壮烈牺牲，其余战士全部遇害。国民党把杀死了的游击队员丢满三粪缸。这就是“细甫江，杀人三粪缸”的事件。

第二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属下的余汉谋部又在全南组织“铲共团”。龙下的逃亡地主刘士升，趁机勾结小江的靖卫团总陈文珍，带了二百多人进入社径、炉径、白石下等地，使尽各种毒辣手段，四处抄家捉人，杀害革命群众四十多人，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

一九三二年七月，工农红军在南雄结束水口战役回师中央苏区时，途经青龙山地区，理所当然地没收了刘士升、黄诗强的财物。贺龙同志领导的第二军团因进攻韶关，有支部队从信丰经全南龙下的凤居坑，来到龙南。当地豪绅闻风而逃。龙南县城空了。红军在县城写标语、画漫画，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十月间，赣粤边区一部分红军从信丰转到龙南东坑（原属信丰）和定南的大汶、月子打游击，从这时起，李乐天和曾彪等同志也经常

率领油山的游击队到三南的边缘地带开展活动。

三南边缘地区，红白交替频繁，反动派配合江西保安团，有时集中十几个团的兵力，对游击队实行四处包围，一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因此，三南游击队行动之前，陈毅同志曾经指示：

“游击队是武装工作队，军事行动不管怎样秘密，但我们的政治口号一定要公开、明确。当前军事上只能是防御，政治上却应当是进攻，保持党的旗帜，给群众以希望。”

当时，三南游击队约三十八人，黄成则队长不久被调走，由张日清政委负主要责任。地方工作团的肖国周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副队长，后挂花到后方养伤。（此人于1940年叛变，经我们党组织惩处。）党团组织是秘密的。开始时队伍分成两个小分队，

“北山事件”（1935年、10月20日、原赣南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带领反动军队企图捕捉项英、陈毅等领导同志）后，吴少华同志和他带的侦察班调来，就有四十多人。吴的侦察班都是短枪，也叫短枪班。因为行动方便，他们经常打前哨，当尖兵。

游击队的挺进三南，是因为这里是赣粤两省的交界地，易于穿插。这是个有利条件。但是与油山相比，又有三个明显的不同。一是经济土匪多。他们没有政治目标，不问贫富，见人就要“买路钱”，弄得老百姓好人坏人真假难分。二是土围子多。这些土围子往往由反动豪绅把持，一个村寨就是一个堡垒。围子的四角有炮楼，围子四周的墙上有枪眼，易守难攻。三是民间枪多。他们被土豪山霸利用，有的充作保镖，站岗放哨，有时游击队一到，就四面听到枪声。好在游击队大部分都是红军战士，都有坚强的信念，不怕死，不投降叛变（三年中没有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叛变）。为了宣传鼓动群众，游击队按照陈毅同志在“政治上主动进攻”的指示，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实行抗租抗债”“消灭反动武装”等明确的政治口号。游击队在群众中还特别注意了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快取得了广大群众的了解和支持。

游击队第一步是在青龙山地区的社径开辟工作。

青龙山位于全南的东北角，距县城一百二十多华里。东与信丰崇仙的蕉山隔桃江而相望，南与龙南的溪源相邻，西北是广东的南雄、始兴，正北便是油山。山势雄伟，活动范围也较宽阔。除里山有内半、鸭卵洞、炉径、杨眉石、潭口和外山的竹山、陂头、社径、龙下等地外，还有炉径的楠木山和围峰、刁公坑等，大小不等的山头，是个谷深林密，四季常绿的万宝山。出产大宗的竹、木、油茶、土纸、桐油、茶叶等。社径圩上二十余家店铺，有十九家是鸦片烟馆。当地不少人因抽上鸦片烟，弄得面黄饥瘦，倾家荡产。有个顺口溜说：“鸦片烟子番方来，大家晓得是棺材；晓得棺材装死佬，也有人家睡得来。”又有副对联写道：一支竹枪，杀去许多英雄豪杰不见血；半盏灯火，烧掉不少田塘屋宇不见灰。

这里苛捐杂税繁多，反动当局在社径圩设有厘金税卡。农民每年要交的租税有田赋税、灶头税、屠宰税、人头税、地保税、酒税、斗税、百货税和兵役谷、学谷等十多种。龙下、社径、陂头的地主黄步青、刘士升、黄诗强等，拥有大量的田地和山场。仅刘士升一家，就有田三百多亩，油茶、木竹山场一千三百多块。他的店铺开到了赣州、南雄、龙南等地。农民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有一户六口之家，大儿子被抓壮丁，二儿子被卖，三儿子送了别人，四子因妻子被迫改嫁，弄得妻离子散，走投无路。为了救民于水火，游击队的斗争矛头就是对准那些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早晨，游击队用“老鹰抓鸡”的办法，突然袭进船寨这个土围子，抓住大土豪黄运镇、黄运伯，罚了一大笔银款。这是游击队来到三南的第一次打土豪。

接着，在塘背，游击队装成买牛的进去讲价钱，把带有保鏢，耀武扬威的土豪赖瑞发抓住。

在鹅公山，用伏击的办法，活捉了土豪钟显元，并收缴了长、短枪各一枝。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游击队在内半一带初步打开了局面，地方工作团也在这年的十二月，秘密发展了仲泽兴、黄士英等七个党员。次年四月，坪岗山党支部建立。从此，三南游击队就以这里为基地，逐步向周围扩展革命势力。

二

游击队初步站住脚后，进一步对土豪劣绅开展斗争，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龙南的象塘，游击队趁朝“五谷”打醮（一种求神保丰收的迷信活动）开场聚赌的时候，冲进赌场，抓了土豪仲光晨，罚了他一大笔款。并且张贴布告，那时游击队经常变换番号，有时署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队，有时又署名工农红军某纵队，政委张星等（张日清同志的化名），为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游击队逐步向圩镇扩展，有时趁着圩日，化装成卖柴的农民，冲进圩场的厘金卡子，缴税警的枪，在圩上散发传单，警告坏人，宣传教育群众。社径有个伪联保主任，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霸。游击队拂晓前冲进了圩场，这个家伙吓得躲在炮阁上没有抓到。但是打击了他的反动嚣张气焰。

一九三六年四月间，早在定南大汶、龙南东坑一带活动过的吴少华同志也率领他的小分队袭击东坑，捉住了开鸦片烟馆的老板廖瑞业，处以罚数。

那时，打土豪有几种意义。一是没收土豪敲榨勒索来的财产，分给当地穷人，宣传提高群众的觉悟。二是收缴反动地主武装，以武装游击队本身和地方秘密发展的民兵。三是筹款。游击队向三南进发时只带了三十块银元，赣粤边特委当时不但没有军饷发下来，还规定每月要向特委上交一百元光洋。为此，游击队常常夜间行军，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土豪筹款。

在斗争中，除了对政治上十分反动、残酷压榨群众而又民愤极大的劣绅、恶霸进行镇压以外，一般的只有经济剥削的只采取罚款的办法。罚款时，一般先由地方工作团调查。当时规定，收

租不超过一百五十担的不属罚款对象。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也有过头的地方，在调查中，很是注意了走群众路线，尽量做到不打错，不杀错，不侵犯中农利益。有时抓到土豪，先关一段时间，再调查他们的剥削情况和政治上做不做坏事。然后，警告他们不要与游击队作对。有时土豪本身逃走，丢下妻儿，游击队就把他们作为人质带走，但不加害他们。有一次，一个土豪的儿子爬山爬不动，游击队员还背着他走。有时对打错了的，游击队还进行赔偿。用这样的方法，很见效果。既惩罚了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又争取分化了一般的豪绅，利用他们为我们工作。如有的经过教育回乡以后，果然写信给游击队报告消息。有的还替游击队购买布匹、衣服、电池、鞋子、药品等。也有的回去以后继续做坏事，游击队就再次警告他们，指出若再执迷不悟，必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游击队在青龙山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豪绅无不时刻企图加以扑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游击队打了船寨的土豪不久，国民党就从南雄调来了广东军三百余人，并纠集了一伙地方反动武装，向内半的塘坑子进剿。游击队巧妙迂回，敌人才一无所获。

这年冬天，在下山的地方，游击队将大汶区伪保长、经常勾结省保安团和地方上的地痞流氓进攻游击队的华辉煌逮捕镇压。接着又将“十八兄弟会”成员陈荣彬除掉。

一九三六年四月，龙下的反动豪绅刘士升和伪保长曾广泽，纠集地方反动武装，伙同广东军杨匪的一个营，共三、四百人，进剿龙下的鸭卵洞，抢劫了鸭卵洞人民的财产，抓走了三十多个群众，并在龙下圩杀害了革命群众钟明燕、钟北斗等五人。接着又采取搜山、并村的方法，强迫移民。

尽管敌人手段万分毒辣，但游击队机动灵活，平时化整为零，分散做群众工作；当敌人步步进逼时，则化零为整，按照“赚钱就来，亏本不干”和“敌退我进”的原则，多次粉碎了敌人

的进剿。一九三六年五月间，广东军一个连会同伪保安团二百多人来到龙南东坑的凉伞径一带，扬言要把游击队一网打尽。结果，他们连游击队的一根毫毛也没有碰伤。敌人恼羞成怒，只好将凉伞径的秘密交通员陈维添同志捉去。陈维添同志临危不惧，在严刑吊打下始终没有吐露一点游击队的消息，敌人没有办法，只好将他押送龙南。古历四月十八日，在龙南县城被敌人杀害。解放后龙南县人民追认他为烈士。

一九三六年六月，游击队从社径一带迁回到定南大汶时，驻在甲窝里。伪保长陈志忠和“十八兄弟会”匪徒，向保安团第八中队的中队长童匪告密，几百人来到甲窝里围攻游击队。游击队得到消息后，立即隐蔽伏击，在敌军行至当径时，集中火力向童匪狙击，战斗近六小时，毙敌十余人，伤的也不少，俘敌二人，缴枪十余支。

在敌人进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游击队能够保存自己，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粉碎他们的进剿阴谋，并发展游击斗争，主要靠的是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略战术和高度的革命警惕。平时，如有队员外出执行任务未按时返队，其他的队员就立即转移，只留下个别队员观察有无意外情况。要打圩场时，先派人侦察清楚，敌人何时会来，有多少人，周围地形怎样？敌人打援怎么办？自己的兵力应该怎样部署、岗哨警戒应怎么布置，有无退路？有无地方的反动武装参加等。情况摸清楚以后，就选择圩日，在天亮以前，赶到附近的山上埋伏，短枪队就化装成老百姓，担柴、挑箩同群众一起赴圩。到了圩上立即分散。有一次，在一个圩上，保安队分散到酒店喝酒。中午时分，侦察队员放了一枪信号，隐蔽在山上的队员立即冲下山来，守住圩口。一部分人进酒店搜索。那一次打死伪保安队二、三十人，还缴了许多枪枝，散发了传单。这一仗打得很好，敌人增援部队还没赶到圩场，游击队就神速撤走了。

还有一次，在南雄的一个圩场上。驻圩的保安队一部分收税

去了，留下的正在赌钱。游击队员挑着柴担，混进了保安队的院子，朝天打了一枪，墙上的枪还没来得及取，匪兵就当俘虏。去收税的从外面回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被游击队缴了械。

当然，在长期的战斗中，游击队也有失利的时候。一次是在龙南的早禾坪（现渡江公社斩木大队），与保安团的兵相遇，被困在围子里，突围时牺牲了三个同志。在塘仔的一次战斗中，游击队也被敌人冲散，有所损失。

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利用全国人民抗日的要求，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余汉谋的军队从大余、信丰、龙南、南雄等地撤走，剩下的江西保安团吃了几次败仗之后也把脖子缩起来了，反动豪绅失去了靠山，惶恐万分。这时游击队才有喘口气的机会。

当时，在整个赣南游击区，有些同志对这个形势认识不清。有的甚至提出要恢复苏区，搞公开政权。陈毅同志曾为此召开过会议。他指出：“蒋、陈之战是敌人的内部矛盾。他们都是坚决反共反人民的……他们（指陈）大喊‘反蒋抗日’，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这说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愈来愈尖锐了……”陈毅同志还指出：要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积极开展工作，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不能动摇，否则就要吃大亏。陈毅同志还亲自起草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提出了“反对军阀战争，实行抗日战争，变军阀战争为抗日的革命战争”的口号。

当时，三南游击队和特委失去联系，并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特委收款的刘邦华来了，讲起“两广事变”，并带了《为两广事变告群众书》这个材料。游击队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并且立即组织队员日夜抄写，派人四处散发、张贴，一时信丰、南雄、龙南等县城都有游击队散发的标语、传单。游击队也乘虚出击，扩大了游击区，最远的打到了南雄的水口。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游击队先后在龙下、塘背、鸭卵洞、

河田江、斧条、火烧围和社径的何屋、炉径的罗地、扬眉石，龙南的东坑、溪源、中坪，以及信丰的小江、罗结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收缴了反动地主武装长短枪百余支，筹集了光洋四、五千元，还分给当地穷苦农民不少稻谷、衣物，有力地打击了地方反动势力，牵制和分散了敌人进剿游击区的兵力，支援了油山、北山游击队。同时发展了秘密民兵组织（约二十多人），地方上建立的党支部也多了。党员已发展到二十三人。有信丰小江中心区委，后改社径区委，陂头、龙下有分区委。龙南的溪源、东坑，定南的大汶、月子，也有了党的组织。七月间，信南县委由信丰崇仙迁至炉径的楠木山，建立了以青龙山的楠木山为中心的游击区。罗士珍是当时的信南县委书记。

三

游击队进入三南以后的斗争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早在一九三五年，广东军阀陈济棠所部的余汉谋的第一军就开进了赣粤边区。他的第一师部署在大余、南雄，第二师就部署在信丰和三南一带。江西保安团的第三大队九个中队分驻在龙南的东坑、信丰的小江，全南的龙下、社径、陂头，定南的月子岗等地。对游击区形成夹击态势。

为了隔绝群众与游击队的联系，他们采取“封坑并村”、搜山及山烧光、人杀光、屋烧光的三光政策，强迫群众搬迁。当时，社径一带的白石下、塘子，龙下的鸭卵洞、河田坑、塘背、内半，东坑的上山、凉伞径、望半天、定南的大汶等地的群众被迫迁居了三个多月。与此同时，他们对圩场也进行了封闭，限制群众购买粮食、油盐的数量，给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当时游击队用竹筒做饭，石板当床，真是“头顶蓝天当瓦房，广阔大地是睡床，杂草树叶当垫被，一遇下雨就泡汤。夏天满山是蚊子，冬天霜雪透骨寒，夜夜摸黑走山路，月月岁岁踩山岗。敌人封锁我断粮，野菜野果充饥肠。艰苦日子齐奋斗，团结一心打豺

狼。”

那时，游击队遇到断粮，春天就吃春笋，夏天吃杨梅、吊薯，秋天吃酸角、野葡萄，冬天吃椰藤果。艰苦的斗争也使游击队表现了“坚持斗争必胜利，消灭蒋匪求解放，敌人日子不久长，红旗定会高高扬”的艰苦奋斗和革命必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敌人的封锁限制，也更激起了群众对反动派的愤恨。他们分散购买粮食、盐和日用品，用谷箩、竹筒秘密装好，以进坑种田、上山砍柴为名，勇敢机智地给游击队送去。游击队成员本身很精悍。大多数是红军战士，有的是排长当战士，连长当班长，战斗力强。秘密党、团员又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是与特委失去联系的半年多内，很难得到上级的指示，全靠自己作主，山自为战。那时三年没有看过报纸，也没有主力红军的消息，对特委的行动也不清楚。当时，政委张日清同志只有十八岁。经常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队员情绪，还要考虑保存队伍，不被消灭；考虑与群众的关系。因为长久与外面隔绝，有时国民党的运输机从山顶上飞过，战士们还以为是红军的主力回来了。有时意想不到，又会与敌人相遇。他们除了对付广东军、保安团与地方反动武装以外，还要经常提防地方的反动分子与叛徒的告密和破坏。三年内，游击队本身虽然没有出过叛徒，但个别地方工作团和交通员也有被迫出卖同志的。有的反动分子秘密给反动派报信。一九三六年初，在船寨杀了坐探黄迷眼、罗卜头。五月间，惩处了给反动派报信的曾广元、曾广义。刘邦华同志被一个叛变了的工作团尾随着。他却机智地把叛徒带到游击队那里，设法惩处了他。

叛徒背叛革命的罪行，主要是在群众中揭发，让群众知道谁叛变了。并且掌握他们在搞什么破坏活动。有的叛徒一旦被发现，游击队就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尽快把他干掉。

那时，除了武器以外，游击队随身少不了两样东西：一根棍

子，一个电筒。驻地不能固定，经常转移。伤病员送到较边远的“后方”疗养，那时有个草药医生。为了防止敌人搜山，队员们选择地形要求很严。一是看地形是不是隐蔽；二是看有没有退路，相互之间便不便联系；三是进山有几条路，敌人可能从哪条路上来；四是附近有没有群众；五是敌人在这里搜过山没有。一般地说，敌人搜过的地方，就不会再来了。如果地形选择不当，往往就会遭到敌人的袭击，受到损失。在龙南的早禾坪那次失利，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选择地形不当，致使三位同志不幸牺牲。

为了严格保密制度，游击队制订了五条保密纪律：一、不在山上烤火和生火做饭。二、行军说话要小声，走路尽量走小路。三、进出隐蔽地带不留脚印，踩倒的草要扶起。四、外出执行任务要按时归队，没有按时，归队要如实讲明情况，并愉快接受组织审查。五、没有任务，个人不准单独与群众谈心。当时张日清同志编了个顺口溜说：“心中有敌情，保密要记清，队员是本钱，行动要谨慎，保存我力量，狠狠打敌人。”

有时万一遇到敌人搜山，队员们就立即分散开来，单独找地方隐蔽。队员们经常今天这个山，明天那个山，晚上才能下山到熟悉的群众家里弄点饭吃。吃饭也往往是吃一顿，用把缸带走一顿。有时几天吃不上饭。有一年过春节，山上下很大的雪。队员们到一个只有四、五户人家的叫老虎嵯的地方，买了些鹅、鸭，准备打牙祭。可是鹅、鸭还没煮烂，哨兵的枪就响了。队员们急忙往山上跑，牙祭也没打成。晚上回来做饭吃，敌人又来了，只好又走。

那时每人只有一件卫生衣御寒。休息时在树下垫点树叶当床铺，每人只一条单被，两三人挤在一起。冰封雪冻的冬天，队员用把缸装的饭，常常冻成冰柱子，要敲开来才能吃。那时又不敢生火，因为反动派常派有看烟队、听声队。晚上行动，队员们常常摔倒。有时就不幸溜下山去。

一九三六年以前，特委书记李乐天同志常到三南指导工作。

后来联系隔断，到“两广事变”以后，敌人变本加厉地对三南进剿。斗争更加艰苦。一九三七年三月，他到三南来，走到崇仙，就遇到敌人的围攻，激战了很久，终因寡众悬殊，壮烈牺牲。李乐天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值得深切怀念。

敌人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政策，给游击队增加了更大的困难。游击队一方面依靠群众帮助，一方面采取化装分散赶集的办法，采购所需用品。特别是敌人经常冒充游击队，挑拨和破坏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游击队特别注意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买了群众的东西一定给钱，借了群众的东西一定归还，群众有困难热心帮助。时间一久，敌人宣传游击队“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鬼话一点也不灵了。群众一看游击队的行动就能分辨出真假来，知道谁是真正为了群众，为了革命。因此游击队与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在艰苦和关键的时刻，群众作出了无私无畏的援助。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有一次，事务长张三木在群众家里给队员们搞饭吃。敌人突然来了，群众就说是他们的亲戚，安全掩护了他。有一次，敌人清乡，游击队就住在龙南上山何泰旺家的楼上，由于群众的保护，敌人到了楼下也没有发现游击队。

一九三六年二月，敌人封锁圩场，内半有个妇女经常替游击队购买食盐、电池。有一次，她被敌人抓去，严刑吊打，踩杠子，回去后，她仍然坚持支援游击队。龙下茶山有个叫蓝祥浩的群众，把大茅竹的关节凿通，放进了二十斤盐，以做竹枧引水灌田为名，暗中送盐给游击队。敌人封坑并村时，群众把粮食埋藏起来，告诉游击队去取。桃树坑有个林冬粘老汉，豆豉、干鱼自己舍不得吃，却设法转送给游击队。炉径有个群众叫谢天来，他经常把粮食藏在竹筒里，把米糕缠在腰上，把鞋子穿到脚上，把烟丝装进烟袋，通过敌人的检查哨送到山上。有一天，他在社径圩替游击队买写传单的字，被密探发现捉住，他坚强不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圩门口。

游击区的许多交通员，都是由基本群众担任，他们都赤胆忠心保卫自己的游击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游击队驻在大汶的小艾村。反动分子陈义福，伪保长陈志忠率“十八兄弟会”匪徒和驻大汶的保安团一个中队，共三百余人前来“围剿”。交通员立即向游击队报告，向敌人狙击，敌人大败而去，匪首慌忙逃往龙南城。一九三七年初秋，游击队在定南与信丰交界的“封母垌”活动。当地交通员获得定南月子乡自卫队李国雄等前来围剿的消息，游击队立即分三个小分队埋伏，由一个小分队去引诱李匪。边打边退。李匪认为游击队兵力少，拼命追击，待到伏击圈内，游击队的火力齐发，匪徒退却已来不及，死伤近三十余人，游击队缴获枪支三十余条，子弹六百余发，这是游击队在大汶地区给敌人一次最沉重的痛击。

激烈的斗争，使游击队员们锻炼得更加机警，也更加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队员中有个外号叫老索牯的很会开玩笑，遇到难过的险道，他便叫起三国上说的“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时讲的笑话使人笑痛肚皮。有个叫小残废的小鬼，胆子很大，经常外出执行侦察任务，他个子小，不易被人发现，常常深入到敌人的巢穴。有时被敌人发觉，被包围了，他也能机警地逃出。有一次，一个伤员被敌人抓去关进了碉堡。他机智勇敢地钻进了敌人的碉堡，把伤员救了出来。

艰苦的环境和激烈的斗争，使游击队和群众结成了血肉的联系。也使游击队本身锻炼得更加勇敢机智，充满信心。这是游击队能生存下来，不断粉碎敌人进剿的重要原因。

四

“两广事变”，果然如陈毅同志所说的那样，不久就以余汉谋投靠蒋介石而告终。九月间，蒋介石派他的嫡系部队四十六师取代广东军向游击区发动更加疯狂，更加惨无人道的“围剿”，给游击区带来严重威胁。一九三七年一月的一天，信南县委书记罗

士珍，转来特委的一封指示信说，为了保持中心游击区，保证“后方”和群众的安全，游击队必须到红白边缘地区去活动，“牵牛出山”，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信上明确规定：游击队必须在当晚立即行动，如果有误，必须负完全责任。并补充了一个班（秘密民兵）的兵力。当时，张日清同志接到这个命令，内心斗争非常激烈。一是这里的工作刚开辟，又要到新区去活动。二是天气寒冷，又没有军费，队员的给养很成问题。但是，张日清同志以革命的全局利益为重，坚决执行了这一任务。那天，天正下着毛毛细雨，路很滑，队员们在脚底下绑几片笋壳，拄着棍子上路，每人手上系一条白毛巾作标记，炊事员用夹被包着当锅用的脸盆，伤员也坚持上路。当时，没有地图，不敢走大路，只拣山区小路有香菇棚、纸棚的地方走。一连三昼夜行军，到第三天，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绕道到了全南和龙南交界的陂头地区。他们白天躲在山上，晚上行动，边走边向香菇棚、纸棚工人作调查。路上还打了一个土豪，罚了他二百元光洋，三十套绒衣。在陂头附近又建立了十多个我们的落脚点。有的搞到了敌人碉堡底下，弄得敌人惶恐万状，草木皆兵，出色地完成了牵制敌人兵力的任务。

为了扩充武装力量，张日清同志这时曾化装去广东和平县买枪，带路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群众。张日清同志身穿长衫，化装成少老板模样。后来因敌人封锁很严，枪未买成。

二月下旬，游击队又返回了中心游击区。三月，伪保安团驻社径等地五个中队三百余人步步为营，进剿炉径游击区刁公坑。七、八十名游击队员分成两队，分别在石下的坑口和坑尾埋伏。因为坑口与坑尾相隔太远，首尾不能相顾，坑口的四十来名队员便与三百余名敌人展开搏斗，结果反被敌人冲散，牺牲了好几个游击队员。

一九三七年三月，信南县委在楠木山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参加的有县委委员、中心区委、分区委、游击队干部二十余人。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的成绩，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继续发展

壮大党的组织，扩大游击队伍，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斗争，进一步巩固与扩大游击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开展打土豪活动。

据张日清同志回忆，他因率领队员在外线出击，未参加这次会议。但在游击队本身，也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进一步克服单纯经济观点，贯彻区别对待的政策，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做好党团员的思想工作，克服忙于打土豪的某些游击作风。

之后，游击队分成三路，一路返回信、定、龙边境的东坑、月子、大汶一带；一路去全、龙边界的溪源、早禾坪、王坑等地；县委和游击队负责人则带一路坚持在中心区。

“两广事件”之前，和特委失去了半年多的联系，现在恢复了。通过“牵牛出山”，陂头和社径也联起片来了。不久，游击队又转战到了信丰的小江、罗结一带。

五

正当游击队一路打了二十几个土豪，从信丰返回三南时，信丰的保安团派了个代表带了一封信给张日清同志，说红军已归蒋介石指挥，游击队要“归正”下山，粮饷由他们负责。当时张日清并不知道外面的形势已有变化，听了敌人这样的口气，心里很是生气。当即把来人轰走了。但他心里还是怀疑：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还要“归什么‘正’”难道要“归”到他国民党反动派那里去。不管，还是干我们的。又边打边走，回到了炉径地区。

一九三七年八月底的一个中午，游击队正隐蔽在扬眉石背后的九岭山上。忽然，事务长张山木（福建人）从山下村子里煮饭回来，报告张日清同志说，特委派了陈丕显、罗士珍等三人来，要游击队下山。张日清同志听说叫下山，心中怀疑。便叫张山木带了两个彪形队员，去问他们有没有上级的指示，如果没有就把他们捆起来。张山木去了个把钟头，拿了《抗日救国十大纲

领》、《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及《义勇军进行曲》等上来，还有一封特委的信。这时，张日清同志才相信，才把队伍带下山去。到了扬眉石，和陈丕显同志见面交谈以后，才知道原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答应抗日，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丕显同志传达了特委的指示，住了两天就到信丰去了。从此，游击队才住进房屋、架了床铺。三年没有在床上睡过觉了，真有说不完的舒适。吹号的队员把埋藏的小号也挖出来吹了。游击队利用了这段时间上课、休整。这时，保安团又派大队长肖礼文前来谈判。他系了武装带，坐了轿子，神气十足，不可一世。见了张日清，就提出三条：一、停止敌对的军事行动，游击队开到陂头改编，二、粮饷由保安团供给，三、行动属保安团指挥。张日清同志听了，当时六腑冒火，用力在桌上拍了一掌，用严峻的目光，厉声对肖礼文说：“现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办事，我们是联合，不是投降。要想打歪主意，办不到。”接着，张日清同志回答了四条：“一、双方停止敌对行动是应该的。二、游击队到什么地方整训，只能听从自己的上级指示，保安团无权过问。三、不接受保安团的粮饷供应，但不得限制游击队向群众购买物品。四、游击队准备到陂头社径圩上巡视一圈，保安团不得出来干扰。要是同意上面几条，就算是你们有诚意，否则，合作不成，由你们负责。”肖礼文见捞不到什么油水，只好诺诺连声地走了。张日清同志估计到，要取得谈判的胜利，必须显显自己的威风，才能叫对手不敢轻举妄动。于是七、八十个游击队员和民兵，一律穿起广装，帽子上缀上鲜艳的红五星，打起绑腿，从扬眉石到陂头，经周布到社径，再经内半、炉径返回扬眉石集中。一路上吹起军号，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所到之处，果真杀猪宰牛，鸣放鸟铳、鞭爆，由国民党的乡长、保长出来迎接。保安团只好缩着脖子，躲进驻地，不敢动游击队一根毫毛。

一九三七年九月，游击队赶到大余的板棚下整训。这时，新招了一个“小鬼班”，还扩充了队伍。后来这批青少年就成了新四军青年教导队的骨干。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南游击队一百多人，浩浩荡荡，开到池江，与赣粤边境的北山、油山等游击队汇合，集中编入了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为司令员）二团二营六连，开往江南抗日战场，投入新的拯救中华民族的伟大斗争。张日清同志被派在新四军教导队，赴南昌学习。吴少华同志被编在六连当排长，后来牺牲在抗日战场。

三南游击队从诞生到发展，从青龙山扩大到三南，从被动局面变为主动局面，充分证明了陈毅同志提出的小规模、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行之有效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赣粤边游击队通过分兵三南，创建三南游击根据地，扩大了整个游击队的回旋之地，从战略上牵制了敌军的大量兵力，减轻了对油山和北山的压力，并起了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作用，从而分散了蒋介石追堵主力红军的兵力，使主力红军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三年游击斗争的实践，也锻炼和培养了一批久经考验的干部和战士，为新四军提供了一支有丰富游击战争经验的队伍，为以后开展的抗日战争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附注：此稿是根据原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同志的回忆和三南各县的县志、革命斗争史料，以及实地采访综合编写的）

九江革命斗争片断回忆

桂家鸿

九江，北濒长江，南临庐山，东扼波湖，西倚幕阜。其地理位置构成江西的北大门。汉置柴桑郡，西晋置江州，唐置浔阳郡，明清以来设九江府或浔阳道。辖九江县以及瑞昌、德安、星子、湖口、彭泽等县。九江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历来为江西粮、油、瓷、茶、木材……的集散地。因而，她便形成江西的政治经济中心。同时，九江地势险要，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

远在1858年（咸丰八年），由于清廷腐败，被迫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划九江为通商口岸。从此，英帝在九江设立租界，并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各帝国主义者接踵而来，英商太古洋行，怡和洋行；日商日清公司；美商美孚、亚细亚公司等等，均在其炮舰政策之下，将魔爪伸进了九江。

帝国主义势力在九江恶性膨胀，喧宾夺主，奴役中国人民。而腐朽的民族败类，封建王朝的官僚，不仅不引以为耻，反而卑躬屈节，拱手相迎。

广大的中国人民，决不容忍自己的祖国被帝国主义者所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维护祖国的权利，从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先后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九江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许多可歌可泣的往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兹就个人见闻所及，以及亲身经历的部份往事，略述梗概，以供参考。

一、“五四”运动时期的九江

“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窃国大盗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

吞噬中国的二十一条引起的。而这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第十九条，正是出卖九江的契约。其中规定：武昌与九江、南昌之间的铁路基建权让与日帝。九江人民对此是义愤填膺，坚决反对的。

震撼世界的“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九江学生立即响应。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各校学生代表集会协商。五月七日，九江以三中、第六师范两校学生为前导，高举“还我河山，挽回权利”的横幅，高呼“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在全城示威游行。九江市民、店员、工人都不约而同地参与示威行列，慷慨激昂，并肩前进。

在学生和工人的爱国行动感召之下，社会各阶层闻风而动，纷纷通电北京袁世凯政府和广东军政府，坚决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月十四日，全市学生、工人、商民再度在九江府城隍庙举行群众大会，会后又一次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学生运动的蓬勃开展，伸张了正义，树立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因而吓坏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当时的九江镇守使吴金彪、九江道尹傅春官等反动官僚，勾结当地劣绅徐子宜、鄢振亚之流，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操纵之下，施展阴谋破坏活动。他们以“学生闹事”为由，责令各校阻止学生出外集会。尤其是教会学校如同文中学、南伟烈大学，竟然将校门上锁，并严禁学生离开课堂。可是他们的卑鄙手段，在学生面前丝毫不起作用。学生们冲破了学校当局的阻拦，分批分组潜赴城外濂溪墓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分赴南昌、汉口等地请愿。并分别组织十人团，进行宣传工作，发动各界民众不用日货，不买日货，不卖日货。策动商会召开商民大会，制定爱国公约，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在此期间，九江的工人阶级积极响应上海工人的“六·五”大罢工，以及支持唐山、长辛店的工人爱国反帝运动。九江码头工人一致行动，拒绝装卸日货，实行大罢工。人力车工人也不运送日货，全

市学生罢课，涌上街头进行宣传。商民酝酿罢市，从而形成联合革命行动。

记得有一个生动的插曲，就是当时的九江商会副会长辜竹平，唯利是图，居然违背商民大会通过的爱国公约，擅自贩卖日货，并妄图阻止商人罢市。被店员察觉之后，纷纷登门责问，辜竹平在群众的怒火面前，吓得面如土色，狼狈逃窜。

在罢工期间，九江学生联合会为了支援工人的正义斗争，发起了募捐运动，几天之内就募集捐款达铜钱四百多串。学生派出代表将捐款送到工人罢工指挥部，当时工人领导同志表示感谢学生的支持，但是婉言退回捐款，要学生把这些钱用于扩大宣传，壮大革命的力量。这就更加感动了广大群众，把运动推向高潮！

可是，九江的日清，怡和，太古，三北，招商五家公司的买办资本家，竟然指使一帮把头流氓，对工人进行威胁利诱，破坏罢工，并且偷运日货，投机捣把。事为工人罢工领导机关所察觉，立即会同学生联合行动，搜查仓库，查获“六合昌”、“应如大”等商店的日货数百箱之多，并全部加以封存。

反动当局极为惶恐，于是采取阴谋手段，妄图扑灭工人和学生的爱国火焰。下令各学校提前放暑假，停止学期考试，并把下学期开学日期推迟。企图达到破坏爱国运动的目的。

然而，他们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全市各学校学生自治会联合起来，打破学校之间的界线，利用暑假时期，按地区组织宣传队，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更进一步地激励了广大群众的爱国思想。

二、“六、七”惨案前后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之后，九江工人阶级展开了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这一时期，九江的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自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严延生同志回到了九江。他是一位优秀的铁路工人，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出席了国民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来九江之后，会同李穆（南昌地方支部委派）和周一尘（九江码头工人）等，筹建九江的党组织。同时，团省委为了加强九江学生运动的领导，派陈斌（南昌黎明中学学生）来到九江以转学到第六师范的身份出现。

经严延生、李穆、陈斌、温眷血等同志研究，报请团省委批准，派陈斌为九江共青团书记。这时，严延生同志是党的小组长，党小组成员有李穆、周一尘等同志。由于党团组织的建立，九江的工运和学运就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

当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六月七日，九江的工人和学生，为了抗议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屠杀中国工人，全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民罢市。并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可是，当游行队伍在英、日租界附近示威时，遭到英、日帝国主义者开枪射击。不久，日帝又指使“日清”码头趸船上的走狗袁阿发毒打工人刘才明，并将刘才明推下趸船，落水致死。

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更加激起了九江人民的万丈怒火，全市人民敌忾同仇，坚决地断绝租界的一切生活供应。工人、学生组织的宣传队布满全城内外。六月十三日，愤怒的示威人群冲进租界，高呼反帝口号。而民族败类，军阀邓如琢（九江镇守使）与帝国主义者相勾结，以维护租界秩序为名，派遣兵痞，手持木棒，伙同英、日海军陆战队，疯狂地对付示威的群众。但是，坚强无畏的游行大军，奋起斗争，把九江英、日领事馆的门窗桌椅统统打得稀巴烂；把日帝的台湾银行烧成灰烬，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汉奸走狗的狂暴气焰。那些色厉内荏的帝国主义者，在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工人、学生、群众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纷纷逃往各自的军舰，夹着尾巴逃跑。

九江人民反帝斗争，是和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相呼应的。当时，江西全省学生联合会为了声援九江学生和工人们爱国反帝斗争，派出南昌市各大中院校的学生代表一百人，前往九江支援，笔者当时是代表团的团长。当我们到达九江火车站时，九江三中、

六师的学生代表到站欢迎。并于到达九江的当天晚上，在九江六师召开盛大的欢迎会。三中、同文、儒励、南伟烈、永师等七个学校都有代表参加。大会由共产党员、六师学生陈斌主持，他致了欢迎词，我也在会上发言，对九江的学生、工人致以慰问，并表示坚决支持，并肩战斗。九江学联代表欧阳昆也作了热烈的发言。会议正在慷慨激昂进行时，军阀头子邓如琢，却恬不知耻地大耍淫威，派兵包围会场，并把我们的学联代表团强行赶到龙开河小学，派兵监视，断绝我们的粮食和水源。

九江学联为了营救我们，便设计选派了一些学生化装小商小贩，提着大饼油条、麻花、茶蛋，到龙开河小学的前后左右叫卖。我们之间挂上了钩之后，便机智地同这些“小商小贩”调换服装，混出大门，然后继续到工人学生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工作。事为邓如琢的密探所侦知，又出动反动军警，强迫代表团成员返回龙开河小学。此时，九江学联代表陈斌、欧阳昆等来到龙开河小学，向代表团介绍了他们同邓如琢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军阀不得不撤去包围的经过情况。

代表团在完成宣慰工作任务以后，满怀豪情地返回南昌。

三、北伐军攻克九江见闻

正当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之初，中共九江小组便号召大、中学生组织起来，利用暑假，开展活动，迎接北伐大军。

当时工人运动也开始活动，纱厂工人、店员工人、人力车工人、火柴厂工人、挑运工人，都在酝酿罢工。码头工人酝酿银元兑换率的工资发放问题的斗争；其他各厂酝酿改善待遇的斗争。农民也行动起来，分别组成农民小组。例如大龙堡的农民在花渺儿等的策动下，组织“鲁班会”，制造梭标、炸药、旗帜。长江北岸的陆家咀、小池口、团洲一带也都开展了活动。

中共九江小组还派遣了部份菜农中的党员，深入到军阀部队（周凤岐师）的副官处，相机策动该师各团、营、连的采买人员

弃暗投明。虽然并没有什么成效，但也起到了一些宣传作用。

二六年的六月，我接受全国学联的嘱托，从上海返回江西，到九江的赤松、九莲等乡协助搞农民运动。这时，中共九江特别支部宣告成立，地址设在九江市赵家花园。陈斌是特支书记，温眷血、向昔仙、严延生、吴九思、王子平均为特支委员。

当北伐军攻打南昌时，九江驻有军阀孙传芳部的三个师（周凤岐、方本仁、李宝璋）布置了防线，准备负隅顽抗。

当北伐军攻南昌之前，李宗仁部胡宗铎师已夺取了德安，切断了九江军阀与南昌之间的联系。中共九江负责人曾将九江地形，以及军阀部队的布防情况，和九江工农群众组织的力量告诉胡宗铎，建议他绕道庐山，直取九江南门，出奇制胜。但胡宗铎骄矜自大，按兵不动，遂致坐失良机，胡部并且受到损兵折将的损失。

嗣后，北伐军第十军王天培部杨胜治师接防，接受了中共九江特支的建议，调拨炮兵一连，配合战斗力很强的骑兵排，由连长黄宇宙率领。在农民响导之下，从庐山绕道直取九江以南。由骑兵排从石门口经十里铺搜索前进。炮兵则向九江南门外桑川岭开炮。第一炮命中周凤岐部阵地，该师毫无办法，纷纷向彭泽逃跑。第二炮命中九江大校场，该地军阀部队慌忙向城内龟缩。第三炮命中城内能仁寺附近方本仁的师部，顿时惊恐万状，方本仁带着妻妾仓皇向塔岭北路的长江边逃跑。搭上英帝的“怡和”、“太古”商轮逃往小池口。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午后四时左右，黄宇宙连长将炮兵阵地从十里铺进驻龙开河桥头，并将骑兵排部署到二马路、三马路、火车站一带搜索前进。那些抱头鼠窜的军阀散兵，被北伐军追得走投无路。我工人纠察队手执梭标、高喊“缴枪不杀”，那些军阀残兵乖乖地举手投降。此刻，全城人民欣喜若狂。严延生同志率领九江各界代表，深入前沿阵地，向北伐军官兵赠送慰劳品。

到十一月六日清晨，战斗全部结束。把方本仁、李宝璋残部全部歼灭。十一月八日，炮兵连渡江追击敌人。严延生同志率领九江市工、农、商、学、妇各团体的负责人前往欢送。沿途中全市人民涌向街头，燃放爆竹，情景动人。

四、光复后的九江新形势

九江光复之后，中共南昌地方支部派曾延生、蒋竞英二同志来九江工作。改组了中共九江特支。以曾延生为书记，陈斌、温眷血、彭江、吴九思、向昔仙、蒋竞英等为委员。九江共青团的领导力量也加强了。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六日，九江特支改组，成立中国工农党九江市党部，该部设在九江市六角市塔公祠。改组后，严延生为主任委员，王子平为组织部长，张如龙为宣传部长，严延生为青年部长，彭江为工人部长，吴九思为农民部长，周逸樵为商民部长，卞启明为妇女部长。

随即指派王子平筹建教职员工联合会，曾炳生筹建书店，推派帅古农为县长。我那时是县政府的教育科长。

十一月八日，举行了九江军民联合大会，到会群众约三万余人，鲍罗庭、邓演达都亲自参加，邓演达还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以军乐队为前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在九江特支的部署之下，各区、乡的党、团、工、农、妇组织逐渐建立。特支指派于灿烈、徐上连、黄泽琳等分别在黄老门、马迴岭建立党支部或小组；指派汪仲屏、张贤庆、张贤思等在港口成立党支部，各乡的农会也纷纷建立起来。

在此期内，革命势力蓬勃发展。九江总工会和南浔铁路工会九江分会相继成立。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各行业都纷纷成立行业工会。呈现一派喜气洋溢的景象。

到一九二七年一月份，在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之下，中共九江特支改为中共九江县委员会，负责领导九江、瑞昌、星子、湖口、彭泽六县的工作。

五、收回租界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二月七日，九江总工会举行“二七”大罢工四周年紀念大会。当夜，接到武汉全国总工会的电报，获悉武汉工人已于当天冲进租界，展开了收回租界的斗争。

九江总工会立即请示中共九江县委，准备以实际行动来响应。经县委紧急会议决定：动员一切力量，收回九江的英、日租界。这一任务交九江市党部负责。九江市党部旋即召集九江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开会讨论。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表示坚决照办，积极行动。中共九江县委书记曾延生，以中国工农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回日租界；打倒英帝国主义，收回英租界的战斗口号。曾延生在会上发言说：“这口号提得好。过去我们的口号是打倒列强除军阀，现在的口号就发展为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我建议大家立即行动起来，勇往直前。”

当即在会上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决定设立三个组，分头开展工作：

（一）组织组，成立三个队：（甲）宣传队：搞带标语口号，随同汽车、火车、轮船，沿公路、铁路、水路分赴各区乡，发动广大农民，要求各地农民携带梭标、大刀、旗帜，由农协负责人带队，于二月八日上午七时到达九江大校场集合，听候分配任务。（乙）设立陆上先遣队，以码头工人纠察队为骨干，集合日清、怡和、太古、招商、三北五个码头的工人，各带铁棍一根，棍头上贴三角形标语旗一面，于二月八日早上进入租界，由何瑞廷领队。同时发动理发工人挑着理发担，各种形形色色的肩挑小贩，以卖香烟、烧并为掩护，每个担子或篮子里密藏石灰包，专门对付守门守闸的敌人，听号令行事。（丙）设立水上先遣队，以沿江渔民为骨干，组织渔船百条，以捕鱼为名，游弋租界沿岸的长江水域。船上密藏大刀、炸药，并备好三角旗若干面，监视敌舰。必要时轰炸敌舰。于二月八日上午七时进入阵地。

(二) 宣传组，负责有关宣传的宣言、标语、横幅……及时张贴与散发。

(三) 后勤组，发动店员、妇女，沿着规定的路线，号召各店各户及时悬挂国旗，摆设茶水供应。

会议决定，由严延生为总指挥，曾延生为顾问，总指挥部设在九江西门外矾湾庐山中学内。总指挥部下设三个分指挥部。第一分部设在三北码头某茶馆，由陈冰、王子平指挥群众沿招商码头向租界闸子门前进。第二部分设在西门大街王德原蛋行对门的中洋街口，由温眷血和我负责，指挥群众从湓浦路进入租界。第三分部设在龙开河桥头某茶店，由彭江、吴九思负责，指挥群众从桥头向北进入日租界。

二月八日早上，各路人马浩浩荡荡集合于大校场。原计划每路约三万人，实际上每路都超过三万五千以上。总共达十一万人之多，这是九江历史空前的壮举。

帝国主义者闻讯、惊惶万状。他们强作镇静，在各自的兵舰上卸炮衣，擦炮膛，把炮口对准九江城，摆出一付纸老虎的架势。舰上的海军陆战队也纷纷登陆，似乎要同九江人民较量一番。陆战队乘汽艇出动，可是被我们密密麻麻的渔船挡住去路，汽艇简直被包围了。陆战队的汽艇只好在渔船的空隙中挤出去，好不容易窜上江岸，慌慌忙忙地拖着机枪架起来，从闸子门对准中国地界。

九江江岸边海关钟楼的钟声刚敲八下，总指挥部的三发信号弹升上云霄。各分部一声号令，万马奔腾。水陆两路的先遣队一马当先，江面上百舟竞发。地面上千军冲锋，三角标语旗迎风招展，大刀、梭标、铁棍飞舞，霎时间爆发出狂风暴雨般的冲杀声，怒吼般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像山崩地裂似的扩向四面八方。这一阵霹雳就把那些登陆架枪的洋鬼子吓得魂不附体，拖起洋枪向后撤。就在这些鬼子惊慌失措的时候，石灰包自天而降，白雾弥漫，灰末如云，随风袭击敌人，打得鬼子嘴肿鼻

青，方向莫辨，进退两难，狼狈不堪。顷刻之间，洪水般的人流冲进了租界。洋鬼子遍体皆白，连滚带爬地逃上汽艇，而我水上英雄的渔舟层层设障，迫使汽艇左弯右拐、晕头转向，歪歪斜斜地靠近敌舰，仓皇向舰上爬去。敌舰火速启锚，向彭泽方向逃命。

陈冰、王子平领着第一路群众，冲进了英国领事馆，遍搜各个房间，空无一人，但见桌椅家具东倒西歪，器皿狼籍。温眷血和我所率领的队伍冲进台湾银行，里面的鬼子也都逃跑一空。第三路的健儿冲进日本领事馆，也是一样的情况。其他地方的洋鬼子也都逃之夭夭。

在进入租界收回主权的斗争中，我们的部署是妥善的。按照总指挥部的布置，分别派出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队，在英、日租界内的领事馆、台湾银行以及其下属各分支机构一带，站岗放哨，因而秩序井井有条。

收回了租界，群众的心情是何等激动，何等兴奋。工人们把英国领事馆的招牌攀倒，挂上了红布白字的“中国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临时办事处”的标志。同时，在日本领事馆门前挂上了红布白字的“九江总工会临时办事处”的条幅。台湾银行的膏药旗倒地了，农民们把“九江农民协会临时办事处”的红幅挂上去了。其他如巡捕房，分支机构也分别由九江学生联合会，九江书店等单位进驻。工农群众看见租界上所有的房产都物归原主，真是喜泪盈眶，热情奔放。我们的工农战士腰挎大刀，手持梭标，雄纠纠气昂昂地警卫着收回的租界，捍卫着自己的主权。直至当天午夜，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久久不愿离去。后来，总指挥部派何廷瑞、吴九思调拨车船，护送农民回家，农民们在归途中高呼口号，激昂的声音在静静的夜间回荡在浔阳江上。

六、郭沫若同志在九江

一九二七年的三月上旬，郭沫若同志由汉口来到九江。他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负责人之一。

这年的三月十七日，发生了反动派杀害九江总工会副纠察长曹炳元的惨案。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更趋白热化。中共九江县委为曹炳元同志举行安葬仪式时，在送葬行列中呼出了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

当时，有人感到奇怪：蒋介石既然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为什么又变成了反革命呢？中共九江县委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宣传，揭露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

郭沫若三月二十九日刚刚从安庆回到九江，九江市党部为他举行便宴。郭沫若同志在席间揭露了蒋介石的卑鄙行径。他谈到自己在安庆亲眼看见蒋在安庆收买流氓屠杀革命人民的经过。他以铁的事实，历述了蒋介石如何策划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以及如何指使流氓对革命者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当他提到反革命流氓分子在安庆把青年部长和妇女部长脱光衣服，残酷毒打得血肉模糊之后，又叠起来放在一张竹床上抬去关押的惨状时，在座的九江市党部妇女部长卞启明不禁悲愤难忍，痛哭起来。激动得全场人员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郭沫若同志还叙述了他自己是如何利用一条由汉口经九江到安庆的船只，逃脱蒋介石的魔掌，轻装潜回九江的。在座人员无不为他从容脱险而庆贺。

中共九江县委为了郭沫若同志的安全，劝他还是回到武汉去，不要去南昌。因为当时在南昌的朱培德是个两面派，耽心他会遭到朱培德的迫害。郭毅然地表示：为了革命，还是要到南昌去走走，使南昌方面也能了解蒋介石反革命的险恶手段。于是，中共九江县委派了陈冰、熊好生和我三人，护送郭沫若同志去南昌。熊好生是南浔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凭他的关系调配了头等客车车厢，并派了工人纠察队随车担任警卫。

登上火车之后，彼此寒暄了几句。当列车奔驰在南浔道上的时刻，就在不寻常的车厢中，我国革命文豪郭沫若，聚精会神地以浩然正气写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请看今日的蒋介石》。

列车呼啸疾驶，郭沫若同志挥笔疾书。当火车快要到南昌之前，他把写好的文章给我们看，我们无不为之振奋。他的这篇讨蒋檄文，开宗明义地告诉全国人民：“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是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这篇斩钉截铁，发人深思的文章，使全国革命人民更加深刻地认清了蒋介石的狰狞面貌。

当我们告诉他关于九江人民在“三·一七”惨案发生后，工人们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的口号这一情景时，他说：“工人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喊得对，喊得好，喊得及时，喊得正确。”

我们又请他把这篇文章交给我们去印发。他说：“这篇稿子还得让我到南昌去同朱德同志商量，还要经中共江西省委研究后再作处理”。

这篇文章，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经中共九江县委发交《民国日报》全文发表。并结合蒋介石在九江、赣州、南昌等地一系列的反革命行径，大张旗鼓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从而加深了九江人民和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痛恨。

七、九江的“七·三一”事变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策划了“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接着发生了广东的“四·一五”惨案，长沙的“马日事变”等等。不久，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臭味相投，沆瀣一气，因而在长江上下游出现了一股反动逆流。七月十五日，宁汉合流，反动气焰嚣张。江西AB团头目段锡朋、周利生之流，带着一伙爪牙窜到九江。卖国贼陈公博也从武汉经南昌来到九江，准备投奔南京。一时妖风阵阵，鬼影憧憧。

九江的戒严司令唐蟒，是一个画皮式的军阀余孽。这时他撕下了伪装，与段锡朋、周利生之流串通一气，施展其反革命阴谋诡计。

七月二十九日，这伙反革命份子、特务、叛徒，以整党清党的名义，在九江市党部召开有关团体联席会议时，突然袭击，包围会场上的革命分子达七十多人。当场逮捕了严延生、严运生、温眷血、彭江、张如龙、丁省三、吴九思、曾炳生、王子平、何瑞廷、熊好生等二十七位革命者。

万恶不赦的敌人，将这二十七人押进大校场的马棚里面，用一根铁丝穿透二十七人的锁骨，一个挨一个地连锁起来，穿成一串。不给饮食，断绝消息。

这二十七位同志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在狱中日夜不停地高呼“打倒新军阀蒋介石”，“打倒新军阀唐麟”，“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七月三十一日，浔阳江水悲壮呜咽，江州上空阴霾密布，反革命匪徒用机枪对准他们，而英勇的二十七位同志怒目戟指，痛斥匪徒，把那些刽子手吓得失魂丧胆，仓促下令用机枪扫射一阵，旋即扛起机枪匆匆跑走。

当天的夜晚，一些铁路工人，怀着悲愤的心情，悄悄地到了刑场，去查看烈士的遗体。工人们含着泪珠，逐个抚摸着烈士。突然发现最后一位烈士还在哼气。近前一看，原来是熊好生同志。工人们立即拉开铁丝，由一位体格强壮的工人背起就跑。一口气跑了五里多地，把熊好生同志藏在桑川岭以南女儿街的一位农民家中。经过喂水之后，慢慢地苏醒过来，以微弱的声音询问牺牲了多少同志。他虽然没有伤到要害，可是由于被捕后穿透锁骨，流血不少。加之关在马棚的两天之中滴水不进，呼喊口号，以致精疲力竭，身体已受到严重的损伤。况且现在藏在乡间，又处于白色恐怖之下，缺医乏药，无法抢救，终于三日后同九江人民永别了！

九江人民在反动派肆虐屠杀的时候，敢于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抢救遇难同志脱险，充分说明正义仍然蕴藏在人民的心中，因而能见义勇为。

还有的革命群众，不顾反动派的猖獗，在危难之时，刀丛剑树的敌人面前公开安慰遇难的亲人。例如七月二十九日，当严运生等同志被捕之时，从九江市党部押出来，途经六角市小学右侧一家商店门前，此刻，严运生同志昂首瞥见他的二婶在楼上窗口朝下张望。运生高声地说：“二婶，请你叫我妈到大校场收尸去！”他二婶回答说：“好孩子，不要惦记你妈，我们会照料她的。你的鲜血决不会白流的！”

何瑞廷烈士在被捕时，曾对着匪首唐蟒大骂：“你这个狗杂种，只怪我们当初认错了人。我们九江工人农民为了迎接北伐军，缴了北洋军阀的枪，可惜呀可恨，我们吃了机会主义者的亏，放弃了手中的枪。要不然，我们早就把你毙了！”烈士的慷慨激昂之言，使唐蟒面如土色。

八、关于岷山游击区的斗争

一九二七年，在汉口的“八·七”会议上，清算了陈独秀机会主义者的投降路线，提出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武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中共九江县委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积极恢复整顿各地党支部和各级工农组织。

为了出奇制胜，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了解到庐山垅，隘口以至星子县一带的敌情，计划在马回岭、沈家港一线集结力量，对星子县进行袭击。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四日，农民自卫队以分进合击的战术摸进县城，分别包围了星子县政府和警察局，从敌人的监狱中救出了工农革命群众一百余人。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盘踞在九江的新军阀唐蟒，惊惶万状。凑合了反动匪部，叫嚣进剿“共匪”。我农民自卫队为了避实就虚，返回楚城乡原驻地。然后绕道德安，折向西北，进驻岷山腹地，作为推进革命运动的中心。

岷山介于九江、德安、瑞昌三县之间。是湘、鄂、赣三省边

境地区的幕阜山脉蜿蜒起伏的余峰。地势险要。而当地群众极为贫苦，饱受压迫与剥削。中共九江县委抓住这一有利地区，建立起峨山游击根据地。先后建立了甘西、甘东、港口，和长江以北的封阁、桑洛五个区的党委会。而以港口区为重点。

港口位于赤松上乡，西有赤湖，跨九江瑞昌两县之间。赤湖港汊很多。在赤松上乡一带，还有反动家伙简相柏、谢松延等蠢蠢欲动。简相柏同反动头子高伯韩是亲戚。因而有恃无恐。

一九二九年九月，中央港口区委会决定首先在简相柏身上开刀，借以给高伯韩迎头痛击。九月二十六日午夜，集合农民自卫队二百余人，举行武装暴动，一路人马消灭了简相柏，一路人马围歼了劣绅何少西和徐老九。迫使反动头子高伯韩不敢抬头。

港口区委书记汪仲屏，率领游击队员进驻赤湖，作为保卫峨山，威胁九江的游击根据地。游击队的同志机智勇敢、不怕牺牲，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赤湖游击队情报队队长张荣香，以及队员桂家模、王以秀、张求英四同志，经常前往港口等地侦察敌情，伺机打击敌人。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张荣香等四同志来到港口收集情报，以及分发秘密文件。暂时寄宿在王以秀的家中。不料事为简桂柏的女婿高泽所知，高通风报信，约集反动头子高伯韩，判徒简光楚，以及匪连长刘殿奎，率领一群匪兵，包围了王以秀的房屋。

四位同志迅即烧毁密件，展开搏斗。以敏捷的行动从甲窗口跳到乙窗口，凭着各个窗口的砖墙为掩护，瞄准点射。然而四位同志仅凭四支驳壳枪，而子弹用尽，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捕。反动匪徒使尽了威胁、利诱、毒打等伎俩，妄想取得当地共产党员的名单和根据地的情况。而四烈士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港口区委书记汪仲屏，为了痛歼敌人，于十月三十日，带领游击队攻打瑞昌县城。其部署是：伪装殴斗受伤者将竹床抬进县衙门去告状。同时将游击队员分成四路，携带长短枪一百三十余支。配合梭标大刀，分别埋伏在城外。另一部分化装卖柴的从南

门进城，还有一部分化装菜农，挑菜进城，主要是监视当时在高信大商店赴宴的“贵客”。

上午，汪仲屏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手执文明棍。身藏短枪，俨然为一大绅，携带“随从”二名，领着抬竹床和扶竹床的十余人，一路吆喝着进了西门，叫嚷着要打人命官司。当这些人走到县政府门口，守卫的哨兵上前查问，刚一开口，就被两位“随从”的匕首所解决，汪仲屏把长衫一甩，掏出手枪，对空连发三声信号，城外各路埋伏立即冲进县城。竹床上的“伤员”一跃而起，把被子里的枪枝子弹，分发给其他人，飞步闯进县府，伪县长涂光林以及一伙官吏吓得东躲西逃。勇士们打开监狱，放出了被捕的革命群众，并收缴了伪保安队的枪支数十支以及其他物资。

与此同时，相继占领了“缉私营”、“商会”等机构，那些化装为卖柴、卖菜的游击队员，包围了高信大商店。这时这家商店楼上正在大摆酒宴，二十多名反动军官惊惶万状，企图逃跑。可是被我游击队旺盛的火力所逼住，楼下放起一把火，把楼上的反动军官化为灰烬。

游击队员们没收了好商的布匹、杂货、油盐等，随即分配给附近的贫苦市民。游击队满载战胜利品，凯旋而归。

但，不幸的是出了可耻的叛徒。同时，由于实力不足、根据地空虚，导致屡次失利，处于被动状态。

一次，汪仲屏同志正潜入港口附近进行秘密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以致反革命分子高泽、高伯韩等张牙舞爪，逮捕了仲屏同志。

汪仲屏落入魔掌后，敌人使尽了软硬兼施的花招，忘图达到其卑鄙的目的。但，仲屏同志泰然自若，以坚定的革命斗志，回击了敌人的威胁。气急败坏的高伯韩凶相毕露，指使刽子手高泽行凶。当高贼举刀动手之时，仲屏同志面不改色地说：“慢点！有话谈。”站在一旁的高伯韩还以为有可乘之机，马上喝住刽子

手：“不许伤害汪先生！”又必恭必敬地说：“汪先生有什么话，只管说吧！”仲屏同志以仇恨的眼光对着高伯韩，冷笑地说：“自古以来，犯人上断头台之前，必须喝酒吃饭。我还要换换衣服，理理发，再去死！”高伯韩认为有了“门儿”，满口应允。于是，仲屏同志从容不迫地理发，换衣。然后举起酒杯，对着围聚在前前后后的人群说：“乡亲们！我汪仲屏不幸，身陷魔掌，再也不能同大家共斩妖魔，有负众望。在此生离死别的时刻，我要在父老兄弟姊妹面前痛饮三杯，以表示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胸怀。”这时，刽子手惊恐地动手想打仲屏同志，可是周围的一些人群怒视高贼。高伯韩阴阳怪气地说：“让他讲下去，看看是他的嘴硬，还是我的刀硬。”仲屏同志接着说：“第一杯酒是为争自由，求解放而干杯！第二杯酒是祝愿苦难深重的同胞，为齐心协力完成革命事业而干杯！第三杯酒是为人民革命的胜利，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干杯！”这时，高伯韩象一个输光了的赌棍，疯狂地喊：“杀！杀！杀！”仲屏同志甩掉酒杯，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汪仲屏同志就这样从容就义，以他的鲜血为人民革命事业写下了壮丽的史诗！

江西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赵醒侬烈士

刘其农

赵醒侬同志（原名性和，乳名细禾，先后并用过赵干、心农、兴隆等名字），江西南丰县人。1899年诞生于一个贫寒的手工业者的家庭里——他父亲以缝纫为生，终岁勤劬，仍难以维持妻、儿的温饱！所以赵醒侬同志从幼年时期起便尝够了劳动人民的艰辛苦难，为尔后矢志革命，改造社会，培植了深邃厚实的根基。

由于家贫，赵醒侬同志在塾学里断断续续地读了不到两年书，因辛亥革命的胜利，南丰县城办起了高等小学堂，他便剪掉拖在脑背的发辫，于1912年春被录取到该校读书。

在学校里，他刻苦学习，勤奋向上，对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十分关心，经常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救国救民”自励并勉励同学和友人。每遇纨绔子弟仗势欺凌弱小，他往往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为校内外师生朋友所称许。

由于父亲的衰病，家境的贫寒，在南丰高小读书不到两年，又被迫失学而随着戚友离乡背井，远走长沙、常德、汉口等地，做临时性帮伙及布业学徒糊口。

“徒弟徒弟、三年奴隶”！个人生活虽得以勉强维持，而仰事俯蓄则心余力绌，救国救民的素愿，更是耿耿于怀！从而颠沛流离，又转徙到了上海。在那个闻名的“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里，一贫如洗的赵醒侬同志插足其间的遭遇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他继续升学的美梦既已破灭，就业的幻想又接着落空，只得以贩卖报纸来解决一日三餐的现实问题。加之人地生疏，无力租

赁住房，往往寄身屋檐下、菜市场、摊贩隙地、贫民窑里，勉强渡过如年的长夜；有时并遭受到殖民主义者的鹰犬——租界上的巡捕的无理干涉而踟蹰徘徊在大马路上、黄浦江边直到天亮！

“五四”运动的号角震撼着全国各地人民的心弦，更唤起了青年学生的觉醒，随着上海工人、学生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赵醒侗同志看到了国家民族前途的曙光，出现了振衰起敝的希望，因而继续努力朝着光明大道奋勇向前的意志也大为增强，并开始用“醒侗”为名、来标志自己平素救国救民的抱负与决心。

在“五四”高潮的激荡中，全国各地工、商学运蓬勃兴起。赵醒侗同志和新结交的店员沈资田（注）一同加入了宣称“为工商伙友谋幸福、谋团结”的“上海工商友谊会。”他不仅主动担当该会日常工作，并经常为该会创办的《上海伙友》写稿，1920年10月10日，他在该刊创刊号发表的《为今日问伙友们》一文中大声疾呼地写道：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我们先烈赴汤蹈火、骨肉横飞、拼头颅、洒热血换得来的！我们年年庆祝这个可悲可泣、可歌可舞的胜会，也曾问过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创造民国的先烈吗？”并着重指出：“我们伙友还在千钧压力底下，想动也动不起来，一盘散沙，没有团结。”“难道我们伙友不是中华的国民、不是黄帝的子孙，难道我们甘心做凉血动物、雌伏而不动？！”次年五月一日。赵醒侗同志又在该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会上语重心长地高呼：“伙友们团结起来，改造社会！振聋启聩，不遗余力！”

但是由于该会具有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多数发起人，主张“一点一滴改造社会”以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互助”之类的

注：沈资田，上海人，1892年出生。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上海南京部委书记、浙江江干区委书记……等职，1927年11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次年2月9日被杀害。

“改良主义”，使赵醒侗同志大失所望，徬徨苦闷，坐卧不宁。

19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了！赵醒侗同志在其素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下，贪婪地阅读了不少关于社会科学的读物，进步书刊，从而对自己平素穷思苦索的社会问题和切身遭遇的人情世态，逐渐找到了满意的解答。阶级觉悟大为提高——识破了《工商友谊会》宣扬的劳资调和的本来面目，及其“改良主义”的反动实质；确认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国救民，只有走苏俄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陷于火热水深中的劳苦大众获得真正的解放！于是毅然决然与《上海工商友谊会》断绝了关系，偕同沈资田在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设职业补习学校学习；并于1922年一同取得中共友人之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入党的这年冬天，赵醒侗同志接受了党的派遣，回到江西，会同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方志敏等七人，于1923年1月20日在南昌《大江报社》召开的首次会议上组建了党在江西的第一个革命堡垒“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分团”（注）揭开了江西革命运动崭新的一页。

在赵醒侗同志等苦心经营、极积筹划下，江西地方青年团组织在1923年1月首次会议上就决定“依据团章规定：①发展组织……②扩大宣传、推销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先驱报》③尽力援助工会之组织；发动团员加入学生联合会，谋使此会成为我们的同志所掌握”等等，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团地委有组织有计划宣传策进之下，全省学生、工人、劳动群众的革命觉悟、进步活动，得以逐渐深入发展。

注：1923年1月22日《临时书记刘拜农关于江西地方青年团的发起人组织和成立等问题向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现在邀集在南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侗、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刘拜侗、赵和，于1月20日开第一次会议，推定刘拜侗为临时书记。”

特别是由于赵醒侗、袁玉冰诸同志这时发起组织了对普通工人宣传的《民权运动大同盟》、和为“培养、吸收新分子、发展组织创造条件”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更使反动军阀深为震恐。这年初夏，《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南昌心远大学成立不到几天，即被反动军阀蔡成勋派探侦知；袁玉冰同志在得到情报，获悉当天晚上已有同志被捕的情况下，决定提前离省，把《民权运动大同盟》、《团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报告中央的一切重要文件带在身边，亲自向党中央汇报、请示，不料他在刚刚渡过赣江，到达牛行车站上火车时，即被先期埋伏的反动武装逮捕，并抄去一切重要信件。

但是，尽管反动军阀防制、镇压无所不用其极，尽管其所豢养的江西教育厅长朱念祖及其大小爪牙“一师”校长黄光斗、“二中”校长车驹之流阴险毒辣，为虎作伥，千方百计打击各校青年学生的革命活动，而在赵醒侗同志等所领导、组织的“南昌地方团”的思想影响，深入策动之下，不少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团体、进步刊物——例如由甲种工业学校“觉社”学生孙师毅、“心远”学生蔡方信等所编行的鼓吹自由解放的《时代之花》，由江西省立第一师范“乾乾社”学生陈之琦、刘其农、傅抱石等所编行的革命文艺《湖光》……等等，都一纸邮行，备受各校师生的重视，更使反动教育厅长朱念祖及其大小党羽惶惶不安！

特别是由方志敏同志亲自担任经理的“文化书社”被反动军阀于1923年春初查走后，赵醒侗同志等“为公开宣传起见，除‘马氏’学说研究会及‘民权运动大同盟’之组织外，对文字宣传，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刊作为宣传我们的主义的刊物”（引自1923年7月《南昌地方团》报告中原文）。还决定“由地方团委会”发行一种刊物，定名《红灯》，专鼓吹反对英、美帝国主义，批评本省谬误学说……推崔豪编辑。

凡此种中共江西团组织1923年夏的组织决定，具体措施，无不一一先后按照预定计划逐步付诸实施，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

的火种，从此得以普遍点燃到江西的城乡大地！

由于赵醒侗同志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忱，言教身传，深入人心，在“南昌团组织”方面，这时（1923年7月）已发展学生12人：王立生、冰冰、丁潜、刘再郎、汪群、陈之琦、王之瑾、汪伟、曾弘毅、何桢、方志敏、崔豪；小学教员二人：刘修竹、刘拜农；商伙五人：陈日光、周一尘、易虚、赵醒侗、郭炳生；女子一人：陈若菊。

同时，在“各校组织新文化团体、发行进步刊物、改进各地图书馆”，以及手工业工会，青年学生会等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般地产生，并且声势日益浩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呼声，彼伏此起；《向导》、《先驱》《共产主义ABC》……等等理论、宣传报刊，以及其它社会科学书籍、便风声所被、越来越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人、学生、劳动群众所衷心向往，同京沪等地一样，星星之火，已在江西有逐渐燎原之势，为尔后国民军进军北伐，准备了先声夺人、不可抗拒的有利条件——正如赵醒侗同志在1923年6月给“光亮”的综合报告中所指出的：“……反动军阀的查抄、逮捕，虽然使我和拜农、志敏先后出省，但可告慰的就是这件事唤醒了好多青年……介绍了千万人们连做梦也料不到的‘赤化’名辞，‘过激党’等等，激得李廷玉（当时反动政府的护理省长）、拍桌子大骂校长团，值得什么戒严部通街出布告，用公文通知各县防止名单上的人在该县校活动，我们千百万的传单还没有这样大的效果哩！”

1924年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共的直接帮助下，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中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的政治纲领。赵醒侗同志被推前往广州参加会议。不料在出发赴粤时，就在牛行车站被军阀方本仁的密探侦知，逮捕入狱。因方本仁内部矛盾重重，妄图与广东的国民政府通气，赵醒侗同志得以被释出狱，他便以“赵干”的名字代表江西各界赶赴广州，出席了这次大会，亲聆了李大钊、林伯渠、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国际、国内形势的阐述、分

析，中共与国民党从事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也使他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启发。为了开展工作的实际需要，并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大会的决议，赵醒侗同志交叉加入了国民党，立即返回江西，开展工作。这年二月间，《中共中央直属江西支部》在南昌成立，赵醒侗同志任支部干事会书记，曾天宇等六同志为支部委员。接着，就在三月间改组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赵醒侗同志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七个筹备委员中就有邹努等五个中共党员。并派遣得力干部分赴全省各地把愿意革命的国民党员团结起来，组成了以中共的党团员为骨干的二个市党部和四个临时县党部。这样，以国共两党合作共事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在江西正式展开。

在从事革命活动中，赵醒侗同志不但努力工作、踏实，而且生活上刻苦自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布尔什维克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素为广大群众所称颂。中共党早期在江西开展组织活动的经费是不宽裕的。赵醒侗同志有时仅仅支取伙食费四元半。

（后来有时支六元，有时支十二元），长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甘之如饴。他在黎明中学工作时，听说老婆找他拿钱买米，他一摸口袋只剩几个铜板，便托在校的同事转告他老婆，佯称不在校中，并立即从侧门走出，买了几个烧饼带回家中。他原已不很健康的身体，有时并须同另一恶魔——疾病作斗争，他的近视程度也日渐加深，他那付黑玳瑁边的近视眼镜一刻也离它不开了！

尽管他的身体不好，但其严以律己，艰苦卓绝，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却在一般革命学生、青年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在他执行组织任务、动员群众的活动中，无不言听计从，事半功倍。1924年4月，他在短短几天之间就亲自领导组成了“南昌一平印刷所”和“官纸印刷所”的“铅印工会”，发展了会员四十多人，接着又组成了“海员工会”、“捡茶工会”和“店员工会”以及南浔铁路工人、九江码头工人、吉安染布工人等工会。“扬子州农民协会”等组织也逐一相继组成。

由于赵醒侗同志的努力，九月间，又改组了省、市学生联合

会，指派共青团员邹努担任学联主席。十二月，江西青年学生会组成后，南昌女青年社、青年互助等团体接着也宣告组成。《中共地方团》在江西的基础日益壮大发展，深得各方群众的赞扬，并为反动军阀所嫉视，决非偶然。

这年十一月间赵醒依同志又被逮捕入狱，由于他的革命行动深受广大群众的愛戴、拥护，群众奔走营救，反动派又无法得到他的口供据以判刑，因此，在拘押了他数十天之后，不得不把他释放出狱。

鉴于前此“南昌文化书社”的横遭反动军阀查禁，有另筹对策之必要，赵醒依同志乃指派陈之琦到第一师范动员刘其农以“专责店员”名义，帮忙筹设“南昌明星书社”，作为党在南昌开展组织、宣传活动的另一重要据点。但由于开办需费，社址问题也几经周折，直到这年（1924年）秋才租定百花洲横街（原名锡厂街）一所坐东朝西的破旧茶楼，稍加修葺作为“书社”社址。为了扩大影响，更为了掩护安全的需要，特函请中央同志在沪商请当时的所谓“党国要人、书法名家”于右任署名代写了“南昌明星书社”六个斗方大字，制成木质横匾，悬挂书社门上，开张营业。书社房屋计上下两层，楼上是“店员”宿舍，楼下是陈列书刊的门市部，后进为厨房。出售的书刊主要是《响导》、《新青年》、《少年先锋》、《三民主义》、《共产主义ABC》以及南昌进步组织所发行的刊物等等，应付门市者除专责店员刘其农之外，曾弘毅、王立生、罗其南、冯任……等则分批到书社轮流值班。

“书社”的房屋虽很简陋，但由于上楼时，必须扒着旧式扶梯、一步一步地攀登，这对处在秘密阶段进行“赤化”活动来说，却是颇合要求的。

有关党组织的某些会议、决策……往往是夜间在该社楼上筹划进行。聚会时间，偶尔也有白昼或深夜临时召集的。遇有敌探等可疑迹象时，即由楼下值班者用先期约定的暗号发出警报，例如一般的用“水开了！泡茶不？”认为较紧急则以“炉子里的火

快熄灭了！煮面么？”……之类暗号，发出警报。在楼上与会者接到警报，立即佯装访友、学唱京戏、打麻将、排练文明戏，或乘间从楼下左侧破竹篱空隙疏散隐蔽。由于曾天宇对拉二胡、黄作楫对唱花脸有相当高的水平，从而用独唱、或指定在场的某人“学唱”等等方式，顿时热闹喧呼起来，使敌探人员莫明究竟，毫无所获而去。

会议多由曾天宇召集，赵醒侗同志间或也前往主持。参加者多是一师、二中、黎明中学……学运积极分子；议题多是布置学联工作和发展组织工作。

后来在北伐大军攻克南昌前夕，军阀邓如琢作垂死挣扎杀害、逮捕“赤化”分子、进步青年，兽犬性大发，为所欲为，这个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南昌明星书社”也被查禁了！

当时反动教育厅长企图用金钱奖状为诱饵，举行所谓“国文课考”，以腐蚀各校青年读死书、不问政治的阴谋，遭到多数进步学生所坚决反对；但赵醒侗同志却认为应将计就计而动员陈之琦等同志报名参加，为发展组织和宣传、联络工作创造条件。旋陈之琦在题为“游东湖记”的考卷上，以短短五十几分钟的时间，笔不停挥，交了头卷，被评为全省第一名，发给奖金四十元。从而使党在校内外组织活动中的声誉，大为提高。

为了开展工作，赵醒侗同志又与曾天宇等同志在南昌解家厂创办了一所“黎明中学”，聘请原江西省议会议长龙钦海为名誉校长，以资掩护。赵醒侗同志尽管工作很忙，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到校讲述“三大政策”……等时事问题，方志敏、曾天宇、黄作楫、舒味三……等同志则兼任教职。

实际上，“黎中”的创办，除以培育革命青年为要求之外，更重要的任务，则在于加强党的组织活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方针政策，以适应形势的需要，与“文化书社”、“明星书社”一样，都是党在南昌展开工作的重要基地。

1925年，江西全省革命形势更加蓬勃发展。一月间，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着重讨论了组织、宣传的战略方

针以迎接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为了贯彻党的号召，赵醒侗同志夜以继日，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工作。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噩耗传来，全国哀悼！当时全国军阀的内部矛盾重重，邓如琢窃据赣北，念念不忘驱逐方本仁，攫取全省地盘，暗中与吴佩孚勾结，求取援助，吴在无力阻止方本仁攻鄂之时，乐得乘机联络孙传芳会衔委任邓如琢督赣，并派遣部队进攻武穴、九江一带，窥伺赣中。方本仁处此势孤力单之时，妄想联络广东国民政府，又苦无适当关系。赵醒侗同志利用这一情况，得到江西省议会议长——黎明中学名誉校长龙钦海及文绍云等头面人物的帮助，获得反动统治同意，拨发追悼孙中山先生的经费五千元，即以三千元汇寄党中央，并在上海印制了有关纪念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宣传品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大量书刊、传单，回到南昌，会同国民党左派党员，进行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旋在百花洲席公祠连续举行了三天追悼活动，向先后到会的成千上万广大人民群众散发了大量宣传品和有关进行“反帝反封”、“三大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等宣传。这样，围绕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形成了全省性的、空前广泛的政治运动高潮，使党在全省的政治影响，更加深入发展。

不久，“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六月初，恽代英同志专程来赣，在江西第一师范等校，从事公开讲演宣传，号召各界人民、团结一致，反帝反封。他振臂直呼，声泪俱下，在工人学生中，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在党和赵醒侗同志的直接领导、策划下，以声援“五卅”惨案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展开，六月三日，在省教育会召开了南昌市各界代表紧急会议，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惨杀上海同胞江西后援会”。

（后改为“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六月五日，赵醒侗同志在南昌各界群众大会上激昂慷慨强烈谴责帝国主义者屠杀我国同胞的血腥罪行，号召各界人民团结起来，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收

回英租界”而斗争！大会通电上海各团体，表示江西人民誓作他们的后盾！同时通电全省各县市积极组织大规模的反帝群众运动，声援上海工人、学生、市民的反帝斗争。

六月十四日，上海工、商、学界代表三人来到南昌，向各界人民陈述帝国主义制造“五卅”的真象和继续在上海、汉口、青岛等地枪杀中国工人的滔天罪行，更加激起了南昌人民的愤怒。赵醒侗同志等根据这一形势，又组织了第二次群众游行示威，并举行了群众公祭惨案中遇难烈士大会，开展了抵制仇货和捐助活动。江西后援会仅在六月二十九日一天，即给上海罢工工人汇去了捐款四千元。一个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在全省如火如荼地迅速开展起来，许多群众团体的组织活动，更加主动积极了，大批优秀工人农民，纷纷争取参加到cy、cp的革命行列了！

七月间，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选出了赵醒侗、方志敏等七人为委员，赵醒侗为常务委员。革命形势的发展，震撼着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反动透顶的江西督办方本仁认贼作父，丧心病狂，被英帝国主义者所收买，向江西人民实行血腥镇压。九月三日，逮捕了江西学联主席邹努等人，对方志敏等三四十人发出了通缉令，接着又查封了沪案交涉后援会和江西学生联合会，出动大批军警，阻止群众集会游行。

为了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在党组的决定和赵醒侗同志等的具体领导下，全省人民向帝国主义走狗封建军阀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南昌，领导工人群众，各界人民组成了援助被捕学生委员会，发表了宣言，彻底揭露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和北洋军阀方本仁为虎作伥的可耻阴谋，迫使他释放了邹努等同志出狱。

但是，出于反动军阀的反革命本性，方本仁并没有放松他对革命人民的迫害。十月二十七日，赵醒侗同志等一行三人，被推作为江西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行至牛行车站时又被逮捕。接着封闭了“一平印刷所”，搜查了“明星书

社”那里的宣传刊物、进步书报，一概被没收了！

赵醒侗同志被捕后，被押赴都司前军法处，在多次反复审讯中，他始终没有吐出半点有关党的机密。方本仁无法判处赵醒侗同志的“罪”，关了他一个多月，在党组织的设法营救和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下，得被释放。他出狱后，又再接再厉，投入了紧张的斗争。筹备、主持召开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传达了“二次全代”的精神，通过了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宣言。

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共的有力支援下，发布了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这时，军阀邓如琢已用武力把他的上司方本仁赶出了江西，当上了赣军总司令，自称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一面把二十五万主力部队集结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一面命令他的爪牙邓如琢，加紧摧残革命力量。南昌城厢内外，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军警密探，四出活动，邮电、行人，均遭检查，集会结社，悉被禁止，有个同志关心地对赵醒侗同志说：“通缉令已发出了，你是否暂时离开一下？”赵醒侗同志冷静而沉着地回答说：“我肩负重担，不能离开南昌！”

七月十一日，北伐军攻占了长沙，逼近了南昌。邓如琢狗急跳墙，悍然把国民党省党部抄封，逮捕了办事员四人，并将重要文件抄走。邓如琢的这种疯狂行为，激起了全省各界人民群众的愤慨，纷纷函电谴责，并迭次推派代表奔走声援。邓如琢迫于众怒难犯，勉强答应启封和释放被捕人员。但是，敌人是不会自动放下屠刀的！在民族败类，国民党右派周利生的告密下，八月七日，赵醒侗同志又被军阀武装捕去！那天下午，身染痢疾的赵醒侗同志，尽管全身无力，但当他想到还有许多工作亟待自己前往处理，便不顾病体疲乏，毅然决然朝“明星书社”走去，刚刚走到百花洲，就被几个彪形大汉——便衣密探，拦住去路，不由分说地将他架到军法处。接着又搜查了“明星书社”、“黎明中

学”捕去了四名进步教员，封闭了这两个中共党在江西活动的重要据点和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赵醒依同志被逮捕后，军阀走狗——江西警备司令刘焕臣亲自进行审讯，企图从他口里获得党在江西地下组织活动的有关线索、材料，但是敌人尽管用尽各种狡诈手段、惨酷毒刑，而深信阴霾既久、必有朗日，革命胜利，转眼就会到来的赵醒依同志，始终临危不惧，坚贞不屈！

大革命的浪涛，汹涌澎湃，北伐军挥戈所向，势如破竹。九月初，湘鄂战局，胜利在望，北伐军开始向江西挺进，逐步逼近南昌。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南昌各界人民，纷纷组成侦宣队、运输队、慰劳队……迎接北伐大军，并多方设法营救赵醒依同志。

但是邓如琢眼看自己的末日已在旦夕，仍作垂死挣扎，竟以“宣传赤化、图谋不轨”的所谓“罪状”，在九月十六日把赵醒依同志枪杀了！

这天凌晨，南昌城厢内外，更显得乌黑阴霾，一片愁惨。监囚在军法处的赵醒依同志突被武装军警押送到德胜门外芝麻田，他知道敌人要下毒手，要求写个遗嘱，亦遭横蛮拒绝！赵醒依同志昂首挺立，凝视着黎明的曙色，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从容就义！

赵醒依同志惨遭杀害了！江西人民悲痛万分！省内外舆论，一致抨击北洋军阀灭绝人性的豺狼暴行！党中央的《响导》周报（172期）发表专题悼念的文章，誉赵醒依同志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大革命以来在江西为人民牺牲的第一人！”《红灯》周刊（第6期）称“赵醒依同志是江西党的创造者！”

赵醒依同志壮烈牺牲后的第三天，北伐军攻进了南昌，不久退出。十一月八日，北伐军再度攻克南昌，摧毁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在江西的统治，赵醒依同志的遗愿初步实现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南昌各界人民在体育场集会沉痛悼念赵醒

依同志。匡山凄黯，赣水怒号！赵醒依同志牺牲了！千万个英雄站起来！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解放继续努力，奋勇前进！

（1955年冬初稿于南昌《革命烈士纪念堂》1980年秋改写）

革命先烈袁孟冰同志

（编者按）本文是根据徐先兆同志的回忆整理而成的。徐先兆同志是袁孟冰烈士的生前好友，也是当年改造社的创办人之一。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南昌城内阴风惨惨，一颗自“五四”运动以来闪耀在章、贡、庐、庾上空的巨星陨落了。江西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袁孟冰同志，用自己鲜洁的热血，为英雄城谱写了壮烈的史诗。

二十世纪初期，当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号角，响遍了神州大地。在这历史时期，正当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面临崩溃的前夜，地主、买办、军阀、官僚处于摇摇欲坠、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他们为了垂死挣扎，妄图扑灭人民革命的火焰。然而，在马列主义的真理光芒照耀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以磅礴的浩气，坚定的信仰，豪迈的步伐，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

人杰地灵的江西，英雄辈出。在本世纪二十年代誉满全国的江西无产阶级三杰——方志敏、赵醒侬、袁孟冰，便是叱咤风云、披荆斩棘、震天动地的无产阶级革命旗手。

际此建党六十周年的时候，缅怀革命先烈，特将孟冰同志的部份事迹，作简略的介绍。

袁孟冰同志，原名玉冰，又名冰冰。出生于1899年（光绪己亥）农历正月十八日。这正值中国历史大转折的年代。他出生的头一年是“戊戌变法”，他出生的第二年便是“义和团运动”的开始。当他十一岁时，我国爆发了辛亥革命。到他二十岁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就光荣地诞生在亚洲的东方。

孟冰同志的故乡是江西省泰和、兴国两县交界的岚峰村（现

属泰和县老营盘公社)他家境贫寒,小时曾替人放牛,十一岁才进小学,十五岁到离家五十里的高米圩高等小学读书。

童年时代的孟冰,深受其祖母的喜爱和教育,他的祖母是一位勤劳朴素的农村妇女,她正直善良,颇有见识。宁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让孙儿上学读书。孟冰常常会提到祖母所说的一句民谚:“好人不做钟,歪人世上闲”。由于祖母具有劳动人民的正义感,因而对孟冰有一定的影响。

小学时代,袁孟冰就勤奋地学习,成绩优良。他从来不浪费一个铜钱。他把一点点积存的钱订阅杂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这是杨贤江(烈士)主编的一份启蒙性刊物,对孟冰同志的影响不小。孟冰在南昌二中读书时,有一件有趣的小事:学校每天早晨都要组织跑步。有一次孟冰因体力不支而摔了一跤,引起同学们的笑声。孟冰深深察觉到自己体质不强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他便参照《学生》杂志上介绍的健身法去加强身体锻炼。其中有一项“静坐法”,他就坚持每晚临睡前静坐,从不间断。从这件生活小事,可以看出他的意志多么坚强。

孟冰同志高小毕业以后,没有立即升学,曾在故乡自学。他读书的地方就在离他家约三里地的中厓山附近,这里有一间茅屋。据他自己所写的《自治园记》一文中所说,那间茅屋“高可二寻,广袤半之”。屋前有一小园,“植花卉数种,鲜艳悦目”。他便命名为“自治园”。他并在园门书写了十三个大字:“入我园而能告我过者,我甚欢迎。”他在园中一面读书,一面劳动,自己弄饭吃,他写道:“读书也,休息也,饮食也,游散也,眠起也,皆有定时”。

他在二十岁时写过一首“二十初度感怀七绝”,其中有云:“原来我亦是贫家,那得金钱用似沙,游学多年消巨费,从今敢不力惩奢。”他为人是十分俭朴的,一贯都是布衣蔬食,勤劳节约。同时,他在求学过程中,曾对同学们说要一面学习,一面工作。他看到当时的情况,有些人只埋头读书,不问国事,他愤然说:“欲至学成救国,吾恐已无国可言”。凡此种种,都可以

说明他在少年时代的先进思想。

孟冰同志在中学时代，就受到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他还是中学一年级学生，学的都是文言文。他写文言文在同班中是出类拔萃的，旧诗也写得很好。在“五四”运动的伟大号召下，他迅速地接受了《新青年》杂志所提出的“文学革命”的口号，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时代洪流，宣布与文言文决裂。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果敢的行动。这时，也有些“好心”的同学认为他放弃自己文言文的优越条件是一种不明智的蠢事。可是他意志坚决，力排众议。他说：“满纸之乎也者，广大的百姓怎么看得懂呢？救国的道理是要人人都看得懂，就必须提倡白话文啊！”当他在第二中学编写校刊时，他负责主编，全部采用白话文，使全校师生为之震动。

在同班的同学中，有七个同学和他很接近，彼此之间互相砥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以孟冰为核心的小集团。他们常常在课余之暇，漫步于城墙之上，讨论新文化运动。当时二中在系马桩（即今南昌市于都街），附近还有城墙，每当夕阳西下，他们八个人便登上城头，谈笑风生。其他同学看见这八人老是走在一起，便戏称他们为“八大家”。这八个同学就是袁孟冰、黄道、黄家煌、石廷瑜、支宏江、黄野梦和徐先兆，还有刘軼。（注一）

孟冰在同学之中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当1920年的夏天，学校快放暑假，忽然发生了学潮。由于学生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之下，抗议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因而筹划罢课游行。军阀政府闻讯指令学校当局压制学生，学校当局则以维持校规为幌子，制止学生罢课。当时南昌的教育界有所谓熊派与宋派，熊派是以熊育锡为首，宋派是以宋育德为首，两派矛盾重重，但又都是利欲薰心的学阀。这两派都各怀鬼胎，争权夺利，企图利用学潮来推波助澜，进行派系之争，并乘机破坏学生的爱国运动。这时在二年级肄业的袁孟冰，在学校师生大会上，慷慨陈词，揭穿了两派利用学生进行派系斗争的阴谋，全校同学均为之动容。

经过这一次事件，孟冰深深感觉到，青年学生是纯洁的，需要把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于是，通过酝酿，决定成立一个“社团”。

“五四”运动一开始，各地都相继成立了学生联合会。而孟冰同志有其独特的见解，极力主张集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有志青年，结成一个宗旨一致的社会团体，并出版刊物，作为本社团的发言阵地。他提出这个设想之后，当时的“八大家”之中的某几个人有些犹豫，因为听见一些风言风语，甚至有人讥笑讽刺。孟冰为此把七位同学邀集进行商议，再三阐明组织起来的重大意义。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当众用小刀划破自己的手掌，鲜血直流。他说：“流血牺牲也无所畏惧。”到会者莫不为之感动，乃一致决定成立社团，筹备出版刊物。

原来这个社团是以地域而定名为“波阳湖社”。后来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便改称为“改造社”，把目的标明出来。

改造社是在1921年元旦正式成立的，当时到会的社员只有九人——袁孟冰、黄道、黄家煌、石廷瑜，黄野梦、徐先兆、刘轶、邹秀峰、熊国华。（注二）此后，入社的人渐渐增多，方志敏，洪宏义（罗漫）等人都是改造社的中坚。

改造社成立以后，出版了《新江西》杂志，还进行了一些社会活动。《新江西》杂志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宣扬新文化的刊物，广泛地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孟冰是主编。先后提出了“婚姻问题”、“人生观问题”、“改造社会问题”……。

孟冰同志的早期思想，是通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新青年》杂志的启发，属于改良主义性质。到1921年的冬季，改造社出乎意外地收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寄来的几本刊物和小册子，这使孟冰同志开阔了视野，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确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他在1921年冬，于一篇文章中写道：“这文付印时，得《共产党》月刊第五号，内有‘我们要怎样干社会革命’一篇，也可以参看”。此后，他接着在《新江西》第二期

上，旗帜鲜明地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他写道“如果我们不忍我们的手足、朋友，大多数无产阶级在那里过那暗无天日、惨无人道的生活，就应该起来实行社会革命，把我们的‘自由之血’去培养将来的‘自由之花’。”他最后大声疾呼地指出：

“要实行社会革命，应该采取一个适当的方法，自然，只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了。因为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还说：“我们要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做一个社会改造之实际运动的战士！”

孟冰同志是言行一致的，他立下革命的大志，便赤胆忠心地献身于革命。他同方志敏、黄道、黄家煌、汪群、邹秀峰、江宗海……等同志，都是在青年时代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宝贵生命！

孟冰同志一九二二年的暑假生活，是在学校中度过的。他努力钻研革命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在这期间，他废姓改名，用“冰冰”的名字，发表了“我的社交十不——不用姓和号；二不说客套话；三不宴会；四……；五……；六不回拜；七不贺年拜节；八不送客留客；九不送无谓礼；十不做应酬文”。这些除以后在《新江西》第三号登载外，他自己还另外印了很多份，分寄友好。从此，大家对他更为钦佩。

暑假以后，孟冰到了北京，在北大哲学系旁听。这一阶段有部份改造社的成员都先后到北京升学，改造社的中心就从南昌移到北京了。经开会商定，把改造社的总社设在北京。并在上海由方志敏、罗漫、黄野梦、徐先兆等同志设立上海分社。后来，方志敏回到南昌，便设立了南昌分社。

孟冰在北京，受到李大钊同志的教导，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在1922年的下半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正式走上了革命的大道。

一九二三年的春节之前，孟冰回到南昌。他曾到故乡过了春节。元宵前就回到南昌。在短短的逗留时间，他冒着极大的风

险，进行革命活动，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重大使命。他发动了有志之士，在南昌成立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之时（选出刘子池为书记），即被军阀蔡成勋（江西督办）的密探所侦知。接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又在当时的“心远大学”开成立会（选出周郁文为书记）。袁孟冰同志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又被军阀走狗所注意。就在成立会的当天晚上，刘子池被捕。翌晨，孟冰动身回北京，当他刚刚到达南昌牛行车站，准备上火车之时，即被军阀特务所逮捕。

孟冰入狱后，方志敏、赵醒侬先后自南京回到南昌，一方面整理团的组织，恢复团的活动；一方面设法营救孟冰同志。根据赵醒侬1923年11月4日向团中央第四号通信中说：“冰冰同志还未出狱，但商店保单已进去了多日，还不见有批，不知又发生什么障碍。”同年十一月九日第五号通信中说：“BB（冰冰）同学昨日才出来，大约一星期后可来申。”

孟冰出狱后，南昌团委曾召集一部分团员和青年开了一次欢迎会，他在会上作了讲话。

孟冰于1923年11月下旬离开南昌，到达上海。十二月一日上海同志以“旅沪赣人”的名义，在西门路78号开了一次欢迎会。据1923年12月15日《新江西》半月刊第六号上记载：“冰冰君略述入狱和出狱的经过，谈到审判时军法处问官所问的话没有一句不是毫无常识、一窍不通的笑话。大家哄堂大笑起来。罗漫君在演说中说：‘在今天欢迎会中，令我想起去年和冰冰住在一起的情形。去年冰冰由北京回江西，就说要去江西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我们都劝他不要干。’……。回想在南昌时，同学们都笑冰冰只知读书求学问，象个老先生一样，是个无用的人。……。他们看作无用的冰冰，却正在轰轰烈烈地干，为军阀官僚所畏惧，为平民所欢迎了。”

关于孟冰被江西军阀逮捕这件事，上海《民国日报》副刊

《觉悟》曾在1923年4月16日刊登了题为“黑暗的江西”一文，其中指出：“我们在南昌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只开过几次筹备会，选定了几个临时成员，（现被蔡成勋捕去的刘子池是文书股主任，冰冰是交际股主任）还没有正式成立，就有些以造谣为业的侦探去报告蔡成勋……，先把刘子池捕入军法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是在那天开成立会，到会的约百余人，又被侦探知道了……。蔡氏当即召集各长官开联席会议，并大骂他们办事糊涂，有这种事情发生还不知道。……。第二日，冰冰乘火车去北京、又被捕入军法处。因为冰冰在南昌文化书社住过，所以又把文化书社封闭，说是没有立案，不许营业，真是黑暗极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上旬，孟冰在南昌出狱后，江西的一次团委会议上提出创办一种刊物。当经决定：“用心远大学同学会名义，组织一种出版物，定名为《红灯》。”这个刊物只出版了一期。据孟冰同志说：“一九二三年的冬天，《红灯》曾经一度出版，但为着政治的、经济的及其他许多复杂的原因而停刊了。”

孟冰在上海住了几个月，除了搞团的工作以外，还主编了改造社上海分社出版的《新江西》半月刊。到一九二五年的五月间，党中央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与他一道离开上海去北京的有张国焘、刘清扬等人。他从北京去莫斯科是经过海参威的，他在《红灯》周刊上为崔豪的几封遗书写了一个前言，他写道：“崔豪给我百封以上的来信，我写给他的更多。可惜这些信已散落在莫斯科、海参威、上海、北京等地。”他在这前言中，还简略地谈到他在莫斯科的大学生活情况。他写道：“我还记得永久也不会忘记的一个冬天的黄昏，我从华斯都卡大学上课归来，踏着雪路，到了宿舍以后，丢下皮包，脱下大衣，走上三层楼，在一个长廊上徐步，后来依着扶梯尽端的栏杆站着，无意中又想起了我的少南（即崔豪），他为什么还没有信来呢？”

孟冰在苏联大约一年多，他是应召提前回国的。这时，他已恢复姓袁，改名孟冰。当时他分配在上海团地委工作，任宣传部

长。青年部长是关向应。还有一位吴振鹏。他们三人很要好。便以“冰”字为名，依年龄按“孟”、“仲”、“季”排列行次，冰冰便名为孟冰，关向应为仲冰，吴振鹏为季冰。当时上海团地委书记是贺昌，贺离任之后便由孟冰继任。

一九二七年，孟冰调任共青团江西省委书记。这时在江西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作，向国民党右派展开激烈的斗争。

为了宣传革命的理论，省委决定由团省委出版一种刊物。在孟冰的主持之下，将原来由崔豪生前主编的、已停刊三年的《红灯》周刊重新出版。孟冰为主编，邹努和徐先兆为编辑，（第十一期以后，由吴季冰编辑）《红灯》周刊是32开的小型刊物，从1927年2月13日出刊第一期，到同年7月16日第十五期为止，孟冰同志为《红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的斗争过程。他先后以“孟冰”、“亦生”、“培南女士”和记者的名义，写了大量的文章，对国民党右派进行猛烈的抨击。

在第一期题为：“读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一文中指出：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历史时期，中国国民革命的势力同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势力直接决战的时期渐渐接近了。”在第五期题为“究竟谁是右派？”一文中指出：

“同是一个国民党党员，却有的是右派，有的是左派。这不是他们的主观上愿意如此，而是阶级的背景决定了他们那样做。国民党改组以后，标明它的目的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因此一般依靠帝国主义发财的买办阶级素与军阀通气的大地主（阶级）便退出了国民党；在思想上代表买办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便形成了右派，与代表工农的革命左派相斗争。”文中还写道：“这些反动派根本就与工农的利益不相容，他们素来是贱视工农的……。”文中还沉痛地指出：“在最近，我们的一位最勇敢的同志，最努力于工人运动而且是赣南工人的领袖的陈赞贤同志已在赣州被右派公开枪杀了！陈赞贤同志是死于右派的公开反对工人运动，死于右派的公开压迫工人运动！陈赞贤同志是为工人利益而反抗右

派而被杀死的！全江西的工人将起来哀悼，起来为他报仇！”

孟冰在《红灯》第九期上题为“南昌市民暴动”一文中，满怀激愤的心情，记述了1927年4月2日南昌市民暴动的情景。文章写着南昌市民“用赤色恐怖的革命来答复白色恐怖的屠杀”。他生动而确切地描绘当时的实况。他写道：“南昌是右派中心，省党部是他们的大本营，而且又与省政府密切的结合，因此他们在南昌一方面用金钱收买流氓组织所谓纠察队、暗杀队以及示威大会；一方面又利用政治力量几次封报馆，捕新闻记者，捣毁市党部（左派），通缉革命民众的首领。这种白色恐怖政策只有越发激励南昌的革命工人、学生与市民。因此而发生四月二日群众围捕省党部反动份子的大暴动。”“四月二日下午三点钟左右……，此时百花洲已成了人山人海，那座洋房（省党部）似乎已被群众所包围。忽然窗中有手枪向外射击，似向群众示威。立时看热闹的纷纷向后逃避，只剩一些不怕死的工人、学生及市民仍在大叫‘捉拿反革命’。不久，群众已攻入，但仍间或可听到枪声。只见革命的市民将反革命分子一个一个地由省党部拖出，送到总工会去。”

一九二七年的五月初，江西青年迫切要求研究马列主义。当时，团省委在南昌市的江西新舞台戏院开了一个隆重的大会，孟冰在会上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专题讲话。他并且用“亦生”的笔名在《红灯》十二，十三期合刊《红色五月特刊》上发表了题为“今年红色五月的新意义”一文。其中写道：“红色的五月是包含‘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五卅’等几个最有价值最值得人们怀念鼓舞的纪念日子而成的。‘五五’是世界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生日。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变化的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催命符。这位最渊博的革命理论家、勇敢的实行者，一方面受尽了资本家、帝国主义者、以及一切脱不了封建思想的人们的深恶痛骂而诋毁他是一个‘怪物’；在中国有人骂他为‘牛克思’。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弱小民族

的革命民众，对于这个‘怪物’、‘牛克思’又是如何深切热烈的拥护与赞仰啊！我们每个生在列宁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的人，不仅要了解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在行动上，在一切战斗中贯彻与活用马克思主义。这便是我们纪念‘五五’的新的深刻意义。”

后来，孟冰同志调到九江团地委负责。因为当时在九江的吴季冰同志在九江“三·一七”惨案中受了重伤，季冰调回南昌，改派孟冰去浔主持工作。

孟冰在九江工作阶段，正是“八一”起义前后，革命斗争十分激烈，从一个高潮转入到一个低潮，革命活动也不得不由公开而转入隐蔽。一九二七年的十二月，孟冰为了党的工作，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以崇高的革命气概，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南昌。他为了联络工作而前往南昌市一平印刷局。

一些老朋友看见他公开在南昌出现，都大吃一惊，劝他马上离开。而他在南昌市区经过的时候，被一个叛徒兰仲和发现，这个叛徒向反动当局告密，于是被捕。反动政权对孟冰是怕得要死的，他们逮捕孟冰之后，对他进行了严刑拷问，而孟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反动当局匆匆地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就对孟冰下了毒手。孟冰同志英勇就义之时年仅二十八岁。

根据吴季冰在一九二八年《无产青年》第四期发表的“悼念我们的死者——袁孟冰”一文中说：“他那种勇猛镇静精神，是我们每一个战士的楷模。临刑时，他一路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工农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未死的我们，没有用眼泪来哭泣他的必要，只有我们工作的猛进，才是对他唯一的追悼！我们努力吧！”

另据一九二八年《布尔什维克》第二十三期上写道：“当去年双十节的时候，南昌时时传播一种恐怖的消息，说共产党要暴动。当时全城戒严。我们的勇敢战士袁孟冰不久遂在城内被捕。其时有许多人竭力向各方要求营救。”又说：“他那勇敢的精

神，灵敏的思想，印到许多同志和工农、学生的脑子里，永远不会磨灭。”

当时，正是广州暴动遭到失败，在反动军队中还有不少人是我们的同志，江西军阀朱培德生怕有人劫狱，所以很快就把孟冰同志杀害了。

孟冰同志牺牲之后，“二中”师友棺殓了他，葬在南昌市郊下沙窝。（今豫章路与一经路之间，相当于一纬路位置相接处）四十年代初，这一带地区平坟建房，而他的坟墓无人迁葬，先烈的忠骸也就不知去向了。

那个叛徒兰仲和，在解放以后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

（本刊记者）

（注一）：黄野梦：改造社创始人之一。曾任江西大学教授、江西省政协常委。1981年逝世。黄道：江西横峰人。同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创建赣东北苏区。抗战时期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一九三九年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暗害而牺牲。黄家煌：江西兴国。曾与陈奇涵同志领导兴国农民暴动。为革命事业而牺牲。刘軼：字南溟，江西都昌人。曾任大学教授。解放前到美国教书，客死异域。石廷瑜：江西都昌人，北大毕业，在省内各中学教书。一九五七年病逝。支宏江：江西进贤人。在改造社时化名“江岩”。大革命失败后病死于南京。徐先兆：江西铅山人。江西师院副教授，现已退休。

（注二）邹秀峰：江西横峰人，赣东北苏区创建者之一。是革命烈士。熊国华：江西都昌人。1930年被反动派所杀害，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洒血黄浦卫中华

记四叔熊雄烈士

熊巢生

四叔熊雄烈士牺牲已五十四年了，每当清明去省革命烈士纪念馆瞻仰他的遗容，心上久久不能平静，总想把他走过的战斗历程忠实地记录下来。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和省有关部门支持下，去年用了三个月时间，在京走访了肖三、张申府、盛成、饶竞群、傅钟、李卓然、何长工、肖劲光、曾涌泉、陈奇涵、许德珩、罗章龙、李世璋、徐彬如、刘型、李奇中等几十位老同志，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接待，提供了熊雄生平的革命事迹。此外，并查阅了有关资料，还得到中国革命博物馆李峻晨等同志的协助。

熊雄青年时期，参加过辛亥革命、讨袁湖口起义和护国护法战争，以后赴法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旅欧期间，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共产党，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发起者之一，是旅欧赴苏联学习首批者之一。回国后，积极参加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在党内曾任广东区委军事部长。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军事政治干部，为建立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卓有建树。在一九二七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大屠杀中，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三十六岁。

(一)

熊雄原名祖福，号中和，字黑士、披素。江西省宜丰县芳溪下屋人。生于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二日。有兄弟七人（他排行第

四），姐妹四人。父名景星，读书出身，前清孝廉方正（即举人），一子双桃。亲祖父文三在家务农，继祖父裕三出外经商，置有房屋、田产及山林。祖辈务农，人少势单，常受豪绅欺压。以后子女众多，乃在家设一“培兰书室”，延请先生和武师，教诸子侄亲友。

熊雄十五岁时，和比他大十岁的大哥一道考取瑞州府中学堂（江西省高安县）。初去时，学习较为吃力，由于他勤奋好学，不到半年，成绩即赶了上去，最后以最优等成绩毕业，回到家乡，族中开会庆贺，豪绅却不宣布他的成绩，他当场询问，反遭豪绅一伙追打，他便和三哥、五弟等人在家严阵以待，豪绅才未敢逞凶。

一九一一年初，风雨飘摇的清王朝行将倾覆的前夜，熊雄从家乡来到省城南昌，考取了江西新军的学生军。省城生活，使他有更多时间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增长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清王朝的认识，初步具有国家民族危亡责任感和反清革命思想。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江西新军与陆军小学、武备学堂、测绘学堂等富有革命思想的优秀青年便占领了南昌城，宣布了革命起义。不久，革命政府任命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新军的学生军被改编为学兵团。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胜利的果实落到了袁世凯等军阀和官僚手中。孙中山在上海召集旅沪的国民党人商议讨袁。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在湖口宣布独立，通电讨袁。苏、皖、闽、粤、湘、川六省相继响应。熊雄是学兵团的积极组织者，驻守在湖口石钟山前沿阵地。由于反动军阀的迅速逼迫和革命内部出现问题，起义只一个多月时间就遭到了失败。熊雄被迫随李烈钧出亡日本。行前曾要他三哥一日一夜徒步二百四十华里，从南昌赶回宜丰老家筹集路费。幸得县城一商号允借二百元，才有可能搭外轮离开中国。

熊雄在日本东京得识孙中山，他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孙中山的

赞许，并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重组的中华革命党和进入设在东京大森区浩然庐的军事学校学习。

熊雄于一九一六年回到国内便积极投入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战争。初在李烈钧的护国滇军中工作，以后在程潜的护国湘军中工作，任湘军总司令部上校参谋，奋战于广东及湖南的株洲、衡阳、耒阳、郴州一带。

(二)

一九一九年，湘军总司令程潜被军阀赵恒惕赶走，军队由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接管。熊雄目睹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国家民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又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和五四爱国运动的激荡，乃弃去数年戎马生活，毅然赴欧求学，探索改造中国和社会的新路。是年十月，由湖南衡阳送他七弟和大侄进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堂分校之后，即去广州筹借路费，得到他的好友林修梅（林伯渠同志之兄）的资助及湘军几个月的薪饷，便于十一月取道香港搭法国邮轮去法国。

熊雄到达巴黎后，即由华法教育会安排在巴黎西郊圣日耳曼中学补习法语，他完全抛弃了过去旧军人的优裕生活，与勤工俭学学生过着同样的普通学生生活。课余饭后，多与贵州籍的熊自难、熊味根、汪烦鲁，四川籍的秦青川、肖金芳等青年同学集于一处，相互切磋。一九二〇年初，还和熊自难、秦青川、肖金芳、盛成、李立三等组织了一个“巴黎书报流通社”，交换新书报，议论文字改革和革命道路。

法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巴黎又是欧洲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种各样的思想极为活跃。一九二〇年暑期，熊雄在巴黎选择学校，就有时间更多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它社会主义书籍，更多结识旅法学生和华侨工人。秋天，熊雄和来自美英等地的友人一同登上巴黎埃菲尔铁塔，“东望沉沉，用伤故国”，口占一绝：“登高东望一咨嗟，长剑倚天信手拿，北海鲸鲵

终就戮，南圻逐鹿竟谁家。”抒发了对祖国的怀念，称赞了巴黎铁塔的雄伟，歌颂了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对祖国陷于军阀混战的忧愤心情。陈公培在《关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提到“李立三到法国后，曾和十八个中国学生搞过一个劳动学会，在巴黎的有熊自难，也还有熊雄、张伯简、盛成等人。”在访问盛成时也谈到：“我们组织过劳动学会，参加的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工读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布尔乔亚是不会来的。”劳动学会明确提出要革命，要把华工组织起来，要到工厂做工，要参加工人运动等问题。以后，又以劳动学会等组织为核心，联合为勤工俭学者同盟，进而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坚决主张，勤工俭学生只有组织起来，彼此团结好，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一九二一年初，熊雄去法国西南部纪龙德省罗米尔农业学校工读。在该校学习农业，尤注意林科，并做农工。常和巴黎诸友保持联系，通报情况。不时寄信家中，摘录竹木种植法及学习心得，鼓励家人努力读书，接受新思想，要勤于生产，须谋自给，以应将来社会变革之需。在给二姐夫信中，指出：“社会革命呼声日高，农工实为中坚，应尽力创设农会，兼办教育。”这时，他经常考虑“游俄事”。

旅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取工作、学习、生活等权利，在一九二一年进行了“二月二十八日请愿”、“反对中法借款”、“占领里昂中法大学”三次重大斗争，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熊雄因在法国西南部的农校工读，未能亲身参加，但他对勤工俭学同学每次斗争都寄以同情和支持。“二·二八请愿”消息传到农校后，熊雄即来巴黎，劳动学会成员集于熊自难寓所，进行议论，印发声明和意见书，斥责中国驻法使馆勾结法国军警殴打留学生的暴行，号召大家坚持勤工俭学。

同年夏季，熊雄得悉父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写了哭亲诗三首，以示悼念，并表示“学归当安葬先人于庐山，以表先人高洁，长留清白于人间。”

秋天，熊雄去法国西南部夏郎德省赖古龙农业学校工读。十月，法国当局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勤工俭学生代表蔡和森、陈毅等一百零四人武装押送回国。这一事件，更激起在法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愤慨，尤其对中国驻法公使陈篆反动行为更为痛恨，勤工俭学生中特别是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和工读主义的更想对陈篆有所惩罚，在赖古龙农校工读的熊雄和李合林也有同样的想法。以后，信仰无政府主义的李合林去巴黎寻找惩罚陈篆的办法。

一九二二年三月，李合林回赖古龙农校，同在校的熊雄、郭须静在学校树林里试枪。中旬，熊雄又陪同李合林去法国南部上加龙省首府图卢兹附近的农业学校张恒涛同学处取回手枪。李谈论了准备枪击陈篆，为押运回国的勤工俭学同学报仇的事情，张“没有阻挡，因为我知道陈篆这个东西实是太坏。”熊雄即于三月十七日离开赖古龙农校去巴黎，二十一日由巴黎去德国柏林。三月二十日晚上就发生了李合林枪击陈篆的事件，这在当时法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是轰动一时的。

后来，熊雄在莫斯科东大学习时，看到国内颇有影响的《学生杂志》一九二三年十卷十至十二号上，登有李合林写的《九个月的法国牢狱生活》，并知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对国内一些青年有所影响，遂于一九二四年五月写了《读了‘法国牢狱生活’之后》一文（见《学生杂志》一九二四年十一卷七号），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浅出地对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行为作了严正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暗杀行动是“当时社会环境造成的”，“并不能解决一种陈腐的社会制度”。而且“也不是一种具体的新制度的表现”。“只有阶级革命这唯一的社会革命的总攻击，才有可能推翻陈腐的社会制度，而代以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正确的革命道路。对国内革命青年的思想引导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潮的批判，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熊雄到达柏林后不久便加入德国共产党，自后便在党的领导

下，勤奋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旅德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和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四月十九日致他两个哥哥的信中，告诉他已转学德国，并指出“德国此邦，虽系战败之余，观其一切不可侮也。”盛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故乡德国和人民。旅德同志每星期六晚上必集中一次于康德大街中共中央驻柏林通讯员张申府家中学习、讨论和研究工作，当时主要是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问题，初时参加的有周恩来、刘清扬、张伯简、肖三、熊雄、谢寿康等。此时适逢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团会议，他们便考虑谢、张、肖、熊四人去苏出席会议，后因国内已派人出席，而未成行。

是年四月间，在柏林的谢寿康、张申府、张伯简、周恩来、刘清扬、肖子暉、熊披素（熊雄）七人联名写信，给在法国北方作工的赵世炎同志，促他于“五一”前做好成立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工作。经过赵世炎同志紧张工作，六月便在法国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到会代表十八人，（旅德代表是周恩来同志）少共有成员三十多人（旅欧共产党员都是少共成员）。为了进行革命工作，少共成员都有代号，熊雄代号是“其光”。

熊雄在柏林常与在法诸友联系，了解游俄之意，征询他们的意见。同年五月六日寄与在法好友盛成信中附诗一首《春雪霏霏，独步柏林皇后湖口占一绝》：“湖冰如绉雪如银，天地无情却有情，彻骨清寒谁领会，自然和我斗输赢。”表白了他自己坚信马克思主义，坚定地走俄国革命道路的意志。（见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

一九二二年八月，旅欧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员旅欧支部。廖焕星在回忆中作了如下记载：“我于八月抵达柏林，适逢在柏林的周恩来、熊雄、熊锐、王圭、刘清扬、张申府等开会，选举周恩来同志为代表，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大会。”中共旅欧支部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通过少共成员

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进行革命活动。中共旅欧支部为培养干部，在党内成立共产主义研究会，开展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

为了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根据国内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开始有计划地选送党、团员成批赴苏联学习。经周恩来、赵世炎同志多方面设法与莫斯科第三国际联系，一九二三年三月底，熊雄便同由巴黎来的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等十二人同去莫斯科。他们均分配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连国内先去的共有三十多人，住在紧靠普希金广场的特维尔斯卡雅大街五十三号东大宿舍内，从此可以坐下来专门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苏俄革命实践经验。据肖三、肖复之回忆：熊雄床位是临街窗户旁边。四月二十八日，中共旅莫支部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欢迎新来的同志，新来同志中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熊雄、王圭六名党员。

在东大学习的，都享受苏联红军的生活待遇。这种待遇是全苏联最高的。列宁当时也是这种待遇，尽管当时生活艰苦，但他们学习很认真，思想很坚定，要求很严格，纪律性很强，团结得很好。而且中共旅莫支部经常进行共产党人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要求自觉养成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为革命献出自己一切的政治品质。肖劲光说“熊雄是一位好同志。”曾涌泉回忆：“他的革命热情，对党的忠诚，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对同志的亲切等等优秀品质，给同志们的印象是深刻的。”

一九二三年秋，孙中山派蒋介石等四人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中共旅莫支部参加接待，并指定熊雄参与陪同参观，洽谈有关问题，熊雄得与蒋介石相识。饶竞群在回忆熊雄同他谈过的事情中提到：“我们这批留法学生于一九二四年十月到东大，由于同乡同学肖复之同志的介绍，始和傅烈同志同他初次见面，更感亲切。以后，熊雄告诉我，他陪同代表团与蒋介石多次

接谈中，蒋介石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问题，熊曾指出他（蒋）以多年随从孙中山革命的地位领导国民党新军则名正言顺，没有同意蒋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初，国民党当局派青年军官叶希夷（叶挺）到东大学习，熊则主动与他接近，感情更为融洽，在党的培养和同志们相互帮助下，叶即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两件事，充分表示了熊雄对人对事的辩证分析和洞察才能。”

中共旅莫支部为了培养党在各条战线从事革命运动的骨干和领导力量，具体考虑每个同学的专长和特点，先后将他们派往苏联有关部门进行短期的专门的教育和训练。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熊雄被派去苏联红军中学习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

（三）

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联合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合作，革命开始高涨。同年五月，并在广州黄埔岛上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这是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经验训练干部的新型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调配了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帮助建设并担任军校各种负责工作。因此，黄埔军校便成为全国各省和邻近国家有志革命青年仰慕和向往的地方。

国内革命斗争，需要干部甚急。熊雄奉调回国，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三日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即派他去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同年十月，广东革命军在省港工人和东江农民的支持下，开始了第二次东征，熊雄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协助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工作。一个多月的战斗，以黄埔师生为主体的革命军即全部击溃了陈炯明的反动军队，完全收复了东江，统一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东征胜利归来，一九二六年一月六日，熊雄调任黄埔军校政

治部副主任（主任由军校秘书长邵力子兼任），主持政治部工作。当时三期学生1200多人尚未毕业。

为了团结革命力量，统一军事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一月十二日把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隶属中央军委领导。熊雄是军校改组筹备委员七人之一，经过一个多月的改组工作，军校便于三月一日开学。第四期学生2300多人，编为步兵科二个团和炮兵科、工兵科、经理科、政治科等四个大队。

政治部主管全校政治教育工作。根据“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的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制定全校的政治教育计划。过去学生为客观条件所限，没有系统的政治教育。自第四期开始，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教育。每期学习的政治课程多达二十六门。积极灌输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的理论知识。所有这些课程，均聘请当时在广东有名望的人士和共产党人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张秋人、韩麟符、于树德、熊锐、巴文俊、廖划平、李合林等作政治教官，进行专门讲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熊雄主持了第一次教务会议，专门研究政治教育及有关工作，决定各门政治课及讲授的肖楚女、张秋人、李求实等十五同志，熊雄亲自担任《军队中政治工作》、《本党宣言训令》两门课的讲授。

政治部的组织略有变更。主任、副主任、秘书之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全部编制由过去二十多人增至七十多人，聘请专职政治教官，并建立和健全了各项工作制度。创办了《黄埔日刊》。

此外，还邀请军校负责人、政治教官或社会名人做形势任务和政策等专题政治讲演，定期组织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和政治测验以及组织宣传队、“血花剧社”、军民联欢会和参加民众运动等，进行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教育。大量印行校报、期刊、特刊、文集、讲义、丛书、画报和传单等。据一九二六年八个月统

计，印行即达千万份以上。发行地点有三、四千处，几乎遍及全国各省、东西洋各大埠，使师生政治学习更加丰富多彩，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做了楷模。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威信提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便日益不安。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七个月中，省港的国民党右派恐怖组织杀害了共产党人和坚持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二百多人，并把培养革命人才、共产党影响最大的黄埔军校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因此，军校内部的革命派和反动派的斗争也在持续地激烈地进行着。开初是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个对立学生组织的形式进行的。熊雄在军校工作中，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原则，揭露和打击国民党右派的阴谋和破坏活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至二十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共产党进攻，进行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尝试。当时，军校已受到国民党右派调来的军队严密监视和控制，熊雄沉着镇静，要求政治部全体人员保持常态，按照党的指示，发动群众进行斗争，经周恩来同志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联合行动，蒋介石被迫释放了逮捕的共产党员五十多人。

事后，熊雄即来广东区委向陈延年、周恩来同志汇报请示，要求加强军校党的组织和领导力量，以适应新的形势，广东区委当即采纳，决定成立党在军校的领导核心——党团，由恽代英（新任主任政治教官）、熊雄（政治部副主任）、聂荣臻（政治部秘书）、陈赓（步科一团连长）、饶来杰（从区委机关调来专职党的工作者、公开身份是政治部图书管理员）五同志组成。并指出，党在军校的中心任务是：“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力量，反对极端的反动势力，积极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国民革命运动”。从此，军校在中共党团的领导下，学校的工作有了积极的发展。

军校改组后，四月开始筹备成立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别党部，由方鼎英、张治中、熊雄等五人为筹备员，五月正式成立，熊雄选为特别党部监察委员。这时，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公开抛出酝酿已久的，打击共产党的所谓“整理党务案”，妄图扼杀革命势力，一手篡夺革命领导权。这一违反孙中山主张，破坏国共合作的作法，立即遭到中共广东区委及共产党员的抵制。六月七日，蒋介石在军校发表反共讲话，要学校师生填表声明党籍。而且，还以高官厚禄对公开的共产党人进行拉拢和收买。但是，军校中的共产党员没有一人表态，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高贵品质，这也和中共党团的积极工作分不开的。十一月，军校特别党部改选，中共党团有意识的推举有声望的国民党左派分子和个别未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为候选人，使特别党部委员中仍然保持了左派的绝对优势，熊雄选为特别党部执行委员，又进行了一次阶级斗争的较量。

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举师北伐，大批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走上斗争的最前线。窃取北伐军总司令职务的蒋介石采取措施加强对军校的控制。一方面公开在《留别本校同学书》中发出“革命的胜利要植根工农群众和共产党的合作”的高调，七月二十六日对校部各负责人讲话并写了几个口号，即“禁绝小组织——小团体”等句，对共产党人进行含沙射影的攻击，一方面运用他所控制的“黄埔同学会”进行破坏、监视校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八月十三日《黄埔日刊》上登出蒋介石写的几个口号，熊雄即于同期写了《对于校长‘临别赠言’的说明》，文中说，综合“几个口号”的意义，就是要“团结革命分子，集中革命势力”，指出坚持孙中山“主张容纳各派革命分子”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共产党既是代表工农的政党，自有其独立性”，要求“各认清合作的原则”，“对于破坏党的组织的人，就应认作我们的敌人，即拿起对付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精神，与之奋斗”，进行了一次针锋相对的斗争。

九月中，又为毕业的军官政治研究班同学录写了序，指出：“革命党员要抛弃个人主义，要时时刻刻干革命工作”，

“不使自己变成反革命或半革命派，而且必当负责去打倒这类叛党害党的不良分子”，“必当积极宣传革命的真正理论和政策，以造就真革命的分⼑”，“革命军官要为主⼑即为被压迫的民族——特别农工——利益而奋斗牺牲！”“不可与敌人妥协，更不可疏忽我们联合战线”，“不可变节而有军阀性质的思想和行动，尤不可堕落而为武装的官僚，成为害民的蠹贼。”

十月初，在第四期毕业同学录上题词：“人世斗争几日平，漫漫也应到黎明，听潮夜半黄埔客，充耳哭声与笑声。”概括了当时革命发展大好形势，指明革命势力对北伐胜利的喜悦与反动势力的恐惧，满怀革命胜利终要实现的希望。在《告第五期诸同学》一文中谈到革命形势已由国民革命发展到世界革命，快要向压迫者剥削者“的营垒下总攻击了。”黄埔军校的作用和“使命是如何远大！”要求新同学“牺牲一切，共同奋斗”，造成“有革命人生观的真正革命者。”

北伐进军只几个月时间，克服了湘鄂赣三省，革命发展要求培养大批的军事政治人才，便于长沙、武昌等地设立黄埔军校的分校，并将黄埔本校第五期的政治科和炮工科迁往武昌分校。当时熊雄认为：“政治科全体迁移，徒留其它各科，未免使本校成畸形的状态”，而未即行迁移，后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返粤，与军校领导协商，还是决定迁移。熊雄遂分别在黄埔岛的蝴蝶岗驻地和政治科，曾家祠驻地和炮工科同学话别，阐述了历史赋予黄埔军校及其学生的责任，要求同学到武昌后继续与扩大黄埔精神，并着重谈了纪律、理论联系实际、生死离别意义等问题，指出：“纪律是一种组织的生死关键”，“为革命而死，便于革命有贡献，反之，为升官发财、为恋爱、为军阀作走狗……等毫无意义之死，即使死了成千成万，还是死于非命。”同时并制订了赴武昌旅途二十几天的宣传大纲，要求同学“一天不忘担任革命

工作。”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党的领导机关和主要干部也一同北迁。熊雄、肖楚女等同志留在后方广东革命根据地工作，熊雄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广东区委军事部长。北伐战争的胜利，工农运动的高涨，广东的国民党右派和军校内部反动势力也疯狂地进行破坏活动，熊雄更是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指示和孙中山三大政策，坚持不懈地对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和行为进行斗争。军校内的反动势力对发展的革命形势和熊雄的工作恐惧不安，便迫不及待地书面密报蒋介石，派专人直送南昌。黄埔同学会骨干分子曾扩情分析“蒋介石对共产党的镇压和对熊雄的杀害，在当时已下了决心。”（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十九期中《黄埔同学会始末》）

而熊雄却在列宁逝世二周年、二七运动四周年，本校改组及《黄埔日刊》周年等各种纪念活动中，坚决宣传孙中山三大政策和党的主张，宣传北伐战争的胜利和黄埔军校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宣传对反动势力的活动要提高警惕。在《列宁与黄埔学生》一文中，指出：“孙文主义和政策与列宁主义和政策是相得益彰的关系”，“黄埔学生应是最勇敢的孙总理的化身！”“应是最勇敢的列宁精神之模仿者！”在《“二七”在国民革命中之意义》中，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中之先锋队，工农是革命中之主力军，黄埔学生是代表革命民众——尤其是工农利益而奋斗的先锋队。”

在《我对于本校“三一”纪念的希望》、《本校开学周年纪念之意义》两文中，回忆军校改组一年来的实践，军校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革命形势发展对军校的期望，要求学生“不仅要自己担保十二万分的革命，还要引导许多群众到革命战线上去，”发展“本校‘民族先锋’的光荣”，并指出：“以训练出纯粹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武装党员与军队”，是本校“伟大的使命”，“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打成一片，即为本校生命之根本所在。”

在纪念《黄埔日刊》一周年时，写了题词和文章，题词是“东方被压迫民族之呼声，革命军人之道路，”高度评价《黄埔日刊》的作用和担负责任。

北伐军队进抵长江流域时，国民党右派加紧了叛变革命的活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了上海后，进一步与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勾结，从革命内部破坏革命。广东国民党右派与军校内反动势力也露骨地积极配合，斗争越来越尖锐。熊雄坚守工作岗位，以大无畏精神坚持斗争，同时又秘密布置将一部分党团员和进步人士转移，保存革命力量。而且针对当前形势提出斗争口号，坚持革命方向，保持革命警惕，不断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叛变阴谋，继续领导国民党特别党部，以合法的灵活的方式进行坚决斗争。阴云密布的大屠杀的前夜——四月四日，召开了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全体党员大会，熊雄并在会上讲了话，表示一致拥护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的“四大方案”，坚决反对破坏国共合作的广东国民党省党部的议案。同时又积极领导广州的工农革命群众起来为保卫已得的胜利果实而举行的游行示威，给国民党右派的叛变活动以有力的揭露和打击。可是四月五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所谓《联合宣言》，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妥协退让，麻痹了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可乘之机，而没有应有的反击准备。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广东的国民党当局李济琛等也于四月十五日开始了疯狂的反革命大屠杀，并派军舰监视黄埔军校的海面。李济琛、钱大钧、朱家骅和方鼎英等密谋镇压军校共产党人的办法。军校的中共党团也得到广州军委留守处“保持镇静，提高警惕，等候中央指示”的通知。熊雄并且得知，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队长的七弟也被反动派逮捕。

军校代校长、教育长方鼎英见在广州沙河四标营军校五期学生和入伍生六百余人已全部缴械后，便于十五日赶回校本部，与

校内国民党右派商量镇压办法，他们害怕军校内共产党影响大、左派力量占优势，“稍一不慎”，会引起暴动，不敢轻易下手。经过紧张的策划后，由方鼎英出面找熊雄，逼其就范，熊雄当即斥责蒋介石、李济琛的叛变革命是不共戴天之仇，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并表示“要将一腔热血洒在黄埔岛上，与黄埔共始终。”方鼎英害怕熊雄的行为会引起军校内革命师生的反响，乃“劝熊雄出国学习，并派汽艇送去香港。”熊雄当即提出行前要与黄埔师生讲一次话。方鼎英乃于次日召集全校师生在校本部开会，熊雄作了简短的讲话，勉励全校师生继续恪承孙中山的遗嘱，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旋即到会全体师生列队送熊雄至码头登上汽艇。当时在场送行的饶来杰同志即来广州军委留守处汇报。

熊雄所乘汽艇驶至江心，即以“机件失灵，停下检修”，监视黄埔的中山舰便将熊雄秘密逮捕。当时即有“黄埔同学会”分子两人持枪上舰，企图就地杀害熊雄。舰上负责官员以熊雄是“共党要员，是李济琛下令缉拿者”而予以拒绝。该舰乃将熊雄押往广州，投入公安局监狱，转囚于南石头惩戒场。（一说被敌人装入麻袋沉入水底牺牲了）六期入伍生汪德彰回忆他在狱中同熊雄的一段经过，他说：“熊雄是我在狱中认识的第一位党的高级干部。一次放风时，熊主任手抚摸着我的头问我情况，多大年龄？我说十九岁，他说我的儿子不死也有你这么大了。不要怕，要打靶，我是第一个。对我教育至深。”四月底的一个深夜，广东国民党反动当局将熊雄同志秘密杀害。就义前，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意志与英雄气概！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

中央苏区反经济封锁斗争的片断回忆

王贤选 何 斌

中共中央率领全国总工会迁到瑞金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全面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当时，中央苏区的红军有十来万，加上临时中央政府和地方苏维埃、游击队、赤卫队等，人数就更多了。因此，制造武器的军火原料、缝制衣被的布匹和棉花等都发生问题。同时，在反“围剿”战斗中，伤病员大量增加，医药器材奇缺，给中央苏区造成极大困难。特别是敌人封锁食盐入口，直接影响军民的日常生活，严重影响红军的战斗力。在扩大百万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保卫党中央的号召下，配合红军反“围剿”战斗，扩大白区党组织，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就自然地成为全国总工会的战斗任务。当时，刘少奇、陈云、朱祺等同志都亲自抓了这项工作。刘少奇同志更是抓得很紧。

全国总工会在苏区各省、县进行调查、了解、考核后，调集了各省工会领导干部到瑞金，讨论研究如何开展白区工作，发展白区党组织，动员白区群众参加反“围剿”和反经济封锁的斗争，随即成立各省总工会和开展白区工作。

在全国工会干部会议上，刘少奇同志特别强调指出：反经济封锁的工作非常重要。敌人封锁我们食盐、布匹、药材和制造炸弹的氯化钾、三道年等物资，的确给我们苏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我们如果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就不能获得制造炸弹的原材料，也无法解决军民的穿衣、吃盐和伤病员的医药问题；如果不能打破敌人的封锁，我们中央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就要发生困难；苏区工农就无法继续再生产，也将无法继续维持生活。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于都、会昌、信丰、瑞金等县，都是粮食、食

油、生猪、柴火、钨砂等物资的产区。这些物资，都要靠我们去打破敌人的封锁，运输到白区，换取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支援红军，使反“围剿”获得胜利。因此，我们发展白区的党团组织，加强革命领导力量，动员人民参加反封锁的斗争，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刘少奇同志还指出：赣州尚未解放，但赣州的工运基础很好。那里有经过我们陈赞贤同志培养教育的工农干部和群众。陈赞贤同志为党为革命已经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的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精神，将象种子一样，永远播在赣州工人群众的心中，一到春天，就会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赣州的工人运动，只要党去组织领导，就会活跃起来。赣江这条河流，对我们反封锁斗争十分重要，赣江帆船工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据目前估计，每月需要食盐量至少十五万斤（在四次反“围剿”时，增加到三十万斤），布匹的需要量更大。因此，对外贸易局要很好领导贸易公司，深入白区，设立秘密的办事机构，做好把苏区的稻谷、食油、生猪、柴火等运出去，把白区的食盐、布匹、棉花、医药器材、爆炸性原料运进来的贸易工作。同时，为了运输物资进出苏区，打破敌人封锁，还要我们在白区扩大革命力量，发展党的组织，动员人民参加反封锁、反“围剿”的斗争。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这就需要我们另立机构，负责采购、运输、反特等工作，配合贸易公司来完成任务。这一机构，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一九三二年由王贤选同志在赣县江口成立了赣江办事处，并在江口和于都的峡山两个地方设立了贸易公司办事处。

赣江办事处成立时，中共赣县东郊区委会设在茅店，属中共赣县县委领导。当时的东郊区委书记是刘有伴同志。区长是卢荣发同志，后来是林得标同志。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便于工作，中央后来派了钟魁同志任赣江办事处主任，兼任支部书记。赣江办事处负责行政事务的潘得胜同志兼任组织部长和白区工作部部长。因此，东郊区委和贸易公司党组织，也都参加赣江办事处为

支部成员。

赣江办事处负有赣江流域物资采购与转运的重要任务，并与赣州、吉安、南昌等地发生直接联系。南昌办事处设在潮王洲，主任由船排部部长管志华兼任。赣州的工作，由赣江办事处直接领导。同时秘密建立了党组织分布在附近的白区，如下窑支部、七里支部、梅林支部和河西支部。当时，河西支部由何三苟任支部书记，下窑支部书记刘贤法，七里支部书记钟崇洪，梅林支部书记丁友生（现在会昌）。几个支部的分工是这样：河西支部担任蟠龙、凤岗、唐江一线的盐、布、西药材等物资的采购和运输；下窑支部和七里支部担任沙石、沙河、城市一线的采购和运输；七里支部还配合执行采购制造炸弹的氯化钾和三道年等爆炸性药物的任务；梅林支部担任信丰江一线的采购和运输。

采购和运输的办法是：河西支部在唐江一线的采购和运输，多采取打通竹节装盐，封口放入水里，晚上请水手偷偷从河里带走，十根八根地拖到水东（晚上国民党特务不敢过水东，因为我们有赤卫队出来对付敌人），转运到中央苏区。凤岗、蟠龙等处的盐，则利用夜晚肩挑运到水西附近，抢黑夜运过水东；或者放船靠在附近，等盐、布等物资一到，就装船抢着运入苏区。当时，建春门桥头和塔那边的谢坑等处，敌人都筑了碉堡，白天有敌军巡逻，夜晚有特务、暗探布哨。我们运输盐、布、西药材等物资到中央苏区，必须抓住敌人的间隙抢偷过去，否则就会被敌军抓着。敌人抓到了我们的盐、布、西药等物，不仅物资全部没收，而且人员也会遭殃。象袁金山就被杀害，李毛仔被敌人用电触死。因此，这项采购和抢运物资的任务十分艰巨，斗争很激烈。

我们为了抓住敌人的间隙进行抢运，也设有两步哨。一步哨走在前面，遇着敌人就发出暗号（如事先约好用咳嗽声，然后用手电向后面照射，使后面的人将运输的物资隐藏起来），再设法找间隙偷运苏区。

我们也曾用过这种方法，即利用敌人贪财爱利的特点，用金钱设法收买敌人的密探，约好时间，要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我们放船过去。当然，这种方法也不完全可靠，使用时必须十分谨慎，防止有的密探得到钱后，反脸就抓走并杀害我们的人，没收我们的帆船和物资。

有时，敌人还会放船破坏。有一次，我们的船队放过河了，后面有一条船没有紧紧跟上。这时，敌人放船出来了，听见我们掉了队的船的水声，急速把船开了过来，把我们的船带到浮桥边，硬逼我们那条船开到浮桥以上，要把船上的人员抓走。当时，我们这条船有何光龙、肖厚仁 and 老吴三位同志，他们都只三十岁左右，年轻力壮，他们一面反抗，一面争辩，引起一场搏斗，结果三位同志都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了。

下窑、七里、沙河等地的同志，则在赣州城里采购盐、布、西药材等物资，秘密运往苏区。

运输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为了避免敌人发现，有的假装由农村到城里挑灰，在箩筐下面装盐，上面装灰，挑运过去；有的用夹底的粪桶，底层暗装食盐或西药，上层装粪便，大模大样地挑运过去；有的用背包捆扎身上，随身带过去；也有的用妇女“骑马”（指女同志系月经带）的方式，把食盐带过去。因为西药材不能捆扎抛丢，需要用安全保险的方法运输，我们就发动妇女同志，用装过糕点的空盒子装西药，请妇女同志乔装做客送礼提过河去。

后来，敌人加强封锁，搜查更厉害。他们采用铁钎插验的方法，把粪桶夹底和箩筐盖灰等方法识破了；又用人身搜查的方法，把背包捆扎和妇女“骑马”的方法也识破了。为了完成紧迫的抢运任务，逼使我们又不得不改用其他方法。于是，我们又在靠河的城墙边租了一家有栈房的店面，开办了一个染坊，招牌取名为“永源生染坊”。我们买好盐、布、西药材等物资后，就一律捆扎成布包作为送到“永源生染坊”去加染，实际就是送到那

里去转运。因为“永源生染坊”紧靠城墙，城墙外面就是河沿，可以非常近便地把布捆搬上城墙，推下城去。我们每次搬运的行动，也是非常迅速的。首先把船靠拢码头，布包一捆捆推下城墙时，城外就有人等着。他们一接到布包就搬上船，装好就运走。这样，我们就抢运得更快、更多，及时完成任务。

赣江办事处除负责采购、运输、反特、方便红军进出等任务外，还要负责与赣州大商家搞好关系，用以沟通苏区同白区的物资交流。例如，我们为了打开钨砂的销路，在贸易上给予赣州的大商家一定的好处，并通过他们同广东军队李振球部搞联合经营。

我们由于多了这么一条渠道，对外贸易的局面也就打开了。每次交换运出钨砂几十吨、稻谷几十船，就能相应地运进几十船我们需要的物资。当时我们进口的物资分两路。一路是由南雄到信丰的盐，主要是汽车运输；另一路是由新淦三湖运棉花、布匹和药材。在白区这段很长的水路，主要是由赣江船运。每当货物运到了良口附近，红军就派武装去接收。于是，大商家就报被红军抢去了。赣江办事处对这项贸易工作是做得很出色，很有成绩的。

为了扩大物资来源，粉碎敌人的封锁，特别在解决食盐供应的问题上，还鼓励私人贩运。例如对某些平日为人忠实可靠并与我们的同志交往较深而又缺乏资金的，通过赣江办事处的介绍，可以向贸易公司贷款。在价格上，凡属自己采购来的盐运到中央苏区后，售价为每元两斤；凡属向贸易公司贷款买来的盐，每元为四斤；其他私人贩运的盐价则更高，每元只能买到十四两（旧制每斤十六两）。

为了解决中央苏区的运输问题，还成立了中央苏区河流修道委员会。刘少奇同志为此还亲自进行了调查研究。据调查，从兴国到瑞金一线，肩挑运输消耗体力甚大，需要人力也多。在这一条运输线上，虽然每天都有一千多人在挑运，但仍难完成任务。

随着中央苏区河流修道委员会的成立，新做了三百多条帆船，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运输量。河流修道后，运输时间也比原来缩短了。

河流是怎样修道的呢？

（一）河流遇到管子（即横插河流的溪河），就架桥。这样，船工拉纤，就可从桥上走过去，不要弯路或下水拉纤了。

（二）从江口到瑞金的河流两岸杂树丛生，拉纤船工常被树枝拉下河去。河流修道委员会便把河流两岸的树木砍掉，便利了船只的运输，保障了船工拉纤的安全。

（三）瑞金河里的三穴石是封建迷信的生龙口，对船只航行十分危险。刘少奇同志决定用炸弹把它炸掉。炸后，河流畅通，运输顺利，船运平安。

但在采购和运输上，也常常发生一些意外的问题，现举几个事例如下：

（一）有一次，刘友玉（又名刘哑子）因采购的食盐被人掺了白石粉，经贸易公司查获，判处死刑，决定于次日当圩枪决。其时，王贤选同志适来视察工作，了解到上述情况，认为这样处理不妥，以后将无人敢冒风险再去搞采购食盐的工作；何况食盐掺的是白石粉，并非毒药，而且又未查明究竟是谁掺的。因而请求改变原判。当时外贸局局长钱之光同志也同意重新审议，于是改变了决定，于次日大会上，由刘友玉当众检讨，承认工作疏忽，以后将功补过，会后释放。通过这一事件，不仅刘友玉本人折服，群众也大受教育。

（二）老田同志（兰坳人）带着三个人，挑三担盐遇着密探，发生格斗，被杀害。

（三）吴老四（水西龙庄上人）用茅竹运盐去苏区，正在河里拖运时，被敌人发觉开枪打死。

（四）七里支部书记钟崇洪、下窑支部书记刘贤法，因运输西药材，被国民党拦劫，损失数千元，问题不得解决。后来刘少

奇同志亲自接见他们，提出采购食盐运到苏区出售，以赚得的赢利来弥补损失，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总之，当时我们的斗争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既是经济上的斗争，又是军事上的斗争，也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且这些斗争往往都是扭结在一起而又互相制约着的。当时，我们之所以能够打破敌人的封锁，完成对外贸易和采购、运输食盐、棉布、西药材及其他战略物资的任务，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同时也是与刘少奇同志亲自抓这项工作分不开的。

起 来！奴 隶 们！

吴大可烈士遗作

(一)

用力抽打，劈叭
流呀，血鲜红的
一个道地的×××
在山野里，荒原，峻岭
疲奔了你的双腿

和野兽搏斗呵
鲜血流着
从没有一点吝惜
深刻着这些仇恨
让鲜血去洗涤
他那累月的凶残
如今是汉奸的铲共特工队

这儿呵 也念着——

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讲呀！你做了些什么工作？”
“抗日和反对一切法西斯帮凶！”

“打……”

猛烈的嚎叫
一只受伤的老虎叫声
撕碎了瓦片
冲播开去
让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的战士又一个
遭了敌人的毒手

(二)

这儿是中山纪念堂
灰色的死暗里
现露出一一点恐怖的灯光
“向总理遗像跪下
今天是×××对×××！”

火辣，麻痹，红青紫
皮肉僵结成一块
豆大的汗珠在流着
身子抽抖起，一阵黑暗
眼前闪现着亮花
倒下——像一只猛兽倒下
灌——辣椒水

紧压住，挣扎不动
钉上了耶稣殉道的十字架
吁——吁——喔——呛咳
死神伸出那魔掌
剧痛，昏乱
翻转了整个天地
闭住了这一口气
“死了吗？”
牙根紧咬住这个仇恨
不让你像亲近圣火一样的
去亲近真理

紧记住吧
“皮肉给他吧，
骨头是我的！”
就是骨头碎了
也会有强烈的一声爆响

一张阴险的脸
狰狞的笑
分明是张着吃人的血口
“不是玩的，
还要换一套吗？”——
我们也正是扛子分子
来吧
无非是敌寇传授的全件法宝
不会有什么的
去问那些你豢养的狗吧
有代价也会出卖

连他的祖宗十八代
这眼前不就是
我们胜利的收获吗？

(三)

“住嘴，你又要倒霉
管理员正要找你的噜嗦
没有打你算好的”
谢谢
奴隶们缩了进来
做出一付鬼脸
给他贴上去
门洞封起了
窗口也闭上吧

有一口气还得要呼唤
总得要交换一个斗争的信号
“起来！奴隶们！”
血醒的斗争呀
歌声鼓荡着
没有屈服
只有牺牲

(四)

歌唱吧
奴隶们，同志
按紧你刺痛的伤痕

敲起那沉重的铁链
极北的星
永远光亮在黑夜里

我们不要廉价的自由
让恶魔蚀去了灵魂
真理正要声张
黑暗与光明
这是最后的决斗

不要狡辩，自作聪明
拿勇气吞下那颗子弹
代价决不会是两角五分
懦怯，就是死亡
玉碎或瓦全
这是总的测验
没有掩饰
全要兑现

歌唱吧
奴隶们，同志
按紧你刺痛的伤痕
敲起那沉重的铁链
极北的星
永远光亮在黑夜里

(五)

“刀过流水”

碗大的疤
或者是子弹穿一个洞
一样是痛快的

就是不要你死呵
忍耐着熬受那笑面虎的威胁
说媒婆的诱惑
像修道士一样的贞坚
熬煎那漫长的岁月
“应付一下吧！”

这正是走上叛逆的第一步
节烈的寡妇啊
总不会对人放松那
严肃的脸孔
撕破老妇女的嘴
给它一个无情的打击
决不致叫圣洁的灵魂
去拥抱那吃人的魔鬼

从遥远的北地
到东海的沿岸
全世界一切受苦难的人们
已带上了他们的武器
向横暴投掷着复仇的炸弹
他们追念着
永远不会忘记的
马家洲的松山

那里也是个受难者的坟场

让鲜血涂遍大地
给他们的，终只有死的
或者是活的
会腐臭的尸体
毒蚀它
叫他们自己去灭掉
全世界一切的苦难的人们
已带上他们的武器
向横暴投掷复仇的炸弹

(六)

勇敢的去吧！
我们红色的英雄
爬上墙头
先吸一口自由的气息
要当心
那墙角头有只狗

冲向原野去
冒着黑暗奔去
你像啃断缰绳的野马
辨认那速去的路
越过陷井
要准备给追捕者一个痛击

巨大的手伸着
等待着抚慰你这野奔的孩子

祝福你
在黎明之前
加入战斗的行列

紧记住
那惨痛的教训
集合起我们的同志
无情地打死那
投向敌人的叛徒
最阴险的两面狗

严肃起阵容
我们在等着
最后的斗争
只要有一个信号
挥起我们的拳头
打碎这些枷链
将流尽最后的血
作决死的搏斗

带着你们的胜利
吻着我那还热的脸
给我带上一朵
五角形的红花
将看到我最后的
为真理庆祝的
恬静愉快的笑容

没有伤悼

血的经历使你们
健壮成一支劲旅
向主力会合去

全世界的奴隶们
拥着你们去完成
人类解放的使命

附记：吴大可（1913年—1942年）烈士，原名建业，江西瑞昌县人。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逮捕，囚禁于江西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在敌人种种法西斯酷刑下，英勇不屈，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终于1942年2月12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泰和马家洲的松山。《起来，奴隶们》（标题系辑者所加，文中×××系当年敌特搜获抄录所隐去。）就是他在狱中的斗争纪实。

（辑者刘勉玉）

勘 误 表 (第四辑)

页 数	行 数	误	更正或补充
33	19	红六团	红六军团
35	21	红六军	红六军团
108	18	潘	藩
109	15	尔只	尔为
110	21	邹殿臣	邹殿书
112	7	来藏	来葳
112	8	根培	福根培
112	8	孔始潜	孔昭潜
112	15	左承	左丞
112	19	乃音号	乃普号
113	14	关金生	吴金生
113	17	胡才生	胡长生
113	17	衷万官	衷才官
113	17	谢阳连	谢锡连
113	19	吴声孜	罗声孜
113	19	吴老	李老
114	19	浔江调解	得江调解
151	9	附近两峰	附近两县
158	附注	龚蒙伯	龚豪伯
158	附注	余建家	余建丞

江西省出版事业管理局赣字八〇第五五号批准出版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日报印刷二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3.52印张 字数13万

1981年6月第一版 198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每册0.70元

内部发行